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

#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

## 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

谢纳 / 著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

#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

——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

谢 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谢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300-12762-0

I. ①空…

II. ①谢…

III. ①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469 号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

教育部“211 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

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

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

谢 纳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8.125 插页 1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1 000

定 价 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化思想转型 / 14

第一节 空间转向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 15

第二节 空间转向与文学理论范式的当代转换 / 25

**第二章** 空间理论的辩证思考 / 35

第一节 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认识论 / 36

第二节 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论 / 40

第三节 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 / 48

**第三章** 生存—实践论视阈下的空间特性 / 53

第一节 广延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的统一 / 54

第二节 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统一 / 57

第三节 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 / 60

第四节 生活场域性与身体在场性的统一 / 63

## 第四章 文化表征实践与文学空间表征 / 69

第一节 空间的生存性、体验性与审美性 / 70

第二节 表征空间与文化表征实践 / 77

第三节 文化表征空间与文学表征实践 / 82

## 第五章 传统空间的裂变与现代空间的重构 / 91

第一节 “天下”疆域的崩解与世界视阈的开启 / 92

第二节 全球空间意识与文学空间的现代性发生 / 98

第三节 跨语际实践与新小说的翻译现代性 / 106

## 第六章 民族想象共同体与国家空间的建构 / 114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空间的权力统制 / 115

第二节 领土疆域的沦陷与战争意识形态的强化 / 122

第三节 文学宏大叙事与国家空间隐喻 / 138

第四节 “时空分延”与国家空间想象 / 144

## 第七章 都市空间景观与感觉经验表达 / 153

第一节 都市的兴起与空间体验的“感觉化” / 154

第二节 都市艺术与小说叙事的“空间化” / 162

第三节 “景观社会”与单向度的人 / 168

第四节 娱乐化都市空间与时尚的双重性 / 174

第五节 都市空间的异质性与放浪的美学 / 183

## 第八章 面向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发现 / 191

第一节 日常生活批判：生活世界的平庸与神奇 / 192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缺场与生活空间的消散 / 197

第三节 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艺术化

生存的多样可能性 / 205

<b>第九章</b>	文化政治权力与身体的空间规训 / 216
第一节	从身体的贬抑放逐到身体的空间政治 / 217
第二节	性别、身体与空间压迫的历史 / 222
第三节	性别政治学视阈中的身体空间规训 / 227
第四节	身体写作中自我空间的敞开与解放 / 232

结束语	/ 240
-----	-------

参考文献	/ 245
------	-------

后记	/ 252
----	-------

# 引 言

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离开时间的空间或离开空间的时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特定时空之中，人类思考时空问题总会有所侧重，对时间与空间的不同侧重及理解，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及理论观点。侧重时间的理论思考，以历时性为致思理路，将事物置于历史时间的维度进行分析考察，探寻事物生成、演进、流变与发展的规律，由此形成以时间化或历史化为特征的理论思维模式；侧重空间的理论思考则与之不同，它以空间并置为致思理路，将事物置于空间场域的维度进行分析考察，注重事物的共时性、在场性、构成性，由此形成以空间化为特征的理论思维模式。在人类思想史上，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不尽相同、有所侧重，表现为时间意识相对较强，而空间意识相对较弱。尤其是进入现代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在场空间维度的研究，已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定式，各门学科都离不开“史”的历史学叙事，如哲学史、文化史、文学史、经济史等。这种思维定式以历史主义为核心理念，建构起具有

强烈历史学意识的现代知识体系。

在历史学叙事的理论思维模式影响下，文学研究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时间性、历史性、事件性等历时性分析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导模式。以历时性分析为主导模式的文学理论研究，在基本原理层面，注重探究文学的起源、文学发展规律、文艺思潮流变等；在作家创作层面，注重研究作家生平历史、创作历程、风格演进等；在文本分析层面，注重分析情节发展、性格形成、叙事时间等。文学研究历史时间维度的不断强化，导致空间维度的逐渐弱化，文学与空间问题的思考逐渐远离了文学理论研究的视线。因此，如何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将空间性思考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实现空间化（spatialization）与时间化的辩证统一，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理论转型创新的生长点。

在 20 世纪文化思想的震荡转型中，空间的理论研究突破线性的历史时间束缚，以令人瞩目的方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将其称之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转向作为当代文化思想范式的转型，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因此，它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学术研究范式的重大改变。这种范式转型影响波及当代哲学、社会学、地理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强，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文学理论中时间性的权威垄断地位，将空间性提升到高于时间性的地位，为文学艺术研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理论空间。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下，社会理论、美学理论、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美国当代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提出“空间批评”的概念。韦格纳认为，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重视空间研究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的关注，将促使人们



更多地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维方式。在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互动阐释中，“空间批评”必将“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化分析”<sup>①</sup>，形成并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化”（spatialization）的文学理论视阈。

关于文学与空间的理论思考，不仅是一个充满诱惑、充满生机活力的理论题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理论课题。目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或空间批评尚处于探索阶段，诸多思想杂糅并置，缺少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建构。在这一既充满诱惑又充满挑战的题域中，本书试图对文学与空间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为建构独具特色的“空间化”文学理论进行创新性的尝试，并在此基础上对具体文本进行“空间批评”的解读分析，为文学空间理论的探索提供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视角。

本书以生存—实践论视阈下的空间生产论为理论基础，以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以中国现代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运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中建构文学空间理论，探寻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表征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和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揭橥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

运用当代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对文学与空间的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有助于摆脱传统历史时间性研究的局限，改变传统文学理论的思维模式，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提供崭新的理论视阈。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历史决定论的强势话语统治下，传统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故事逻辑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因此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成为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成为了无生机且有待意义填充的空洞容器。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度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

---

① [美] 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见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13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验、都市景观及都市问题等进入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的视阈，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由此被提升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都市化进程使当代空间问题日益复杂多变，传统的历史时间叙述不仅难以解释当代空间生产的复杂多变性，反而遮蔽了空间反思的视线。因此，建构一种空间化的文学理论思考方式，对于认识、理解当代空间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考察中国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文学表征空间与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在现代性空间重组重构过程中所具有重要意义，构成空间与文学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本书凸显空间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为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论视角，对于思考和解读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艺术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在殖民化、商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空间生产与重组始终面临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本书以中国现代性空间的重组重构为考察重点，解读文学与民族国家空间、文学与都市景观空间、文学与日常生活空间、文学与政治权力空间、文学与身体空间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探究空间生产背后所隐匿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身体规训等文化政治关系，以及它对人类的行为方式、文化方式、生存方式及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对文学与空间的关系进行文化政治学的反思，不仅意味着对同质化空间权力统制所造成的异化现象的批判，同时也意味着抵抗压迫空间进而改变空间、寻求自由解放的多样差异空间的可能性。

在文学与空间之间展开互动阐释，需要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种跨学科交叉互动的研究进路势必关涉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研究及文学理论等诸多学科。因此，广泛地涉猎国内外不同学科的相关学术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梳理整合，是文学空间研究得以顺利展开与实施的前提基础。

当代国外的空间理论研究始于 20 世纪中后期。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化思想界兴起发动的空间理论转向，将空间问题的反

思从文化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层面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对当代西方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出版的《空间的生产》（1974）与米歇尔·福柯发表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1984）为空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福柯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到空间的纪元，他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sup>①</sup>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标志着“空间转向”成为当代哲学关注的热点问题。

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的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将空间问题的思考与当代政治问题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创了空间政治学。在其影响下，曼纽尔·卡斯特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人将结构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壮大了社会空间理论。作为列斐伏尔的学生和同事，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发表的《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城市社会学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1973年，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哈维出版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力图将城市与空间的问题纳入社会批判的理论框架，其随后出版的《后现代的状况》、《正义、自然和差异的地理学》和《希望的空间》进一步将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研究融合，拓展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政治经济批判维度。与哈维的理论旨趣相投，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将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与地理学研究结合为一体，建立起社会批判的空间理论，恢复了后现代地理学中的马克思政治学批判传统。索亚先后推出“空间三部曲”——《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和《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获得阐释当代空间问题的崭新活力。随着空间理论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围绕空间这一理论题域，形成了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建构出文化地

---

①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1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理学 (cultur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空间社会学 (sociology of space)、空间符号学 (semiotics of space)、后现代地理学 (postmodern geographies) 等新学科, 图绘着当代思想的文化地图。

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 成为受关注的热点问题。20 世纪以来, 空间批评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布朗肖、巴什拉、布尔迪厄和美国的詹姆逊、凯尔纳等著名理论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 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 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析。巴什拉的《空间诗学》向读者展示了空间的诗性体验境界。詹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等作品中, 运用地缘政治美学的方法测绘当代文学艺术生产, 图绘当代西方的文化地图。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域的生成与结构》中, 运用“场域”和“区隔”的空间理论, 对西方现代小说的空间场域描写进行了独到的艺术社会学解读。凯尔纳在《媒体奇观》中, 汲取德波的“景观社会”思想和鲍德里亚的“仿真拟像”理论, 探寻媒体景观所隐匿的文化意识形态秘密。综而论之, 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直接动因, 对全球化的历史空间维度的关注, 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或其他文化文本是如何表征空间的, 这种关注将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方式。

上述研究突破了传统封闭的单一研究模式, 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文艺学等学科有机地融合为一体, 注重空间研究的跨学科性。当代空间理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 改变了传统地理学、城市社会学所采取的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研究模式, 扩展与深化了传统学科的研究视界, 突出政治关怀的价值取向, 扭转了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理论体系因过于抽象而导致的丧失现实解读能力的倾向, 使哲学理论反思回落到诸如城市问题、地缘政治、媒体景观等当代社会所必须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场域。

回避这些社会问题，放弃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思考必然导致理论现实针对性的缺乏，使空间问题的反思缺失政治批判的理论深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跨学科研究在凸显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不足与缺欠，其主要表现在于：不同学科的跨度过大，致使研究边界模糊不清；不同思想混合杂糅，难以建构系统的理论体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导致空间研究的无限度蔓延，使得具体而深入地探讨特定空间领域的问题存在一定困难。

从空间的维度看，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规模的空间重组与空间敞开的过程。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中国的空间生产呈现出天翻地覆的巨变和前所未有的复杂形貌，国内学术界开始密切关注都市空间问题，都市与空间的文化研究日渐凸显，空间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提升到理论的层面。一批著名的国外空间理论研究成果被系统地译介引入，其中上海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三辑丛刊，对列斐伏尔、福柯、索亚等人的空间理论予以重点介绍。其后，索亚的《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沙朗·佐京的《城市文化》，迈克·迪尔的《后现代都市状况》，乔治·拉伦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等专著也先后出版。商务印书馆和南京大学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大卫·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和《希望的空间》、爱德华·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等一系列空间研究的代表性文献。此外，上海师范大学学者孙逊、杨剑龙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已出版三辑，多以译介为主；台湾学者夏铸九主编了以《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为代表的一系列译著，重点介绍国外空间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

国外研究成果的译介，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激活了都市与空间研究的理论兴奋点，空间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审视文化问

题的基本理论视阈。在哲学美学、文艺学领域，空间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任平、胡大平分别发表《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和《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以崭新的视角介绍了当代空间转向所具有的社会批判理论意义，阐述了空间转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关联。汪民安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中，对空间转向、身体转向与后现代转向之间的内在关联予以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其内部蕴含的当代文化意义。此外，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一书，在全面系统地梳理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基础上，阐释了列斐伏尔由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动因及意义，指出空间革命对日常生活改造的价值。作者从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空间的三重性辩证法、身体的空间实践过程和作为新生活政治解放策略的空间生产等方面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予以详细介绍，实现了哲学基础的一种“空间化本体论转换”，推动了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扬在国内首次将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在其撰写的《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中，他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和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理论解读西方现代小说，进而提出：“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要之，文学与空间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所谓先者高扬想象，后者注重事实，相反毋宁说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sup>①</sup>随后，陆扬还在其编写的中文专业本科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和研究生教材《文化研究导论》中设专章介绍当代西方空间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上述研究凸显出“空间转向”的理论意义，将空间问题的思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空间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于都市文

---

<sup>①</sup> 陆扬：《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4）。

学的研究领域，其中代表性作品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54）》，吴福辉的《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李书磊的《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王宏图的《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赵冬梅的《小城故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小城小说》，张林杰的《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陈平原、王德威主编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程光炜主编的《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洁非的《现代性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性转型》等。上述研究在兼顾小说、诗歌各文体，涵纳海派、京派等都市文学流派的基础上，从都市与文本写作、都市与作家体验、都市与文化记忆、都市与传媒出版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都市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深化了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研究。其中，《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一书关注作为文化记忆的北京和“用文字构建的、带有想象成分的北京”<sup>①</sup>，其论述对象包括“北京的文学（小说、诗歌、小品文）、艺术（绘画、戏剧、音乐）、教育、传媒、宗教、建筑、生活环境以及民族意识等”<sup>②</sup>诸多学科领域，从文化想象和历史记忆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深广度。此类研究在显示珍贵价值的同时，瑕疵也暴露出来。它们大多将都市空间等同于空间，以都市文学为文本对象，侧重文学与都市之间关系的描述与分析，缺少当代空间理论资源的渗入，对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关注不足。近年来，敬文东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张宝明的《现代性空间的生成：〈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1915—1919）》、罗岗《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马春花《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9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以及葛红兵、宋耕的《身体的

---

① 陈平原、王德威主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5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同上书，8页。

政治》等，开始尝试运用空间生产理论、地缘政治学理论、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揭橥文学背后隐匿的政治权力规训。

整体来看，国内的空间理论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诸多的缺欠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内的空间研究较之国外相对滞后，导致目前的研究主要以译介国外的相关文献为主，因而，如何消化理解国外前沿的理论成果，并将其转换为分析中国本土问题的理论工具，成为当前空间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次，与国外研究强调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不同，国内的空间问题研究依然难以跨越学院式的严格学科界限，极大地限制了空间研究的理论视野。

再次，上述原因直接导致空间研究的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价值立场的模糊，其阐释分析的理论深度难以到达纵深的腹地。在客体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影响下，国内文学研究领域的空间问题探讨，侧重于梳理都市空间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带有一定的实证主义倾向，较少从哲学、政治学的理论高度反思城市或空间问题，从而削弱了自觉的理论高度和批判意识。

弥补上述欠缺与不足，有待于学界的共同努力，以建构富有批判精神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空间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与分析表明，当代空间理论研究既存在着显著的优势，又存在着某些缺欠与不足。如何吸纳并发挥前人的研究成果，弥补缺欠与不足，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本书运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方法，对文学空间生产进行分析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和都市文学研究，具有探索创新的理论意义。

首先，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不同。传统地域文学研究，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侧重描述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像景观，始终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学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京



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荷花淀派等文学流派的分析，均侧重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忽视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上述文学流派的命名方式也都直接源于空间地缘的简单界分，缺少其表征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探究。

其次，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都市文学研究不同。传统都市文学研究缺少城市问题的批判反思意识，侧重城市题材内容的分析，过于关注城市空间对文学经验表达的决定作用，忽视文学在建构城市空间过程中——即赋予空间以政治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文学空间理论侧重研究的是，文学在文化表征实践过程中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揭示现代性空间重组的文化政治内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从而揭示文学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

上述问题的分析表明，空间问题构成一个复杂繁复的谱系，而置于其中的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更是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因此，如何理解文学表征与空间生产这一崭新的当代议题，清晰地梳理出现代性空间建构的历史过程及特点，重绘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空间地图，成为本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由理论思考和文本分析两大部分构成，前者侧重空间理论的哲学美学思考，后者侧重文学空间表征实践的文本分析，以实现理论反思与文本分析互动阐释的研究目的。

作为一种哲学思考，空间转向是当代哲学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构成空间理论的哲学基础，本书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理论基础，以当代西方空间转向为学术资源，探讨空间的实践性特征以及文学空间理论建构等问题，为进一步分析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着对空间问题的不同理解。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人类的空间理论反思大致可描述为：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

间认识论；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生存—实践论哲学的空间辩证思考既吸纳了空间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又克服其局限与不足，并为空间权力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而成为本书思考空间问题的哲学理论基础。从实践观点看，空间是生产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因此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空间的属人性——即空间的意义便也在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被生产创造出来。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超越了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先验与经验的传统二元论形而上学立场，将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引入空间研究领域，提出“空间生产”的著名理论，开创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派，使空间的理论思考达到了辩证统一的生存—实践论哲学高度。人类的生产实践决定着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空间实现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成为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空间。从实践的、辩证的观点来看，空间的实践性特征可概括为：广延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的统一、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统一、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生活场域性与身体在场性的统一。

空间转向不但改变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方式，而且促成了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走向一种空间化的理论思考方式。在其影响下，美学理论和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呈现出相互交叉渗透的态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通过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我们可以获得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并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即文学空间理论。文学空间理论以生存—实践论美学为基点，探讨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创造的影响。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主要形式之一，必然构成文化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所参与的表征性空间建构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以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为手段，所生产出的符号化的表征空间。因此，社会空间的文化

内涵，正是文学艺术活动所赋予的、所缔造的，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

如何运用空间理论解读文学文本，无疑是空间理论与文学理论相互融合的关键所在，本书主要以中国现代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从现代性视阈出发，将空间生产理解为现代性工程得以具体实施的场域，探寻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揭示现代性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本书分析探讨了现代小说中传统空间的裂变与现代空间的重构、民族想象共同体与国家空间的建构、都市空间景观与感觉经验表达、面向生活世界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发现、文化政治权力与身体空间规训等诸多问题，从而描述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谱系特征，标识文学在现代性空间生产中的坐标位置，以期为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提供可资参照的独特视角。

# 第一章

## 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化 思想转型

在 20 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革，各种传统终结的断言和变革转向的标榜，此消彼长，相互呼应。这些重大变革作为 20 世纪的社会症候和文化表征，促动了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模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思想范式发生重大转换，人们将此变革称为“转向”（turn），例如，现象学转向、存在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视觉文化转向、身体转向、后殖民转向、后现代转向等。在上述诸多变革转向中，空间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题域，人们称之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空间转向作为 20 世纪后半叶社会生活、文化政治和学术思想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之一，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反思提供了新的向度，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整体学术范型的变革，对当代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学科的面貌，形成了多学科发展的态势。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题域。



## 第一节 空间转向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空间转向发端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1974 年,法国著名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该书被誉为“在人类空间性的社会和历史意义,特别是空间想象力方面,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sup>①</sup>。另一位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接受一家地理学杂志的采访后,于 1976 年发表了题为《权力的地理学》的访谈。<sup>②</sup>福柯宣告,当今时代已进入空间的纪元,他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sup>③</sup>上述两位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空间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注,标志着空间转向的开启。

列斐伏尔作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运用马克思异化理论建立起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体系,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产生重大影响。他反对官方教条马克思主义无视人及其现实生活的形而上学倾向,认为人并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劳动的、技术的、理性的人,归根到底,人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已被全面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轨道之中,异化现象已全面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异化已全面地销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因此,宏大的社会革命的总体性解放方案,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人的最终解放归根到底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自然要关注日常生活空间,因为日常生活总是一定空间场域的生活。为此,列

---

①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9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② 先于此,福柯曾于 1967 年作了一次题目为《关于其他空间》的讲演,该讲演于 1984 年以《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为标题整理发表。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一书中认为,该讲演关于空间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③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18 页。

斐伏尔在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将日常生活批判具体落实到空间反思批判的层面。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不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造空间”<sup>①</sup>。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注重于空间问题的哲学反思，试图建立系统化的空间理论，为空间转向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他首先以马克思实践生产理论为基础，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提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概念，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空间是一种历史建构。基于此，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重合一的空间辩证法，实现了社会性、历史性、空间性的统一。此外，他还借助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与社会形态理论，从绝对空间（absolute space）、神圣空间（sacred space）、历史空间（historical space）、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contradictory space）、差异空间（differential space）六方面对空间生产的历史方式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列斐伏尔如此关注空间问题，显然与战后资本主义全球空间重组紧密相关。面对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和重组，对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显然是日常生活批判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将自己的空间理论称为“空间政治学”。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对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他更为关注的是空间与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倾力于对历史建构的空间场域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探查，以揭示空间、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福柯所说的地理政治学，还是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政治学，均将空间问题的思考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两者的空间理论都从政治学维度对空间予以反思。

继列斐伏尔、福柯之后，空间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190, 1991.

关于空间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地理学层面提升到哲学社会学高度，空间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反思的基本向度，成为当代学术思想“面向生活世界”的在场之域，“存在与空间”的哲学运思取代了“存在与时间”的传统命题。正如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所说的那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发生了一场可以被一些人如此描述的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这可能算是近两个世纪来的第一次，特别是批判性的学者开始像他们传统上阐释历史和社会、解释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那样阐释‘空间性’了。……一种再度兴起的、结合空间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视角，开始给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想与阐释的新模式。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与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sup>①</sup> 空间转向强有力地影响到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等领域，关于空间的理论思考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热点题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空间延展拓殖，当代学者对空间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空间成为理解、分析和批判当代社会的最重要场域。布尔迪厄的“空间区隔”（distinction of space）、吉登斯的“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德波的“景观社会”（spectacle society）、鲍德里亚的“仿真拟像”（simulation simulacra）、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索亚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等诸多理论，均从不同方位指向当代日益复杂的空间生产，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空间性理论资源，空间日益成为人们必须经验和反思的场域。

虽然，时间与空间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范畴，然而这两个概念在西方思想史上被安置的地位和被关注的程度却不尽相同，其具体表现为，时间的意识越来越强，而空间的问题却被忽略、被遮蔽。尤其是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重视历史时间维度的探索，忽视

---

<sup>①</sup> [美] 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9 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空间维度的延展，已逐渐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坚固的思维定式。为此，福柯用“历史的着魔”来形容这种坚固的历史学传统：“19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它以不同主题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过去不断积累的主题，以逝者的优势影响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于同时性的时代中，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我确信，我们处于这么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sup>①</sup>

长期以来，空间维度为什么一直缺席？空间问题何以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的关注热点？空间转向与当代思想的内在关联是什么？空间转向对当代文化艺术和文艺理论研究将产生何种影响？思考和回答上述问题，对我们理解空间转向的由来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关系上看，空间转向是当代西方哲学变革的题内应有之义，并构成当代西方哲学转向的重大主题之一。“哲学如此深入地考察了人类生活的时间构造问题，竟至于认为这是今天哲学的根本问题。而人类生活的空间构造问题却令人惊异地被忽视了。显然，这是认为，空间只是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之于对时间问题的研究是不会有什用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当然，生活空间问题是不能通过与生活时间问题的表面类比而简单地推导出来的，相反地，生活空间则提出了一些全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要从时间类比出发的话，那么他是绝不会看到这些问题的。”<sup>②</sup>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空间转向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和解释方式的转换变革，也就是说，空间转向的精神实质和理论意蕴在于提示出一种与传统

---

①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18页。

② [德] 鲍勒诺夫：《生活空间》，见刘小枫主编：《经典美学文选：现代性的审美精神》，10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传统的哲学视野中，空间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第一，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遮蔽了生存空间的关注；第二，历史决定论的时间意识遮蔽了在场空间的思考。因此，空间转向与当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历史主义的解构，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

### 一、空间转向祛除了形而上学宏大叙事对生存空间的遮蔽

在本体论、本质论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专注于对社会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体根基和本质规定的探索，对社会的研究始终局限于宏观的社会本质、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历史和社会事件，而将日常生活世界视为琐碎、庸常、偶然的非本质现象，将其排除在理论视阈之外。本体论形而上学发展到黑格尔，完成了集其大成的最高阶段，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最高原则，创构了抽象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绝对理念构成世界的本原，世界的运动发展都是绝对理念逻辑外化的结果。随着西方哲学的发展，本体论或本质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逐渐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与不足。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和美学开始了颠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哲学思想运动，黑格尔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进入到终结阶段。马克思以实践的优先性取代理论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重要意义，开启了从本体论向实践论的转向；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以现象学“面向生活世界”为方法，提出了哲学应该面对人的生命存在，从而开启了从本体论向生存论的转向。上述哲学变革为当代思想的空间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改变了传统思维忽视社会生活感性存在的弊端，将理论思考的关注点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空间。其中，现象学转向回归到直观的日常生活空间；生存论转向回归到生存的此在空间，实践论转向回归到感性的社会空间。可见，诸多哲学转向一旦从形而上学的体系中脱域出来，对生存空间的关注便是其中的题内应有之义。

空间转向以现象学“面向生活世界”为基点，将哲学思考从抽象的本体论层面回落到感性直观的生活世界，体现了回归日常生活

世界的现象学旨归。虽然，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之初的主要动机是探寻意识的自明性问题，但意识的意向性决定了“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的构成性关系，要寻找意识的原初发生就必须回到意识原初的被给予情境，由此确立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将哲学致思的目光引向生活世界，首先肯定生活世界的先在性和前提性，认为生活世界是此一世界“预先就存在着”的地平线，是所有理论或科学思考的“前提条件”，因此哲学、科学或理论的致思，说到底都应该是对生活世界的询问。现象学运用悬置与还原等方法，中止了本体论式的先定预设，使哲学从事物背后的本体探究转向了直观事物现象的生活世界本身，使哲学从超验的本体世界回归到日常经验的生活空间。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那样，“生活世界是空间时间的事物的世界”。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回归生活世界的致思理路和旨归，最后一定要还原回落到空间和时间的维度上。因为，时空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维度，在世界中也就是在时空之中。正是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引领胡塞尔逐渐走出意识哲学的局限，将其运用到“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思考之中，开启了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阈。

以现象学为基本理论方法的生存论转向，将此在的优先性地位确立为存在之思的前提，将存在理解为动词性的可能敞开，用“此在人生”的关注解除掉超验的本体存在，将生存回归到此在空间。无论是海德格尔提出“存在的去蔽澄明”，还是萨特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均意在反对用传统本体论或本质论的方法来解释世界。存在论哲学主张将传统哲学关于本质或本体的抽象概念追问悬置起来，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现象直观，即所谓的现象学还原，来直观地描述事物的本真状态，反对将生活进行本质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处理，认为将生存存在本质化、抽象化和概念化，不仅不能揭示生活的本真状态，反而会遮蔽或遗忘存在本身。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将存在抽象化、概念化、本质化，因而割裂了存在与生存的内在关联，使存在处于被遮蔽、被遗忘的境地。按传统本体论或本质论的观点，人们只有超越感性经验的现象世界，通过概念抽象地把握

世界，才可能揭示或认识世界的本质本原，即认识真实世界本身。然而，这种抽象概念的过程，不仅没有使我们接近这个世界，反而使我们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所以，将世界本质化的过程，并不是接近世界或揭示世界的过程，反而是疏离世界或疏远世界的过程。世界的本质化，亦即世界的疏离化、世界的陌生化。生存论转向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存在的生存性，恢复存在与生存的内在本原关联。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了“此在”（德文：dasein；英文：being there）优先性的生存存在论原则。简言之，所谓“此在”即是人之存在，即是“此在人生”，即是人之生存存在。此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是“在世界之中”，此在的命运是必须被抛入世界之中，必须在世界中存在，此在是与他者的共在，与世间事物的共在，即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存在。此在沉沦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如果空间以某种方式属于世界，那么世内的存在者就必定具有空间性。”<sup>①</sup>“此在由于其本身具有空间性，因此才能让存在者在空间中照面。而此在只要实际在世就必定给出空间。”<sup>②</sup>如果将存在问题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悬想拉回到日常生活世界，就会发现存在问题与生命存在、生存活动和生存境遇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sup>③</sup>

西方传统的超验本体论存在观的历史是存在遮蔽的历史，是存在遗忘的历史，也是生活空间遗忘的历史。只有回归到“此在人

---

①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5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

③ 海德格尔更为关注存在的时间性维度，在《存在与时间》中他甚至始终贬抑空间，强调时间的优先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海德格尔对空间性的贬抑表明他依然受制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时间概念，空间维度的缺失亦可看出海德格尔早期现象学方法的不彻底性。陈嘉映认为：“海德格尔这样贬低空间的存在论地位显然与他攻击传统存在论立场相一致。但在学理上，这样贬低就未见能讲得通了。此在要跃入生存的诸种基本可能性，第一要务就是‘给予存在者整体以空间’，空间在存在论上的重要性是明显的。”后期海德格尔经常回到空间这一概念，并否认了人的空间性来自时间性的提法。空间维度的介入对于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内在矛盾以及前后期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49～154页。[美] 约瑟夫·科克尔曼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48～16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生”，才可能达到存在的去蔽与澄明。对“此在人生”的关注，将理论的致思指向人生在世的日常经验结构，从而通过存在的召唤，使存在回归到生存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此在空间。

## 二、空间转向祛除了历史决定论时间意识对在场空间的遮蔽

长期以来，空间一直被视为是死寂的、固定的、静止的、非辩证的；而时间却正好相反，被认为是活生生的、丰富的、多产的、辩证的。“对所有那些将历史与以下的事物混淆起来的人来说，使用空间的术语会看起来像是对历史的一种反动：进化的旧图式、生命的延续性、有机的演进、意识的进步或对存在的研究计划。如果有人开始谈论关于空间的问题，那么这便意味着他对时间充满了敌意。”<sup>①</sup>人们之所以重视时间而忽视空间，显然与现代性的历史时间观念紧密相关。这里所说的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主要是指以线性的、逻辑的、因果的、必然的历史决定论为主导观念，建构起来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体系，它构成一种坚固的以历史主义为主题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出现，颠覆性地批判了传统历史学的理论观念及叙事方式。随着当代空间化（spatialization）思维的展开，历史时间概念成为需要诊断反思的重要问题。

西方哲学史上，尼采首先对传统理性化的历史时间予以拆解，开启了解构现代历史叙事的先河。通过叙事与历史的分析，尼采拆穿了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历史观念，颠覆了现代性历史时间观念。在尼采看来，黑格尔所谓的历史不过是理性叙述或制造出来的历史，这种由理性虚构所打扮出来的历史，往往以客观历史自然规律的面貌充当历史的真实。理性置入历史的历史学叙事，成为现代性的一种显要标志，因此历史成为理性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历史也就是绝对理性通过历史实现自身运动的历史。时间框架的建立及历史事件的编年无疑是一种技术理性的应用，而历史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客观规律性描述，说到底不过

---

<sup>①</sup> [法]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2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是具有“意识形态蕴涵的解释模式”<sup>①</sup>，一种历史的“宏大叙事”。

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在《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一文中，分析了空间化思维兴起与历史主义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提出“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sup>②</sup>。索亚认为，长久以来，历史主义在合理合法性的身份确证中，保持着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并对批判性空间想象实施着强力的压制与控制。“这种对空间性的重新安置的核心，是对长久以来本体论的和理论的历史主义提出批判，因为历史主义在批判性论述中倾向于予以优势包摄了空间性。”<sup>③</sup>面对历史决定论意识形态所造成的诸种后果，当代思想界发起了对极端历史主义的解构批判运动，空间在反思批判中被再度发现。由此，空间问题被凸显出来，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在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逆动中，西方学界发起了空间转向的运动，使之成为当代文化政治领域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学术事件。因此，后现代地理学反复强调的前提和承诺正是在摆脱历史决定论羁绊的同时，解构或重构传统历史叙事，将空间从时间语言的牢笼中解救出来。

回顾 20 世纪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我们看到，伴随现代性历史进程，历史时间意识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理论霸权，是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对线性的时间认识是启蒙主义以历史、进步、真理为基础的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sup>④</sup>这种历史主义的现代性意识形态认为存在着一种线性的、逻辑的、因果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规律，它蔑视一切，决定一切，压倒一切，战胜一切，它先行地设定了社会历史的终极目的，并使人类的命运无法逃脱地屈从

---

① [美]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28 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② [美]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3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 [美]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和历史主义批判》，见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218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④ 苏红军：《时空观：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见苏红军、柏禄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40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于这一历史宿命。“从黑格尔到现代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种对历史必然性的不恰当的、近乎宿命的强调，忽视个体、自我的自由选择并随之而来的各种偶然性的巨大历史现实和后果。”<sup>①</sup>黑格尔式的客观历史观，不过是理性虚构某种目的的叙事，历史因此成为一种理性的骗局。正是理性赋予历史以某种发展进程的目的，某种线性的因果关系。现代性通过历史时间置入所编织起来的线性历史进程已被解构，藏匿在历史假面具背后的形而上学理性的真实面容已经暴露无遗。在黑格尔式的宏大历史叙事中，历史必然规律以其铁血的面目施展着历史理性的狡计，巨大的历史逻辑以极具宿命色彩的决定论命题，成为极权主义的合法化证明，历史成为无数个体生命献祭的祭坛，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历史巨轮将无数的个体生命碾得粉身碎骨。在线性历史进步主义意识不断强化的思想传统中，空间被看作是承载历史时间演进的空洞容器、表演的舞台。时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始终占据绝对优先的主导地位，空间反而被遮蔽起来，成为缺席的不在场者。如此说来，空间问题的重新发现无疑具有政治学的意义，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反复强调空间反思政治学维度的真实用意之所在。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空间生产和重组是资本主义全球都市化的重要特征，它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的各个角落。因此，为了改变生活，就必须改变空间。宏大的历史叙事往往诉求于总体性的解放方案。经实践证明，这种崇信历史而忽视空间、强化社会改造而忽视日常生活、关注群体而忽视个体的总体性方案，不仅没有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普遍灾难。正是面对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解放方案的失败，空间解放的问题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空间是具体感性的生活场所，只有改变空间，才能改变生活。从这种意义上说，空间改造应该是总体性解放实践失败后的替代性方案，空间政治学批判应该是革命政治学批判的一个变种，它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工程回落到日常生

---

<sup>①</sup>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活空间改变的层面，试图通过空间的改变，特别是日常生活空间的改变，建构理想社会，这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的空间政治学。在这一微观政治学方案里，空间成为抵抗政治权力压迫、寻求解放的场域。

## 第二节 空间转向与文学理论范式的当代转换

空间转向作为思想范式的转型变革，给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不是局部的振荡变化，而是整体学术范型的转换，是提问方式、言说方式、解释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空间转向打破了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对当代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等学科均产生重大影响，改变了传统学科的面貌，形成了多学科渗透融合、交叉发展的态势，并建构出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空间社会学（sociology of space）、空间符号学（semiotics of space）、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y）、空间批评（critique of space）等新方法、新理论、新学科，它们重新图绘着当代学术思想的文化地图。

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不断增强，空间或空间性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明确提出美学理论、社会理论均与地理学有着内在的关联，他认为：“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关于不同形式的生产出来的空间，如何抑制或促进了社会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美学理论学到很多。有趣的是，现在地理学家的努力从文学理论家那里获得的支持，比从社会理论家那里来得多。……在地缘政治学的历史里，对于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的神话

的诉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蕴涵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在一起的重要意义。”<sup>①</sup>正如哈维所说的那样，地理学可以从美学和文学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反之亦然，美学和文学理论同样也可以从地理学或空间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以拓展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美国当代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赞誉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对都市研究、建筑学、社会理论、文学、文化研究等学科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撰写《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提出将列斐伏尔、福柯和其他思想家所提出的空间理论引入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样的研究必然将“以很多不同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化分析”<sup>②</sup>。他认为全球化空间重组是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关注，将改变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维方式，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是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的。因此，“有必要在绘制任何全球空间的地图时超越经典的高雅与低俗的对立，超越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对立，代之以创造一种新的多点透视观，以考察文学和文化活动、交流和流通。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寓居其中的全球空间的复杂性和原创性有更加丰富的理解”<sup>③</sup>。

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历史决定论的强势话语统治下，传统的文学研究同样也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逻辑线索等历时性因素，空间因而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一个等待事件发生和来临的场所，一个了无生机且有待意义充填的空洞容器。19世纪末，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度推进，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验、都市景观及都市问题等进入文学艺术

---

① [美]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397～40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② [美] 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135页。

③ 同上书，147页。



创作的视阈，文学的空间性思考由此被提升到文艺理论的议事日程中。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较早从历史哲学反思的维度，关注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城市景观之间的关系，将文学艺术批评置于空间维度尤其是都市空间之中，确立了空间批评的美学路向，其主要思想体现在《拱廊研究计划》一书中。拱廊街作为19世纪盛行于巴黎的带有大玻璃顶棚的商业步行街，是现代大型购物中心的前身，是现代建筑技术打造出的繁荣的都市商业景观。在本雅明看来，拱廊街构筑了现代都市景观的典型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微缩景观。都市是一个充满辩证意象的空间，透过都市空间景观的辩证分析，可以洞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所在。辩证意象是针对黑格尔的辩证思维而提出的，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逻辑将历史编织为绝对理念的演进过程，奠定了线性历史主义的哲学根基。本雅明认为，线性的历史决定论所许诺的未来，斩断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正联系，将人类带入到同质的、虚空的历史时间之中，为此，他以当下时间为楔子，洞穿历史并爆破历史的连续性。当下时间是当下存在所充填的时间，时间弥散于当下存在的空间里，成为“时间的碎片”。时间的碎片化亦即时间的空间化，因为，“只有在空间意象中才能把握和分析以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sup>①</sup>。试图将人们从线性的历史决定论中拯救出来的本雅明提出了永恒救赎的时间概念。永恒救赎的时间既是永恒的，也是片刻的，永恒与片刻凝聚于空间，正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恒”。追逐线性的历史进步时间，会使人们遗忘当下的现实生活空间，而面向当下即是面向空间，因为当下的时间弥散于感觉经验的空间之中。《地理的想象》一书的作者德里克·格雷戈利将本雅明的方法概括为“空间化的爆破”。格雷戈利说：“本雅明试图打断这种通过叙事行为使历史均质的进程，他对其无休止地把差异压制在重复之下的做法提出了质疑。……本雅明对时间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空间

---

① 刘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2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化’，用文本实践取代了叙事编码式的历史。它打破了历史编纂学的链条，在这根链条上，各种环节要素仿佛磁铁一样紧紧地吸附在一起。”<sup>①</sup>本雅明与普鲁斯特<sup>②</sup>一样，孜孜以求的是在时间的碎片中“追忆流逝的空间”。从历史时间到当下时间，从当下时间到时间的碎片化、时间的空间化，本雅明形成了他一生所主要关注的主题，即如何把世界空间化。

本雅明对历史哲学的空间化思考，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批评，为空间化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源于超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的启发，本雅明的都市空间研究计划致力于分析都市空间经验表达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为拱廊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探究了波德莱尔的文学创作与大都市巴黎之间的紧密关联。作为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都市的现代性经验构成了波德莱尔充满悖论和张力的诗性意象。《恶之花》是19世纪大都市巴黎景观意象的审美表征，是都市辩证意象的诗化表征，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矛盾意象的辩证解析。因为，以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资本聚集和扩张，资本逻辑的空间征服，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空间的改造和拓殖扩张已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离开资本主义大都市的景观背景，就无法理解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也无法理解现代主义诸多流派和思潮所产生的真正内在动因。

其后，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以马拉美、卡夫卡、里尔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现代主义文本为分析对象，对文学的空间性进行了生存哲学意蕴的分析。布朗肖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在他看来，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也不是见证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它的

---

① 转引自[美]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224页。

② 弗兰克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提出，普鲁斯特所痴迷的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普鲁斯特知道，要体验时间的流逝，就必须摆脱时间，在他所谓的‘纯粹时间’里同时把握住过去和现在。但‘纯粹时间’显然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是空间”。参见《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03页。

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因此，文学空间是一种内在的、深度的、孤寂的、空无的体验空间，而写作正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sup>①</sup>。为此，布朗肖提出，真正的作家是“时间不在场的先知”，他们不应流连于时间表象的流淌之流中，其天命在于体验深度的生存空间，在文学空间的体验中沉入生存的渊薮之中，展示生存空间的幽深境界。布朗肖从生存论视阈出发，打破了以主客二分法为基础将空间分为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的传统局限，将空间理解为生存体验的空间，消除了空间认识论主客对立分裂的弊端。他认为外部空间局限于沉重的物质实证性，内部空间局限于抽象的意识内在性，只有生存体验的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即那空间在外部已经是精神的内在深处，而那个内在深处在我们身上是外部的实在。……这个空间与我们的内在深处一样也是事物的内在深处，以及这二者的自由交流，即那种无控制的强大的自由，不确定物的纯力量在那里体现出来”<sup>②</sup>。因此，空间体验成为我们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布朗肖认为，随着主客分立对峙的空间观念的打破，文学空间摆脱了传统文学空间只是时间在场见证的尴尬境地，“在那里所有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在那里在两个领域之间有着无限的过渡，在那里一切都在死去，但是在那里死亡是生命的知心伴侣，在那里恐惧是愉悦，在那里欢庆在悲哀，而悲哀会增光，这空间本身正是‘万物像奔向离自己最近最真实的实在那样’朝它本去之处，即最大的圆圈和不停变化的那个空间，它是诗歌的空间，是俄耳甫斯诗歌的空间”<sup>③</sup>。文学空间不再仅仅具有单纯的物理空间场所再现和心理空间意识表现的功能，它成为抵达人之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

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分析始终坚持从生存论视阈出发，将文学空间理解为人类生存的体验方式，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紧密地

---

① [法]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同上书，130页。

③ 同上书，138页。

联系为一体，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了空间生存论或空间存在论的理论旨趣，从而摆脱了主客二分的空间认识论传统。可以看出，布朗肖的空间生存论深受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但与海德格尔关注“存在与时间”的命题不同，布朗肖十分明确地关注着“存在与空间”的问题。对人所生存的空间关注本来就是现象学与存在论转向的题内应有之义。“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布朗肖关于文学空间的生存性思考，无疑更为切近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更加切近文学空间的内在本质。

继布朗肖之后，法国著名理论家巴什拉以空间化的诗学理论颠覆了长期以来时间化的文学理论传统，对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57年出版的《空间的诗学》被誉为巴什拉现象学转向的标志性作品。他的空间诗学研究致力于现象学哲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相互融合，从精神心理的层面探询空间潜隐的生存意蕴。因此，“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特别是，它几乎时时吸引着人。它把存在的一部分收拢在提供保护的范围内”<sup>①</sup>。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一书中，以诗的空间创造为文本分析，对居室、壁橱、箱子、角落、鸟巢、贝壳等微型空间进行了精神心理和生存意蕴的分析，揭示出诗意空间的生存本体论意义。巴什拉认为空间乃存在之友，空间中潜藏着生命的无意识和存在的秘密。“房屋是我们在世的一角”，“是躯体，是心灵”，它“对于思维是最伟大的一体化力量之一”。“房屋是人的第一个世界，从房屋开始，人立即成为一种价值”，所以，“若不写出房屋的历史就无法写人的无意识史”。<sup>②</sup>在巴什拉看来，此在日常生存空间是一种充盈着意象、想象、梦想、幻想的空间，是一种充盈着盎然

---

① [法] 巴什拉：《空间的诗学》，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② 引文见 [法] 巴利诺：《巴什拉传》，358～359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

童趣与诗意的空间，人凝神冥想于这宁静致远的空间中，摆脱纷乱琐碎的事件堆积的时间束缚，远离喧嚣繁杂的世界，从时间历史之维中逃逸出来，进入虚静的诗意空间。虚静的诗意空间因此具有超越世俗空间的向度，指向更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这样，从日常的生存空间到诗意的想象空间，再到虚静的宇宙空间，空间诗学的生存论意蕴和本体论意义才真正彰显出来。

巴什拉推崇空间，贬抑时间，认为真正的艺术应该中断时间、忘却历史。只有从时间与历史之中逃逸出来，人才可能进入充满想象、梦想的诗意空间，从而获得永恒宁静的生存空间。他说：“是凭借空间，是在空间之中，我们才找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而凝结下来的绵延所形成的美丽化石。无意识停留着。回忆是静止不动的，并且因为被空间化而变得更加坚固。在时间中找出回忆的位置，这只是传记所关心的问题，只和一种外在的历史有关，这种历史是用于外在用途的，用来告诉他人的。比传记深刻的解释学应该把历史从对我们的命运无作用的相连时间结构中解放出来，从而确定命运的中心。对于认识内心空间来说，比确定日期更紧要的是为我们的内心空间确定位置。”<sup>①</sup> 众所周知，以历史时间叙事为主的史诗传统是西方文学创作中最为坚固的诗学传统，所谓史诗传统是指文学作品叙事始终在一种时间维度中展开，时间性、历史性和事件性成为作品构成的核心要素。巴什拉以其空间化的诗学理论，对长期以来时间化的文学理论传统进行了颠覆性挑战。他认为，诗意的空间创造应该是一种中断时间的瞬间体验，只有中断时间，诗人才可能成为“存在的遐想者”或“宇宙的遐想者”。中断时间使诗人进入到一种非事件的情境之中，进入到一种无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光之中，“中断时间。时间不再有昨天，也不再有明天……寂静是存在本身，是世界的和世界的遐想者的存在本身。……宇宙的遐想使我们的生活进入到一种先感知的状态中”<sup>②</sup>。受象征主义思潮影响，巴什拉的

---

① [法] 巴什拉：《空间的诗学》，8页。

② 同上书，407页。

空间诗学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与中国古典美学空间意识有着息息相通的内在精神气质。诗意空间是人于静观冥想中体验存在、体认世界、体悟宇宙的一种本原生存状态。因此，诗人作为“宇宙的遐想者”，应该摆脱充满偶然繁杂事件的时间绵延之累，达到“心斋坐忘”、“空纳万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的空间化文学理论探索表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源于大规模现代都市空间生产所带来的新型空间感觉经验，是对这些新型空间经验的理论反思与总结。现代都市社会的建立和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时空结构，时间被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观所分解，时间被多重并置的视觉感官所淹没，时间被空间化，空间化的时间因此丧失了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空间转向颠覆了传统文学理论中时间性的权威垄断地位，将空间性提升到高于时间性的地位，为文学艺术研究开启了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阈。

如果说本雅明、布朗肖和巴什拉等人的空间化理论探索标志着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开启，那么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等新学科的诞生则标志着文学理论空间转向的确立和完成。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所阐发的崭新的空间化理念，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拓展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空间化思考的理论资源。

文化地理学是地理学与文化学交叉渗透融合的崭新学科，它既注重从地理角度研究文化，也注重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试图在文化与地理之间建构起互文性的阐释桥梁。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就是把文化的研究放在现实生活的特定空间场域之中，“通过文化地理学的方式，文化除了被解释为其他的东西以外，还可以被理解作为一种不同的空间、地点和景观的问题。……不能脱离文化所标出的空间、充满文化意义的地点以及文化所创造的景观来孤立地理解文化”<sup>①</sup>。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就是追问文化如何赋予空间

---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133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以意义，探究文化在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决定性意义。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空洞容器，空间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如果说传统地理学将自然地理形貌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文化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则是文化景观。文化景观这一概念几乎可以涵盖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与传统地理学相对静止的研究方法不同，文化地理学倡导的是一种动态过程的研究，注重某种文化在地域空间内的起源与成长过程，并致力于描述文化景观取代自然景观的演变过程。

文化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可追溯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以“伯克利学派”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派，其领军人物是索尔。1925 年，索尔在《景观现象学》一书中概括了文化地理学的要义，他说：“文化景观由自然景观通过文化集团的作用形成。文化是动因，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sup>①</sup>索尔认为，文化景观取代纯粹的自然景观，已构成人类地理空间的普遍过程和事实，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显然，索尔的文化景观理论是对传统“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有力反驳。环境决定论认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是一种线性的决定关系，它机械地看待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文化地理学则关注地理的文化过程和地理景观的文化性，强调文化对自然环境的型塑改造，探究地表景物所积淀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文学地理景观也就成为其关注研究的题内应有之义。随着“地理学者们对不同类别文学形式的兴趣不断增加，他们把这些形式看作是研究地理景观意义的途径”<sup>②</sup>。在文化地理学看来，文学作品的地理景观描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再现，它参与到文化地理景观的塑造过程中，成为型塑空间文化意义的主要手段。

对文化地理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集中于城市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其后期更为关注都市生活，着重分析都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如何影响

---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139 页。

②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54 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和塑造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这种将都市与人的精神生活紧密联系为一体的思考方式，可以追溯至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正是在西美尔的启示下，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发表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探讨都市与现代文明、都市与现代生活、都市与现代人等具有人文关怀的城市社会学问题。这种将都市问题与现代人精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都市文化、都市文学与都市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后的文学空间理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野。

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高科技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消费空间、虚拟空间、全球性空间表征着后现代空间的曲变、分延。20世纪80年代，在文化研究和后现代转向的带动下，新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以激进的姿态迅速崛起。后现代地理学试图重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理论，“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摆脱传统批判理论类似于监狱式的历史决定论的羁绊，借此给阐释性人文地理学的深刻思想（一种空间阐释学）留下空间”<sup>①</sup>。

与传统地理学或传统空间理论不同，当代空间理论更为关注的是文化在空间生产中所具有的意义与功能。正是一系列文化行为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意义，使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生产以物理性或地理性的空间为媒介，共同参与实施着现代性这一巨大的工程。文学作为文化的特殊样式，运用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符号化的表征空间。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文化地理学研究自然要关涉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的诸多题域，因此，文学空间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也就日益被提到空间理论研究的议程上来。

---

<sup>①</sup> [美]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2页。



## 第二章

# 空间理论的辩证思考

空间与时间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人之存在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存在，空间因此成为哲学历久弥新的反思命题，正如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一书中所说：“空间本身究竟是实在的，还只是事物的属性，这在过去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首要问题。”<sup>①</sup> 空间的辩证思考是历史上不同空间理论反思的辩证融合，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综合与扬弃。空间问题的思考必然受制于特定时代的局限，不同时代的哲学思维方式决定着空间问题的不同理解，因此，对空间理论思考的历史进行描述和梳理，有助于空间问题的合理解决。从哲学思维方式上看，人类的空间理论反思大致可描述为：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认识论；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论；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生存—实践论哲学的空间辩证思考既吸纳了空间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又克服了其局限与不足，并为空间权力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成为本书思考空间问题的哲学基础。

---

<sup>①</sup> [德] 黑格尔：《自然哲学》，4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第一节 以认识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认识论

从古希腊开始，空间的探究就已经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议题。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追问为主要特征，本体论（ontology）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离不开空间，任何存在都是空间中的存在，因而，关于存在与空间的哲学思考，自然也就成为本体论追问的重要内容。然而，空间为何物？空间究竟是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还是一种虚空性的存在？在古希腊哲学中，空间始终处于存在与非存在、实存与虚空、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悖论之中，如果说空间是一种存在，那么它就应该是可以感知经验的实体性存在，但是空间又是与一般存在物不同的存在，或者说它是一种不可直接感知经验的非存在。这些问题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悖论性难题。难怪亚里士多德一再慨叹：“空间看来乃是某种很强大又很难把捉的东西。”<sup>①</sup>

如果说本体论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存在是什么”，那么，近代哲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认识何以可能”，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说的“认识论转向”。以本体论追问为基础的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预设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分离，通常我们称之为主客二分的二元论立场。空间认识论研究建立在以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传统认识论哲学基础上，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认为存在着一个与人无关的纯粹的客观实在世界，人凭借主观的意识（理性精神或感觉经验）能够反映或认识客观的外在世界。认识世界与自身离不开主体的感觉经验和理性认知。然而，无论是理性主义依靠理性逻辑来认识世界，还是经验主义依靠感觉经验来认识世界，他们都试图通过对自身意识或经验的自识与反思来探寻人与世界的奥秘。理性主义以理性认知为第一原则，认为理性逻辑

---

<sup>①</sup>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转引自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48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是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可靠根据，只有依靠自明性的理性逻辑，明晰准确地认识自我才有可能；经验主义以感觉经验为第一原则，确信“除了感知以外，我也永不能感知到任何东西。因此，形成自我的就是这些感知的组合”<sup>①</sup>。经验唯物论强调事物存在的客观性，认为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物理事实，只要运用经验科学的认知方法就可以认识作为物理事实的空间；先验唯心论侧重空间意识的先验性、主观性研究，强调主观精神意识的第一性，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先验的意识形式或精神形式。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与人的理性认知和感官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理性空间论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感觉空间论。

对于崇尚理性主义的西方哲学传统而言，数学—几何学一直具有理性奠基的意义。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原”，致力于从数量关系与空间的几何形式结构把握世间万物的内在本原，演算推导出宇宙天体构造和运行的几何模型，由此确立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理性空间论。被誉为“几何学之父”的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可谓西方科学史的奠基之作。康德曾说：“几何学是综合地却又是先天地规定空间属性的一门科学。”<sup>②</sup>欧几里得几何学以数学逻辑建立起一种抽象的、理想的空间模型，运用不变参数的几何图形来描述空间，使二维或三维空间获得统一而固定的结构。与几何学的科学奠基同步，欧几里得几何学空间理论也从此确立起权威的解釋地位。在康德看来，我们之所以具有空间的几何学概念，源于所具有的某些先天的直观或纯粹的直观能力，这种空间的感性直观形式既不是经验的结果，也不是推理的结果，它是先天的直接被给予的。

与几何学空间论所主张的先验性或超验性不同，一些哲学家以经验主义哲学为基础，试图恢复空间的感性现实性，建立起感觉空

---

① [英] 休谟：《人性论》，6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② [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间论。与理性主义不同，经验主义从感觉经验出发，认为如果离开感知，事物的存在与否就无法判定。“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离开了感知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有运用经验科学的认知方法，才能认识作为物理事实的空间。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空间观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前者侧重从抽象方面理解空间，而后者侧重从感觉方面理解空间。近代英国经验主义代表人物贝克莱以经验论反对抽象的观念论，他认为关于时空和运动的概念只能相对于各种可感的事物来理解，它们应该是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因此，贝克莱批驳了牛顿的绝对空间论。在他看来，牛顿的错误有三个方面：第一，牛顿假设了空间在心灵之外存在；第二，绝对空间与可感事物根本无关；第三，绝对空间是用抽象的方法得出来的，而抽象的方法是错误的。总之，空间必须依靠人的感觉而存在，绝对空间概念脱离了各种可感的事物，因此是不可理解的。经验主义注重感官经验的空间思想对现代心理学产生重要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心理感觉的空间理论。经由心理学感知经验的分析和描述，空间被划分为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这种划分并未真正解决空间的悖论和分裂，人类关于空间的哲学思考与探索依然困难重重。对此，美国当代哲学家桑塔耶纳认为：“人对感觉空间和形象空间的感知、任何有关纯粹空间的几何模型，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表述自然的空间和时间方面的问题，或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它们的真正标准，这个问题只能是暂时性地或局部地得到解决，而永远也不可能完全解决。”<sup>①</sup>

应该肯定的是，空间认识论研究从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相互作用的角度求解空间之谜，揭示了空间的认识属性，提供了空间的认识论基础，对于其后的空间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空间的认识论研究由于并没有克服本体论研究所遭遇到的空间悖论，因此，其所具有的缺陷与不足也十分明显。第一，空间的两元分裂。认识论的空间研究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两元分立原则，导致

---

<sup>①</sup> [美] 桑塔耶纳：《存在的领域》，见 [美] 莫蒂斯·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主编：《西方思想宝库》，1461 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空间思考陷入空虚与实在、绝对与相对、超验与经验、理性与感性、心理与物理的割裂分离状态，使空间问题始终无法摆脱本体论所残留下来的形而上学品性。第二，空间的形而上学化。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导致空间问题最后被简化为唯物与唯心、空间是不是第一性的存在等形而上学的争辩。在认识论的视阈中，空间越来越抽象化、同质化、简约化、平面化、空洞化，即形而上学化。第三，空间哲学对科学的僭越。传统哲学建立在科学理性主义或科学实证主义之上，自诩为一切科学的科学，试图揭示或发现世界存在的普遍规律。这种自信或自大无限夸大了哲学的界限，使哲学成为所谓最高的科学，由此僭越了科学的空间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对传统物理学的挑战，空间问题的多维度思考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论哲学的时空观，宣告了形而上学时空观的无效。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中指出：“在传统意义上，‘空间’一词更多地让人联想到数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及其定理，因而它是一个抽象物：没有内容的空壳子。……至于说到各种学科对空间的研究，它们最大限度地分割了它，空间按照被简化的方法论前提而遭到随意的肢解：地理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空间。空间至多被当作一个空洞无物的领域被扫描，作为对其内容漠不关心的空壳子来看待，但它本身却是被某些秘而不宣的标准所规定：绝对的、光学的、几何学的，欧几里得的——笛卡儿的——牛顿的。我们也许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空间’，但却是把它们归拢到一个干巴巴的概念当中。”<sup>①</sup>列斐伏尔认为离开实践论视阈，空间就会成为某种悬浮于空中的抽象之物，成为形而上学研究的纯粹客体，空间因此变得神秘难解和晦暗不明。空间生产实践论的出场，才真正解决了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所面对的悖论难题，使空间研究最终摆脱几何学或物理学的科学主义局限，社会实践性成为空间特性的本体论根据。

---

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新版序言》，见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17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 第二节 以生存—实践论哲学为基础的空间生产论

对空间问题的回顾与分析表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空间理论不仅无法解决空间的悖论，反而加深了横亘在空间悖论之间的鸿沟，使空间问题陷入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空虚与实在、绝对与相对、超验与经验、理性与感性、心理与物理的分离割裂状态，空间越来越抽象化、同质化、简约化、平面化、空洞化，即形而上学化。本体论或认识论哲学的形而上学特性，使空间成为等待人去直观反映或理性认知的纯粹客体，成为超离于人、抽象于人的纯粹存在，空间因此成为一种绝对的、抽象的、永恒的、无限的、静止的实体存在或神秘存在。

马克思以实践哲学思维方式开启了西方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实践论转向。实践哲学思维方式以实践的优先性取代理论的优先性，强调人的感性生存实践的重要意义，从而开启了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与颠覆。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关注人的解放与自由，为此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人道主义”。与传统形而上学思想家不同，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及其命运的思考，始终建立在现实、感性的实践基础之上。传统形而上学将人理解为抽象的、精神的存在，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从而描述人的生存境况，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源性秘密，由此创立了生存—实践论哲学。<sup>①</sup>从生存—实践论的观点看，传统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

---

<sup>①</sup> 凸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意蕴，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生存—实践论哲学或实践—生存论哲学，是当代马克思哲学研究所提出的一种新观点，其代表性论述有邹诗鹏《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基础》、张曙光《生存哲学》、吴晓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杨学功《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问题》。参见叶汝贤、孙麾：《马克思与我们同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sup>①</sup>。与之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sup>②</sup>。传统空间理论的缺欠与不足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其根本问题在于，他们均不能从人的生存实践活动出发理解空间，而只能经验直观或超验抽象地去理解空间，只能从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割裂的立场出发来理解空间，最后，在空间悖论难以解决的两难境遇里，空间理论势必陷入神秘主义的泥淖之中。“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③</sup>传统形而上学将世界存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或机械的物质，从而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辩证联系，割裂了“自在之物”与“自为之物”的辩证联系。在空间问题上，本体论和认识论因其哲学思考的形而上学性，使“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sup>④</sup>。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看到马克思深刻而生动地揭示了从本体论超验空间、几何学认知空间到经验论感觉空间是怎样把空间抽象化、理性化、科学化 and 绝对化的。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无论是先验论，还是经验论，空间都因其形而上学性而变成与人无关的冰冷实体或神秘本体。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不同，马克思则从现实的感性活动即生产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描述出人的生存境况，揭示人的存在方式的本源性秘密。

---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③ 同上书，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传统形而上学空间理论关注超验的本体、先验的理性或抽象的物质，却遮蔽了人类世界的关怀。

马克思对人及其存在的思考，始终建立在现实、感性的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确立了生存—实践论哲学。“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sup>①</sup>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人类通过生产劳动的实践，创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在生产劳动或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一个属人的空间，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的世界。因此，空间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空间作为实践创造的产物，正是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人与动物不同，人作为具有自我意识的物种存在，不是被动地本能地盲目地顺应自然，而是在实践创造活动中，按照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并在改造过程中使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打上人的烙印，使自然成为属人的自然，成为可以观照和欣赏的审美对象。从马克思关于实践活动对象性的观点来看，正是由于人的实践的对象性活动，人与自然具有互为对象性的关系，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类懂得了自己与自然的区别。为此，人才能够通过感性的实践创造活动来改造自然、认识自然，使自然对象成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空间成为属人的社会历史空间，成为属人的世界。无论是自然空间，还是社会空间，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人类“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sup>②</sup>。马克思从生存—实践论视阈出发，突破了主客二分的传统认识论局限，认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动力源泉，正是通过实践生产活动，人类创造了属人的第二自然——即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人化的自然”，完成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因此，从实践观点看，空间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是通过人类实践被生产出来的，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空间的属人性——即空间的意义便也通过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被生产创造出来。也正基于此，空间的文学意蕴和美学意义才得以彰显。

虽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早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但在空间研究领域，传统认识论的地理学空间观念却一直主导着空间研究的视野。因而，如何从实践观点出发来看待空间问题，也就成为当代空间转向所必须解决的理论课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论引入到空间研究的领域，提出“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这一著名概念，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批判转化为空间的分析批判，开创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空间地理学派。正如美国学者迈克·迪尔在《后现代都市状况》中所说：“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加以分析的方法完全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对空间加以正确认识的话，将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重新焕发活力。”<sup>①</sup>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也高度赞誉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他说：“1968年以后，列斐伏尔围绕空间生产的‘知识’，一种切实的理论建设，从本体论、认识论到社会解放的实践，开始了批判思想本身的彻底重建工作。现在看来，这也许是20世纪最重要的批判哲学工程之一。”<sup>②</sup>列斐伏尔从三个方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生存—实践论哲学，建构出空间生产理论。

首先，列斐伏尔从马克思“自然的人化”的思想出发，提出“自然空间消逝”的理论。列斐伏尔将马克思“自然的人化”的理论思想作为建立“空间生产”理论的哲学基础，因为只有在生产实践论的哲学视阈下，才可能正确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内涵及意

---

① [美] 迈克·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6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②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55页。

义。对此，索亚概括总结说：“列斐伏尔作了如下区分：自然界是被天真地赐予的语境，而堪称‘第二自然界’的空间性，是业已转换的并在社会得到具体化的空间性，缘起于人类有目的的劳动的应用。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并成为唯物主义对空间性阐释的地理学主题和对象的，正是这种第二自然界。”<sup>①</sup>从实践观点看，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改造着整个自然世界，创造了“第二自然”，使自然成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化的自然”。因此，“自然空间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虽然它仍是社会过程的起源，自然现在已经被降贬为社会的生产力在其上操弄的物质了。……因此，社会空间总是社会的产物，但这个事实却未获认知。社会以为它们接受与转变的乃是自然空间”<sup>②</sup>。人类实践活动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所谓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是指人类通过实践创造活动，使主观意识（如人的目的、愿望、要求、理想等）转化为客观的现实的物质对象，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正是由于人的对象性活动才达到实践的感性的统一。人之存在的本源性根据和意义，不在纯粹的客体之中，也不在主观的意识世界，而在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因此，所谓纯粹的、与人无关的客观自然空间，以及精神的、观念的主观意识空间，都不过是抽象的理论设定。“我们要想摆脱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就不要再把社会的空间与社会的时间当作‘自然的’事实来看待，而必须按照某些层次等级加以规范化。也不能把它们视为文化的事实，而必须视其为产物。这就导致了空间一词的使用及其内涵的改变。我们不能把空间（以及时间）的生产看作是类似于用手工与机器而进行的某些‘物体’或‘事物’的生产，而是作为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作为社会多种活动作用与‘第一自然’如感性的资料、物质与能量之上的结果。”<sup>③</sup>在列斐伏尔看来，自然主义空间观把空间视为一种纯粹的、中立的客观物质，

---

① [美]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122页。

②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页。

③ 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178页。

空间被预设为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第一性的物质，显然，这种自然主义空间观有悖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观点。

其次，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方法，提出超越二元论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反对二元论是列斐伏尔一贯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正是由于二元论的诱惑，才导致形而上学的简化论，这种简化论把意义缩减为两个术语、概念或简单要素之间封闭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列斐伏尔在《在场与缺场：表征理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反思性思想及哲学都注重二元关系。干与湿、大与小、有限与无限，这是古希腊贤哲的分类。接着出现了西方哲学范型的概念：主体—客体、连续性—非连续性、开放—封闭等。最后则有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能指与所指、知识与非知识、中心与边缘……（但）难道永远只是两个项之间的关系吗？始终有三项关系，始终存在他者。”“既然两个项是不够的，那么终究有必要引入第三个项。”<sup>①</sup>以主客二元对立为模式的西方传统哲学直接影响了空间探讨的路径：或是从客观方面把空间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物质性存在，或是从主观方面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先验的精神理念；空间或者是可以客观测量的自然的、自在的物理实在，或者是先验直观的想象的、意识的心理表象。正是为了解决空间问题上的主客二元分裂，列斐伏尔从主客统一的实践观点出发，提出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空间的生产》就是围绕第三化展开的。他从中形成了一个空间的三元辩证法，这个三元辩证法是他在理解社会方面做出的最富创造性的贡献。”<sup>②</sup>马克思实践哲学认为，对象性生产实践活动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变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人通过实践活动达成自然与人、客观与主观的对象性统一关系。正是在人类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空间的社会实践性才得以生成确立。基于上述理解，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以社会实践空间为统一的三元辩证法：

---

① 转引自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67 页。

② 同上书，78 页。

“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易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sup>①</sup>在空间的三个领域中，客观的物理空间、主观的心理空间和实践的社会空间构成辩证统一的复杂多重性。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涉及许多空间概念，如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资本主义空间、具体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差异空间、主导空间、戏剧化空间、乌托邦空间、认识论空间、家族空间、工具空间、休闲空间、生活空间、男性空间、精神空间、想象空间、表征空间、自然空间、中性空间、有机空间、创造性空间、物理空间、多重空间、政治空间、纯粹空间、现实空间、压抑空间、感觉空间、身体空间、社会空间、社会主义空间、社会化的空间、国家空间、统治空间、城市空间、透明空间、真实空间、女性空间，等等。无疑，列斐伏尔的用意在于，通过这些纷至沓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来表达空间的复杂多重性：空间是一个具有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空间，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

最后，列斐伏尔以马克思生存—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创立了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空间实践哲学——“空间本体论”（spatial ontology），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解列斐伏尔空间实践论的关键是如何理解“空间生产”这一概念。空间生产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应理解为空间本身的生产。列斐伏尔明确地表明他所提出的“空间的生产”，是为了完成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到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转型。他说：“‘生产空间’（to produce space）是令人惊异的说法：空间的生产，在概念上与

---

<sup>①</sup> 转引自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78 页。

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是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今日，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sup>①</sup>强调空间本身的生产，其实质就是明确实践观点的空间本体论意蕴，确立实践对于空间的优先性、构成性或本源性。空间因此成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被不断生成、建构、重组。列斐伏尔以此为基础，将空间视为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平台。

从实践的观点看，空间是生产的，是社会实践创造的产物，空间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实践的。马克思认为，人在生产劳动或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的世界，即一个属人的空间。因此，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空间的属人性以及空间的意义与价值便也是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被生产创造出来。正是通过生产实践活动，人类创造了属人的第二自然，从而完成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在实践性的空间领域中，客观的物理空间、主观的心理空间和实践的社会空间构成辩证统一的复杂多重性。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空间完成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总之，实践化或实践性的空间决定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使之成为一个具有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空间。为此，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这种多重辩证的实践性空间称之为“第三空间”，由此提出著名的“第三空间”理论。在他看来，关于“第一空间”的探讨，偏重于从客观的、自然的、物质的方面来理解空间，并试图运用几何学原理建立起关于空间的形式科学；关于“第二空间”的认识，

---

<sup>①</sup>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7页。

偏重于从主观的、想象的、精神的方面来理解空间，从文化想象的地理学中获取主观的空间观念。与“第一空间”不同，“第二空间”强调主观构成性因素，主张精神优先于物质，主体优先于客体，用艺术取代科学，用想象对抗真实。而“第三空间”理论既是对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认识论的解构，又是对它们的重构。在第三空间里，主体与客体、抽象与具象、真实与想象、先验与经验、同一与差异、精神与肉体、实在与表征等诸多因素聚集统一为一体，从而弥合了第一空间偏重客观、第二空间偏重主观的二元分裂对立。正是由于空间的社会实践品格，第三空间才得以实现或完成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辩证统一，作为社会实践产物的第三空间因此具有辩证融合性和差异敞开性。

### 第三节 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

对空间问题的历史追问表明，空间认识论向空间生产论的转换，必然使空间生产与权力规训的隐秘关系显露出来，由此形成以后现代哲学为基础的空间权力论，建构起空间政治学和空间权力论的反思批判模式。

列斐伏尔建立实践生产的空间本体论的用意即在于对空间予以政治学的批判分析，将空间反思的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批判的维度上。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一文中，他反复重申：“有一种空间政治学存在，因为空间是政治的。”<sup>①</sup>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政治学的建立可以扭转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空间研究取向。科学主义空间研究模式把空间当成一种客观的、中性的对象，专注于形式空间或空间形式的客观中立研究，试图建立起一种关于空间的科学。显然，空间政治学与空间科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它

---

<sup>①</sup>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67页。

决定着不同的空间研究对象、方法和立场。在列斐伏尔的空间政治学问题域中，空间成为经济生产、政治统制与文化观念的权力斗争场域。

首先，从经济生产层面看，空间成为资本竞争的权力斗争场域。社会空间的再生产主要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sup>①</sup>。尤其是以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带来的全球性空间重组，生产出资本主义空间。“有一种资本主义的空间，亦即由布尔乔亚阶级所管理支配之社会的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通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sup>②</sup>城市的兴起与扩张成为大规模资本主义空间重组的标志性事件，城市景观的感觉欲望化源于资本生产逻辑的渗透，其中隐匿着消费意识形态的操控运作，城市空间的单向度发展导致人们生活的全面异化。因此，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需要从空间政治学的层面来展开，空间的政治学批判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从政治统制的层面看，空间成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场域。空间是政治的，空间的规划、管理、区隔、禁闭、占领无不渗透着政治权力的统制。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最具压迫性的抽象权力空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如果每个阶级都有其聚居区域，属于劳动阶级的人无疑比其他人更为孤立”<sup>③</sup>。城市的规

---

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51页。

② 同上书，49页。

③ 同上书，50页。

划、设计和建设最为典型地体现着国家权力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主导一切。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并把局部地区与全球联结在一起，在此方面，权力起了关键作用。”<sup>①</sup>庞大的社会空间网络在政治权力的编织下成为一张巨大的权力操控之网，生产出一种压迫性的空间，空间因此成为权力得以技术性运作实施的场域，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再次，从文化观念的层面看，空间成为意识形态的权力斗争场域。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观念层面上的政治意识，建立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因此当空间成为政治经济权力斗争的场域时，空间的意识形态性亦被显现出来。列斐伏尔认为：“有一种空间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为什么？因为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而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sup>②</sup>正是意识形态赋予空间以政治内涵，空间因而具有隐喻政治权力的功能。因此，“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scientific object）。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一向是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sup>③</sup>。面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空间生产和空间重组，对空间意识形态的批判是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空间意识形态的密切关注，正是为了破解资本主义权力空间的压迫性机制。

与列斐伏尔的理论旨趣相同，福柯在追问谁生产了空间，谁主宰着空间，空间是如何成为组织、监管和宰制的社会形式的过程中，对知识、权力与空间三者所构成的隐蔽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建构出权力论的空间理论。

---

① [美] 迈克·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72页。

②③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政治学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62页。



福柯的空间思考始终围绕政治权力如何运作而展开。在《权力的地理学》访谈中，他认为空间政治学研究“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分界、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看来，地理学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核心”<sup>①</sup>。福柯长久以来一直专注于空间，他说：“人们时常以空间的着魔（spatial obsession）指责我，我确实对空间迷恋着魔。但是，我认为通过它们我确实达到了我根本追寻的目标：权力与知识间可能存在的诸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等空间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sup>②</sup>福柯将时代症候的关注点从时间性焦虑转向空间性焦虑，致力于对空间的审视与解构，力图拆穿空间背后隐匿的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打开空间的隐秘世界，揭示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隐秘关联。空间作为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具体场所，一直是福柯所关注的主要对象，福柯认为，对空间进行细密的考察，更容易把握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意图，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一部完全的历史仍有待撰写成空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权力的历史——它包括从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的重大策略到细微的居住策略。”<sup>③</sup>空间在现代权力规训技术中占据着重要和关键的地位，现代社会的权力操控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来实施完成的，为此，福柯对监狱、医院、学校、工厂、街区等空间圈限（enclosure）的场域有着特殊的兴趣，他以监狱诞生的历史、精神病院诞生的历史和临床医学诞生的历史为例，对现代性发生的历史予以空间化的考察。在一系列的权力空间化勘察中，以“圆形监狱”的分析最为著名。福柯在分析考察边沁于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时提出，“圆形监狱”是现代权力统

---

① [法]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212页。

② 同上书，205页。

③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39页。

治技术空间化的典型建构。现代统治技术通过“圆形监狱”式的权力空间化建构，使权力弥散于空间的监视中，权力因此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现代权力对身体的规训技术在监视的空间中得以实施和实现。因此，离开权力的空间化分析，就无法真正透视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机制和策略，现代权力技术的内在秘密也就无法破解。福柯虽然并没有建立系统的空间理论，但他的空间化思维方式和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对当代空间理论思考特别是后现代地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 第三章

# 生存—实践论 视阈下的空间特性

马克思“自然的人化”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和索亚“第三空间”理论，超越了主观与客观、唯心与唯物、先验与经验的二元论传统形而上学立场，使空间的理论思考达到辩证统一的生存—实践论哲学高度。而生存—实践论则为本书思考空间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以生存—实践论为理论基础研究空间问题，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首先，生存—实践论所具有的辩证思考方式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研究进路，以辩证的分析描述取代“空间是什么？”的本质主义追问，将空间理解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统一体，描述空间的复杂构成及其生成流变性，避免对空间进行单一概念化的本质规定。其次，生存—实践论划定出空间研究的范围——社会文化空间，即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密切相关的空间。

在感性实践的生存境遇中，空间恢复其实践性的品格，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超验本体和自然科学的纯粹客体。正如“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实践的”一样，空间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从生存—实践论

的视阈看，社会文化空间在本质上是生产实践的产物，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建构的产物。在人类实践的空间领域，客观的物理空间、主观的心理空间和实践的社会空间构成辩证统一的复杂多重性。空间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既是实在的，又是隐喻的。人类的生产实践决定了空间的社会实践性特征，在人类实践的基础上，空间实现了物质性、社会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成为物质性、精神性和社会性的多重辩证的场域。从生存—实践论视阈出发，对生存空间的本质特性可概括为：广延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生活场域性与身体在场性的多重辩证统一。

## 第一节 广延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的统一

人类从空间所引发出的无限与有限的哲学命题，同时也成为空间无限性和空间有限性的理论规定。传统空间理论受制于本体论形而上学的局限，预设了无限与有限、绝对与相对的对立分离，使空间处于无限广袤与有限边界的割裂状态。因而，主张空间无限性的观点认为，空间是纯粹的、虚空的、无边界的、广袤无垠的；主张空间有限性的观点则认为，空间是具体的、可感的、有边界的、可测量的。

哲学源于人对宇宙世界的惊异，无限星空下，渺小有限、终将一死的人对遥远的空间和流逝的时间感到无比的神秘奇异，于是，探究宇宙人生奥秘的哲学思考便在时空的框架中展开。“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俯仰宇宙，天地悠悠，逝者如斯，忧患冥思，宇宙如何起源又是怎样构成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是怎样的？有与无、虚与实、生与死、存在与非存在、有限与无限等诸多问题，无不与时空问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哲学开始于惊异”，这是古希腊先哲对哲学的独特理解。对于古希腊先哲来说，真正的惊异

开始于人类仰望宇宙星空，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哲学开始于人类仰望宇宙星空。后来，海德格尔发挥了这一观点，认为惊异不仅是哲学的开端，惊异就是哲学本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写道：“让我们设想一下处于广阔无垠的黑暗宇宙空间的地球吧，它犹如一颗微小的沙粒，与另一颗最近的沙粒相隔不下一公里。在这颗微小的沙粒上，苟活着一群浑噩卑微的、自问聪明而发明了认识一瞬的动物。在千百万年的时间长河中，人类生命的延续才有几何？不过是瞬间须臾而已。”<sup>①</sup>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人存在于无限的宇宙时空之中，仰望浩渺的星空，幽冥深远的无限空间令人惊异、令人敬畏、令人憧憬、令人探究。在海德格尔看来，有限的存在者对于无限整体存在的追问是存在论的基本前提，存在与时间、存在与空间，乃是此在人生永恒赶赴的超越性命题。

关于空间无限性的思考可追溯至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宇宙论。古希腊哲学将无限看作宇宙的本原，其中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阿派朗”。阿派朗（Apeiron）在希腊文中原意为无限制、无界限、无规定、无定形。如果宇宙本原是无限的，那么宇宙空间也必然是无限的。其后，伊壁鸠鲁从“物体与虚空”的关系入手，指认虚空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并由此推断宇宙的无限性。他提出：“宇宙是无限的。因为有限的东西总有一个边界，而边界是靠比较才显示出来的。宇宙既然没有边界，也就没有止境，既然没有止境，也就必然是无限的，不是有限的。说宇宙无限，是从两个方面说的，一是它所包含的形体无限多；一是它所包括的虚空无限广。”<sup>②</sup>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宇宙论思想中，无限性空间无始无终，因而是永恒的、绝对的、静止的、纯粹的；无限空间无边无际，不可界限，不可测量。

与超验的形而上学空间理论不同，经验论或唯物论的空间理论

---

①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② [古希腊] 伊壁鸠鲁：《致赫罗多德的信》，见 [美] 莫蒂斯·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主编：《西方思想宝库》，1480页。

则认为，空间应该在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中来理解，即应该从方位、处所、体量、间距、边界、广延等方面来感知或理解，因此，空间具有具体可感的有限性。主张以科学实证精神来认识世界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认为：“我们还没有把握能够确定地说是否有一种虚空，无论是集于一块或者散于物体的空隙之间。但有一事我则确信无疑，即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倡导虚空说时所持的理由乃是虚妄的。”<sup>①</sup>当代德国哲学家舍勒从空间现象学的立场出发，批评了无限虚空的观点。他在《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文中指出：“空间的虚空及类似的时间的虚空，对于知觉和整个物世界的所有可能的内容，都似乎是先行的，是基础的。这样，人便一无所知地把自己的心灵的虚空视为空间和时间的一个‘无限的虚空’，仿佛即使没有任何物质存在，这个‘无限的虚空’也会依然存在似的！直到很晚的时候，科学才改正了这个自然的世界观的大错。科学说，空间和时间只是事物的秩序，只是事物位置和延续的可能性，若在空间和时间之外，独立于它们，则什么也不存在。”<sup>②</sup>经验主义者否认绝对纯粹的无限空间存在，主张从感知经验的物质关系中来理解空间，认为空间是具体可感知的具有边界性和广延性的存在，因此空间也必定是一种有限的存在。应该看到，经验主义空间理论有助于我们摆脱形而上学纯粹无限空间的抽象和虚妄，但由于其不能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来看待空间问题，空间因而最后成为单纯存放物体的空洞容器，成为有待观察的静止的纯粹的客观物理事实，空间的社会实践性或空间的人类学意义，依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中。

从生存—实践论的视阈看，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总是属人的空间，离开实践的空间和离开空间的实践，都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离开实践谈论空间只能使空间问题陷入纯粹的形而上学的虚妄。正如实践是现实感性的一样，空间同样是具体感性的。实

---

① [英] 培根：《新工具》，见 [美] 莫蒂斯·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主编：《西方思想宝库》，1454 页。

② 刘小枫主编：《舍勒文集》，1336 页，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实践性空间是指以实践主体为原点，以实践活动为边界范围，生产建构出的具体感性的有限空间。人是有限的存在物，但人又是超越的存在物，超越就是对有限的超越，同时也是对无限的企望。人处在有限的空间世界，人所仰望的星空是无限的空间，因此所谓超越也就是对有限空间的超越，同时也就是对无限空间的企望。正所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易·系辞上》），“精鹜八极，心游万仞”（陆机《文赋》）。无限空间引发人类无穷的遐想和不懈的求索。从实践观点的空间辩证法出发，我们认为无限的问题是在有限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通过不断的生产实践活动，获得征服有限、超越有限、指向无限的实践能力，使无限与有限达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在空间实践论的视阈中，有限的空间是实践的现实基础，是实践的存在场域，而无限的空间则预示着实践的可能和未来，因此空间既具有有限性，又具有无限性，空间是广袤无限性与边界有限性的辩证统一。



## 第二节 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统一

从学科划分的角度看，传统空间问题的探讨主要在地理学的视野内展开，因而地理学一直被称为关于空间的第一科学，并形成了关于空间的地理学研究方法。大卫·哈维认为传统地理学将空间自然化，空间成为可定型定量的客观事实，“空间同样被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它通过指定的常识意义上的日常含义而被‘自然化’了。它在某些方面比时间更为复杂——它具有作为关键属性的方向、地域、形状、范型和体检，以及距离——我们象征性地把它当作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可以测量并因此能被确定下来”<sup>①</sup>。在科

---

<sup>①</sup> [美]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2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学实证主义影响下，传统地理学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建造所谓客观科学的地理学模型。在相当长时期里，传统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限制了空间问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使空间始终定位于自然地理科学之中。自然科学模式下的传统地理学研究，以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以自然地理形貌作为空间研究的主要对象，将空间理解为一种客观自然的存在，空间因而成为一种有待人们去观测、度量、图绘、描述的客观自然地理环境。传统地理学过分强调空间的客观自然地理性，忽视了空间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使空间的社会历史维度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首先，传统地理学遮蔽了空间的社会性维度。传统地理学忽视空间的社会性，造成社会学与地理学的长期隔绝。一直以来，社会学家认为空间的变迁应该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空间属于自然地理的范畴，是一种先于或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客观自然。空间的自然地理性是天然给定的恒定环境，社会只能在给定的自然地理背景中展开。“现在，社会空间一词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但仍然有一种倾向，把空间当作某种固定的、不受社会实践变化影响的东西。……人们依然相信空间是一种恒定的场域，这大概与传统的地理学与绘图法有关。……尽管地图从来就不是完全精确的（因为它们用形象来固定那变动不居的现实），尽管它们是抽象地建构出来的，只能把握住偶然的情境，但人们却以为它们客观地、一劳永逸地阐述了现实。”<sup>①</sup>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通过实践生产活动，人类创造了属人的第二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完成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自然与人的统一。因此，从实践观点看，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是通过人类实践被生产出来的，空间的属人性——即空间的意义便也通过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被生产创造出来。

其次，传统地理学遮蔽了空间的历史性维度。在传统地理学看

---

<sup>①</sup> [英]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18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来，空间是一种自然地理现象，这种自然地理空间如同坚硬的大地板块，凝固恒定，亘古不变，它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客观而坚实的广阔舞台，并成为承载历史的巨大容器。历史意义在自然地理学中处于外在附属的位置，历史在广阔的地理疆域中更迭上演，但岁月荏苒，江山依旧，地理的空间长存不变。将空间处置为与人类实践无关的纯粹客体，具有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的特征。从实践的观点看，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自然地理空间已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已完全改变了空间的自然地理性，自然已摆脱了原始的自在性，而成为自为的存在。单纯的自然地理空间观，抹去了人类实践的历史痕迹，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即从历史的观点出发，空间应该被理解为不断变动、不断改造的过程，是历史的产物。因为，只有透过历史，地理空间的社会学意义才能呈现出来，反之，只有透过地理，历史空间的社会意义才可能真正地呈现出来。正如大卫·哈维所说：“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地理学，促使我们批判地反省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是什么？我们试图建立的空间和时间概念是什么？这些如何与资本主义下变化多端的时空的历史地理发生关联？一个社会主义的或对生态负责的社会的空间和时间，看起来像什么样子？由于同时对空间和时间有潜在的兴趣，历史地理学家具有无限的潜能，来反省不仅是这个或那个地方的历史和空间关系，而是整个社会生活与社会再生产变化中的时空经验之谜。”<sup>①</sup>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主旨正在于凸显空间的社会历史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为此，他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为分析对象，对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再生产之间的内在隐秘关系进行了批判性解读。经由资本主义的空间再生产和空间重组，空间不再是一种消极无为的自然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空间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成为一种消费对象，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

<sup>①</sup> [美] 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03页。

应该指出的是，与传统地理学过分强调空间的客观自然地理性紧密相关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思维方式建立于机械唯物论基础之上。“地理环境决定论”机械地看待自然地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是一种线性的决定关系，它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受此影响，文学研究也一直存在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其代表人是 19 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泰纳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其中地理环境主要指气候、土壤，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决定并形成文学艺术的不同风格。受制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文学艺术的空间研究始终难以摆脱文学与环境的线性关系束缚。马克思曾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①</sup>人与自然、人与环境、文化与地理在实践创造的对象化过程中，形成了互动的辩证关系。人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地理环境同样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离开人的实践的纯粹客观环境只能是纯粹抽象的客体。在空间实践论的视阈中，自然地理是实践活动的物质基地和空间场域，正是由于社会历史性的融入才使自然地理空间成为属人的“第二自然”空间，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空间既具有自然地理性，又具社会历史性。在实践的基础上，空间达成了自然地理性与社会历史性的辩证统一。



### 第三节 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

传统地理学“将空间处理为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一成不变的地域——一个被动和可以丈量的世界，而不是具有行动和意义的世界”<sup>②</sup>，它在遮蔽空间的社会历史性同时，也使空间的人文维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 版，第 1 卷，9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美] 爱德华·索亚：《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57 页。

度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之中。传统地理学只强调空间的自然地理属性，使空间的意义流失于冰冷刻板的客观地形地貌之中。正是为了恢复空间研究的人文性，文化地理学或人文地理学应运而生，并得到长足发展。人文地理学倡导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和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致力于探究地表景物所积淀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强调地理形成的文化历史过程，以及人的实践对自然环境的型塑改造。从地理的角度研究文化，就是把文化的研究放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场景之中，放在特定的空间场所之中，赋予文化以特定的空间形态，使文化从抽象的精神领域回落到现实世界。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地理，就是探究文化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探究文化在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和决定性意义。“作为一个概念和物理的事实，空间这一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唯一定义，这表明了其复杂性。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不是一个非物质性的观念，而是种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心理现象的化身，所以，空间的多义性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空间总是社会性的空间。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sup>①</sup>空间并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空洞容器，空间是社会文化历史的产物。随着人类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文化景观取代纯粹的自然景观，构成人类地理空间的普遍过程和事实，这决定了地理学研究的基本主题。在漫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自然景观成为文化景观或人文景观。正如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一样，空间在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改造下，成为意义生成的场所。

从空间实践或空间生产的角度看，空间不仅是人类生产实践的场域场所，它还是凝聚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对象化载体。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建构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结构，将空间区分为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维

---

① [英]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179页。

度。所谓“空间实践”，可从空间性的生产和生产性的空间两个方面来理解。空间性的生产强调空间是社会生产实践的物质场域，生产实践离不开具体的地点场域，生产实践过程也就是物质能量穿越凝聚于空间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性是生产实践物质性的具体体现。没有空间性也就没有实践的物质性。但是，“空间实践”是指空间本身的实践，不应被理解为空间中的实践。生产性的空间强调社会实践活动对自然物质空间的型塑改造，生产性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是自然空间生成为“人化的自然”的实践性空间。由“空间实践”所型塑的实践性空间是具体可感的感性物质空间，同时也是人的对象化空间。因此，“空间实践”是生产社会空间性之物质形式的过程，它既表现为人类活动、行为与经验的中介，又是它们的结果。正是由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才得以实现。所谓表征，是赋予事物以价值和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在列斐伏尔看来，所谓“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社会实践空间所凝聚积淀的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如果说，“空间实践”侧重感性经验的物质性空间（感知的），“空间表征”侧重象征想象的精神性空间（构想的），那么，“表征空间”则侧重于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合一，这种合一构成人类实际生存其中的体验性空间（体验的）。“表征空间是有生命的：它能言说。表征空间有着，例如自我、床、卧室、居所、房屋、广场、教堂、目的等情感的中心或核心。它是充盈着激情、行为、生活和暗含着时间涌动的场域。表征空间的基本性质是能动的和流动的。因此，它能够以方位性、场域性、关系性等方式被描述。”<sup>①</sup>表征空间是象征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是具体真实的空间。

传统空间理论将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分割对立，主要源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以所谓客观中性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42, 1991.

的立场看待空间，空间因此成为无价值的、与人无关的冰冷客体。然而，从实践的观点看，“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sup>①</sup>。马克思认为，人之存在的本原性根据和意义，不在纯粹的客体之中，也不在主观的意识世界，而在于人与世界所构成的对象性关系之中。所谓纯粹的、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以及意识的、观念的主观世界，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理论设定。实践的过程即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对象性活动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精神变为物质力量的过程。人通过实践活动达成自然与人、客观与主观的对象性统一关系。从空间生产实践论的角度看，“思考空间意味着思考事物和行动在‘现实’或‘表征’中的分布方法，边界的形成和运动的模式都是由文化产生的，并且成为文化建构的一部分。我们居住的空间……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②</sup>。空间生产的过程也就是文化表征的过程，也就是实践意义与价值的表征过程。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把愿望、欲求、理想、感情凝结在对象之中，改变了空间的自然属性，空间因此不再是客观中立的存在，而是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人化的自然”。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空间生产实践都应该被理解为文化表征的实践，实践生产的空间都应该具有其表征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空间是客观实在性与文化表征性的统一。



## 第四节 生活场域性与身体在场性的统一

作为人类生产实践的场所，空间总是以具体感性的方式呈现在人的面前，因此具体感性的空间存在也就是不脱离特定的地域、地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② [英]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145页。

方、地点和场所的空间存在。传统的几何学空间研究将人悬置于空间之外，使空间从特定的地域、地方、地点和场所中脱域而出，空间因此成为一个被掏空的抽象形式。从此意义上，我们大致可以把传统形而上学的理性化空间研究史描述为空间去场域化的历史。空间去场域化就是把空间（space）从特定的地点和场所（place）中分离或脱离的过程，即空间的去场域化。20世纪以来，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这种抽象的空间研究逐渐式微，人们越来越注重空间的经验性描述，强调空间的地方性或场域性，显现出反对空间去场域化倾向。反对空间去场域化的努力，致力于克服 space（空间）与 place（场域）的分离，恢复空间的地点性和场域性。一旦抛却抽象空洞的空间形式，具体而特定的空间形态就会以地域、地方、地点和场所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因此，所谓置身于空间之中，即意味着置身于某个具体特定的空间场域之中。

应该明确的是，空间场所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的生活的环境围场，不是某种简单地环绕于人类周围的坚硬的实体，它不仅是我们置身于其中并行动于其中的场域，同时也是我们行动的结果，即实践生产创造的产物。因此，恢复空间的生活场域性并不意味着将空间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存在场所，其内在动因乃在于探究空间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强调地点或地方感对于地理空间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地点……比位置这个词所包含的意义更加丰富：它是一个独特的实体，一个‘特别的整体’，它有历史和意义。地点使人们的经验和抱负具体化。它是一个应该从赋予地点以意义的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和澄清的现实。”<sup>①</sup>恢复空间的生活场域性即是恢复空间场所的社会生活意义，它有助于建构起一种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观念，有助于帮助人们透过生活场域性的空间了解生活本身的建构过程。从空间现象学的角度看，这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世界的空间，它建立起一种“日常的地理学”（everyday geographies）观念，恢复空间的地方场域性，也就是回归空间

---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146页。

的日常生活性。为此，地理学家大卫·莱针对抽象的或本质主义的地理学研究方法，提出“日常的地理学”概念，他认为必须将空间生活化、场所化和语境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生活世界的回归。因为，“对于地点的更为‘日常的地理学’的真实关注，这些地点是我们居住和劳动的地方，是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其中的房屋、街道、工厂、办公室、学校、公园、影院等等，对于这些地点我们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地方感——对这些地方如何运作的基本理解以及对于这些地点的挑剔的情感，像喜欢、不喜欢、爱、恨、接受、拒绝等等”<sup>①</sup>。日常生活构筑起空间的地平线，地方、地域、场所都是人们居住、生活和劳作的行为场域。因此，空间的地方场域化指向空间生活意义的建构，只有通过空间的地方场域性，才能透视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揭示空间的日常生活意义。

从几何学空间到生活空间的还原，从纯粹空间到场域空间的还原，并不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它最后终将回落到一个基本的原点，终将聚焦于一个原初的焦点，这个原点或焦点就是人——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因为，生活空间的回归如果缺失人这一主体，其意义与价值便无所归依。通常情况下，绘测空间需要从一个零点坐标开始，零点坐标建立起空间的原点或焦点，透过零点坐标我们获得观察空间的立足点。但是，在抽象的几何空间中，所有设定的原点或焦点都是静止固定的，而在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原点或焦点都应该发端于活动于其中的人。“数学空间的显著特性是它的同质性。在数学空间中，任何一点或任何一个方向并不比别的一点或别的一个方向更为优越；通过简单的变换，一个人能把每一个点转换为坐标零点，能把每一个方向转换成坐标轴。在生活空间中，这些规则是无效的。在生活空间中，既有依赖于生活着的人的在空间中的地位的独特坐标零点，也有着与人体联结着的独特的坐标轴系统。……生活空间必须适合于感知它的并在其中活动着的人。这种空间应当依靠以人体为基础的方向结构来考察它的上和下，前

---

①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147页。

和后，左和右。”<sup>①</sup> 在生活空间中，人才是空间坐标的零点或原点。空间原点的自然位置，只有以人的身体位置为起始点才可能建立起来。人是空间的原点，人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位性或在场性。正是身体的在场性构成空间的原点或焦点，以人为坐标零点的空间才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空间。身体构成空间的原点，它激活了空间的社会意蕴，使空间意义的生成得以可能。因此，身体的空间性或空间的身体性问题便成为回归生活空间的题内应有之义。

较早关注身体与空间问题的是法国著名现象学家梅洛-庞蒂，他在《知觉现象学》一书中提出“作为原初时空的身体”的问题，将身体作为“我们在世界中的定位”，进而提出“身体的空间性”概念。为了克服身心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梅洛-庞蒂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探寻意识发生的原初状态，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身体现象学。身体是所有意向性活动的原发之地，基本的意向性扎根于有血有肉的身体之中。正如离开感知的思维是无法想象、无法理解的一样，离开身体的感知和思维同样也是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没有肉身的思想何以可能？如果没有身体存在，就不可能谈论人对世界的感知或思维。梅洛-庞蒂认为，身体的空间性是一个存在论视阈下的命题，“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空间里，也不应该说我们的身体是在时间里。我们的身体寓于空间和时间中”<sup>②</sup>。身体的空间性并不是说身体在空间中，而是说身体属于空间、寓于空间或身体本身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sup>③</sup>“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的存在的展开，身体作为身体实现的方式。”<sup>④</sup>梅洛-庞蒂身体空间性的现象学意蕴表明：身体必定是

---

① [德] 鲍勒诺夫：《生活空间》，见刘小枫主编：《经典美学文选：现代性的审美精神》，1032页。

② [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1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③ 同上书，147页。

④ 同上书，197页。



空间性的身体，而空间也必定是身体性的空间；身体寓于空间之中，空间发端于身体；身体与空间融合为一体，二者不可分离，构成原初性的存在。“总之，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也就没有空间。”<sup>①</sup>现象学哲学和实践论哲学反对形而上学的抽象悬想，试图将哲学理论反思，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或日常生活实践的地平面。在面向生活世界的空间转向中，现象学哲学和实践论哲学几乎同时发现了身体与空间的内在关系。这一发现表明，离开身体的空间和离开空间的身体是难以想象的。离开身体的空间是游离于生活之外的形而上学空间，空间因此成为空洞而抽象的虚空，成为客观中立的容器；同样，离开空间的身体是抽象的大写的精神符号化的主体，身体只能成为脱离环境而孤立存在的主体。割裂了身体与空间的内在关联，社会生活视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便也就成为游荡于空间之外的某种理念。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也特别强调身体与空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sup>②</sup>。身体是空间性的，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从身体的空间性或空间的身体性来看，身体是空间生产的主体，是空间的原点。身体在空间中集聚展演，身体在空间中所展现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空间的建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有空间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外在客观实在的改变和地理地貌、建筑景观等物理空间的改变，而是身体居于其中的改变。因此，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身体是空间的焦点，并构成空间坐标的主轴。身体的改变即是空间的改变，反之，空间的改变亦即身体的改变。列斐伏尔认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那剥夺它与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个现实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但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于反抗性吗？斯宾诺莎说过，我们不知道身体能够做什

---

① [法]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140页。

②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170, 1991.

么？需求与欲望的基础，概念与表象的基础，哲学的主体与客体，还有更多的或更好的其他等等，一切实践的与再生产的基础：这个人类的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关系的再生产——即使不是直接公开的，也会是拐弯抹角的。”<sup>①</sup>对身体空间性或空间身体性的关注，与列斐伏尔自始至终所关注的人的异化及其解放的主题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过程中，从人的异化的批判到日常生活的批判，再到空间的批判，大写主体被改写为小写的主体，最后聚集于身体的发现，列斐伏尔完成了从主体向身体的回归，从社会向生活的回归，从历史向空间的回归，所有的回归最后都指向了人，指向了作为肉身而存在的身体的人。通过身体而思考，穿行于空间而反思，反异化的人的哲学主题最后转换为身体的微观政治学思考。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整个（社会）空间都从身体开始，不管它是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是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从空间观点看，在身体内部，感觉（从嗅觉到视觉，它们在不同的领域被区别对待）所构造的一个又一个层次预示了社会空间的层次和相互关系。被动的身体（感觉）和能动的身体（劳动）在空间里聚合。”<sup>②</sup>因此，列斐伏尔一再强调，要想改变生活，首先要改变空间。同理，要想改造身体，首先要改变空间。“空间的生产，正是开端于身体的生产。”<sup>③</sup>身体是空间的原点，是空间生产的开端，同时也是空间生产的终点和目的。从此意义上，可以说身体是空间生产的秘密所在，同时，身体也是空间转向的秘密之所在。在此，当代文化思潮中的空间转向与身体转向汇合为一体。

---

①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p. 89, 1976.

② 转引自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65 页。

③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173, 1991.

## 第四章

# 文化表征实践与 文学空间表征

从生存—实践论视阈看，空间是人类生产实践的产物，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是一个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的属人的空间。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表征，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生存问题的关怀，缺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维度，文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丧失殆尽。作为人类的文化生产活动，文学艺术是社会文化空间生产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文学艺术等文化生产活动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存意蕴与价值取向。因此，生存与空间的问题必然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题域。

空间转向在改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促使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模式发生重大转换，形成并建立起空间化的理论思考方式。在其影响下，美学理论、社会理论、文学理论与空间理论相互交叉渗透，促使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在文学与空间的互动阐释过程中得以不断展开，由此建构起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理论。文学的空间性思考，大致可概括为从空间的维度来理解文学和从文学的维度来理解空间两方面。前者基于对空间性、体验性与审美性之

间的生存论反思，将空间体验与空间意识理解为生命体验和生存意识的内在构成，致力于探究生存空间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审美空间经验的表达；而后者致力于拓展空间的体验性、审美性、想象性及表征性，探讨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方式，是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并赋予空间以特定的生命意蕴与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文学空间理论以生存—实践论美学为基点，审视生存体验、空间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及其对审美主体的影响，探寻文学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以此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第一节 空间的生存性、体验性与审美性

时间与空间是世界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任何存在总是一定时空中的存在，生命只有在时空中才得以生成与展开。对个体生命而言，生意味着时间的开始和空间的居有，而死则意味着时间的终结和空间的消逝。“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这些从古至今吟咏传诵的诗句，抒发着生命的感喟，诉说着生存的感悟。生命的体验绵延在时空之中，所有的生命体验都根植于人的时空体验。虽然，时间与空间难以分离，但随着人类历史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关注因侧重点不同而有所变化。古典时代由于人类的空间生存相对静止稳定，时间成为人们体验生存的重要形式。在瞬间中追寻永恒，在有限中追寻无限，在历史中追寻未来，这种追寻来自于人的生存经验，同时也规定着文化和文学经验的表达方式。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人类的空间改造能力日渐提高，征服空间的生产实践几乎无处不在。不仅空间本身得以不断扩展，时间的空间化也日益成为人们感受世界的主要形式。虽然，“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命题经由海德格尔提出而影响深远，但对“存在与空间”的存在论追问

同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存在与时间”是人类所执著追问的生存论问题；“存在与空间”同样是人类所置身其中的生存论问题。“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列斐伏尔）“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蒂里希）“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福柯）正如阳光普照、万物生长的天空与大地，空间是生命存在的地界，是生命绵延的场域，是生命栖息的家园。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空间总是生存性的，人总是空间性的存在者，这一界定引导我们从“存在与空间”的关系出发，探究人之存在的生存论根基，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将人理解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者，以揭示空间的生存本体论意蕴。

应该在何种意义上理解“空间的生存性”？显然，这一命题的提出，意味着将空间问题提升到生存论美学的层面进行思考。生存论美学将空间理解为生存性的存在，强调从人之存在的视阈或立场出发，看待人与空间的关系，认为理解空间存在应该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强调人的生命存在、生活存在对于空间存在的优先性、意义性及本源性。美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里希认为：“存在，就意味着拥有空间。每一个存在物都努力要为自己提供并保持空间。这首先意味着一种物理位置——躯体、一片土地、一个家、一座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它还意味着一种社会‘空间’——一种职业、一个影响范围、一个集团、一段历史时间、回忆中或预期中的一种地位，在一种价值和意义结构中的位置。不拥有空间，就是不存在。所以在生命的一切领域之中，为空间奋争都是一种存在论的必要。……没有空间，就既无呈现，也无现在。……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和终极的空间，就意味着最终的不安全。”<sup>①</sup>正如蒂里希所言，人之存在的焦虑源于“无空间性”，空间性之占领是人安身立命的前提，而空间性之丧失意味着存在之丧失。空间的奋争、空间的生产、空间的拥有、空间的体验都是一种存在论的

---

① 何光沪主编：《蒂里希选集》，1119～112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必要。因此，从“存在与空间”的视阈看，空间总是生存性的空间，空间总是人之存在的空间，是具有生存论意义与价值的属人的空间。人既是空间存在的规定者，又是空间存在的界限，空间因此具有生存论的意蕴。正是在“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互动生成中，空间的生存论意蕴才得以显现。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列斐伏尔之所以一再强调“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的命题，就在于凸显空间的生存论意义，探究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人之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在列斐伏尔影响下，索亚明确提出“人是空间性存在者”的命题。在索亚看来，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人存在于空间之中，因为“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sup>①</sup>，所以，空间的生产者是理解空间性存在的前提。空间不仅是人之存在的舞台背景，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首先应被理解为空间的生产者，而构成空间生产出发点的正是人的身体。“生产的空间性过程，开始于身体……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sup>②</sup>作为空间主体的身体规定着空间，空间因而成为人类主体建构的基地。空间主体性与主体空间性的生存论意义由此互动生成。“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的更大空间与场所，也在我们只能去理解的意义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sup>③</sup>，即人在生产塑造社会空间环境的同时，社会空间环境也在生产塑造着人。“生存的空间性”与“空间的生存性”的辩证互动构成空间生存论意蕴。

显然，只有从“人是空间性存在者”这一命题出发，理解人、存在与空间的关系，空间生存论的意蕴才能得以展开。回归空间的

---

① [美] 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7页。

②③ 同上书，7页。

生存性，即回归存在的属人性，回归生存论美学的人文关怀维度，才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对空间理解的物性化、抽象化的倾向。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人才会询问存在，领会存在。因而“此在总是我的此在”，“此在一向所是者就是我”，“若无此在生存，就无世界在此”<sup>①</sup>。存在需要领会，空间也需要领会，人正是存在与空间的领会者。领会存在与空间，意味着面对空间存在的忧患繁难，意味着沉沦于此在空间之中，空间的生存论意义正于此而展开。属人的生存性空间，是一个充满意义追求、充满感性经验、充满情感体验、充满精神超越、充满生命关怀的个性化差异世界。唯因如此，空间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生命跃动、意义充盈的生存性的世界，一个诗意栖居的审美世界。生存空间的文化表征因此具有艺术审美的意义与价值。

空间的生存性特征，决定着空间的体验性与审美性。空间体验，即人在生存空间中感受、经验、体悟到的具有意义与价值的内在生命体验。“体验”一词，英文为“experience”，德文为“erlebenis”，一般指人的经验感受，但德文词根“leben”却含有“生命”、“生活”的意思，因此，体验除却一般性的感受、经验、认识之外，还包括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即所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体验总是一种内在的生命体验。从生存—实践论视阈看，空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生产性），因此，生产实践活动应该被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实践生产的空间亦应该被理解为人类存在的生存方式和体验方式。因此，只有将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紧密地联系为一体，才能揭示出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体现出空间生存论的理论旨趣。“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文化时空观的价值体验，而这不同的价值体验又规定着不同文化的建构。……当它们见之于主体体验时，尽管二者的体验形态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又具有共同之处，也可以说是

---

① 转引自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107页。

相融之处，即它们共同规定着人生序位的价值判断。”<sup>①</sup>任何此在的存在都无力从空间中脱轨，更何况生命进程本身与空间密不可分，因此，只有从生存论美学出发，才可能真正凸显空间的生命意义及文化价值，探寻生存体验与审美体验的内在关联，挖掘空间体验对作家的审美型塑与规范，彰显空间的文学意蕴和美学意义。

空间体验决定着人的生存体验方式，同时也规定着文学艺术的生存美学体验。从生存论美学视阈看，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势必要在文化空间体验中展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文化空间观的主体体验形态，是生命的文化蕴含的自我体验。生命存在，首先是机体生存的空间现实性的存在，这种空间现实性体现为主体的视野所及与行为所及，他的视野边缘与行为边缘，也便是他的空间现实性的边缘。而文化空间现实性，又集中地体现为主体的文化视野所及与文化行为所及，正是这种文化视野所及与文化行为所及以及这两种所及而形成的文化记忆的积淀，构成主体的生命蕴含，亦即主体文化空间观的现实体验。”<sup>②</sup>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人存在于无限的宇宙时空之中，仰望浩渺的星空，幽冥深远的无限空间令人惊异、令人敬畏、令人憧憬、令人探究。有限的存在者对于无限整体存在的追问是存在论的基本前提，存在与时间、存在与空间，乃是此在人生永恒赶赴的超越性命题。空间的生存体验和哲思，开启了文学想象的无限创造空间，使文学在抚慰个体生命的同时，企望无限永恒的超越。空间体验决定了创作主体的文学空间体验，使文学审美创造获得了无限性、想象性和超越性。空间体验敞开了文学体验的无限性，作家在对无限宇宙空间的体验中，摆脱了有限空间的限制，使其对于宇宙人生，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才能洞识生命内在的深幽之处；出乎其外，才能体悟生命存在的旷远背景，追问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文学体验的无限性，说到底就是生命体验的无限性，文学作品以其无穷的想象力，

---

① 高楠：《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35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同上书，359页。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司空图），寓无限于有限之中，在有限的形象之中表达人生超越的无限追寻。

空间作为人类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对形成作家的主体体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不同作家对不同空间有着不同的体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空间形式，因而形成特定的空间体验及审美体验形式。人类在空间中体验着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及文化艺术的意义与价值。空间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空间意识，对文学理念及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空间意识作为空间体验的理性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的空间感觉，它是一种文化空间意识。它“不同于一般空间感，一般空间感是对于空间方位、空间深广度的感知，这是客观空间形态的被动认知。文化空间观则是对文化的空间形态即文化空间的理性把握。……主体的文化空间观包括文化空间的定位需求，对于特定的文化空间模式的接受，以及适宜于这一文化空间模式的思维活动和行为习惯”<sup>①</sup>。空间意识并不仅仅是关于空间的先验意识或直观反映，它具有社会历史特征。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上看，人对空间的改造表现为“空间的人化”或“人化的空间”。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同步发展的空间实践决定着文学发展的变迁。空间意识伴随重大社会历史转型对文学艺术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生存空间的转换必然给作家的艺术创造带来新的体验形式和表现样态，如前现代空间意识孕育出古典艺术的意境风格，现代空间意识生出现代主义艺术形式，后现代空间意识滋生出后现代主义艺术谱系，显现出空间意识对文学创作的整体性影响。

在原始社会，幻想空间构成文化空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当时，人的实践改造能力低下，自然对人来说是一种未知的神秘力量，人类只能依靠神话的幻想来解释世界，从而在文化中创造神话的幻想空间。幻想空间的文学创作，表达了人类试图征服空间、改造空间的强烈愿望。在农耕时代，土地空间的人工开拓和种植使人类可以

---

<sup>①</sup> 高楠：《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345页。

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安居乐业，宁静的大地与乡村成为人最主要的空间生存形式，对自然空间的感受、认识和驾驭，成为文化空间的重要内容。前现代的古典空间意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空间观念之上，古典作家在有限的、宁静的、非流动的自然空间场域中生存活动，他们的空间观念与自然大地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具有浓厚的自然乡土气息。以自然空间体验为基础，人类建构起“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学理念及“情景合一”的文化诗学。“自然山水更切近古人得之于土地的生命根本。他们更容易对自然山水进行生命的融入并视其为生命的表现。……所以，中国古代山水诗所呈现的并不仅是具体的山水景物，而是更为开阔得多的文化空间视野，其中不乏深邃的历史之思和沉重的现实之问。”<sup>①</sup>因此，以山水田园诗为代表的文学样式在古典时代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人类的空间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延拓展。人类凭借工业技术力量，使主体征服改造空间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自然空间作为被主体征服的对象，成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存在。主体力量的增强确立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形成了空间主体化的主体空间体验形式。在空间主体化的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文学关注的最主要内容，文学的叙事样态也随之变得更加复杂多样。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化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拓展，城市化空间带给人新型的都市生存经验，由此形成全球空间、都市空间、政治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诸多现代性空间意识，这些空间意识渗入并浸润着作家的主体审美经验及文学创作理念，使文学获得一种现代的书写视角及多样的艺术形式。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信息高科技的空间技术应用，使国际化大都市空间生产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当代空间形态及文化形态。后工业信息时代的空间技术化主要表现为空间的媒介化，媒介空间、虚拟空间成为人类感知空间的基本形式，表征着后现代空间意识的曲变、延异和内爆。媒介空间的生存形式

---

<sup>①</sup> 高楠：《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355页。

打破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的界限，文学的空间形式演化嬗变为虚拟变形的后现代景观。

“空间的构造以及体验空间、形成空间概念的方式，极大地塑造了个人生活和社会关系。”<sup>①</sup>每一个社会空间都是一种过程的结果，但结果并不意味着终止。作为过去行为结果的社会空间本身处于一个开放、再生产的体系之中，它一经产生即刻又发挥起束缚控制的功能，成为约束和规训个体的权力意志的代表。空间隐秘无语地操纵控制着人类的生存样态，对盘绕于复杂社会关系的个体生命而言，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些关系才能够存在。社会空间既是行为的领域，也是行为的基础。因此，文学以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为手段，生产、建构出表征性空间，它隐蔽地、无所不在地约束、控制、规范着作家的生存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生产—文学传播的全部流程。

## 第二节 表征空间与文化表征实践

从空间实践或空间生产的视阈看，空间不仅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场域，还是实践意义与价值的对象化载体。对作为社会历史文化产物的空间予以研究，就是探究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之间的内在关联，即人类物质文化生产如何赋予空间以意义，进而揭橥文化表征实践在建构型塑空间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及决定性意义。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空间三维辩证法，即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的三位一体。他认为，正是由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才得以建构。因此，在空间的三个维度中，“表征”无疑成为理解、界定空间的重要概念。如果说“空间实践”侧重感性经验的物质性

---

① [英]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180页。

空间生产，而“空间表征”是指特定的社会实践空间所凝聚积淀的构想性、观念性和象征性的意识形态空间，是一种侧重象征想象的精神性空间；那么，“表征空间”则侧重于物质性与精神性、感知与想象的合一，这种合一构成人类生存其中的体验性空间。

理解“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首先要厘清“表征”（representation）这一核心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将表征理解为赋予事物以价值与意义的文化实践活动，是一种意指实践。所谓表征是指运用物象、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的文化实践方式，这一文化实践方式通常也被称为“表征的实践”。霍尔在指认表征的实践即“指把各种概念、观念和情感在一个可被转达和阐释的符号形式中具体化”<sup>①</sup>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道：“正是通过我们对事物的使用，通过我们就它们所说、所想和所感受的，即通过我们表征它们的方法，我们才给予它们一个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我们带给它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使用事物，或把它们整合到我们的日常实践中去的方法给事物以意义。正是我们对一堆砖和灰浆的使用，才使之成为一所‘房屋’；正是我们对它的感受、思考和谈论，才使‘房屋’变成了‘家’。”<sup>②</sup>霍尔认为，对“表征”这一概念的理解历来有反映论、意向论和建构论三种路径。反映论有着将“表征”简单地理解为对客观事物再现描摹的缺陷，意向论则将其理解为主观情感意识的表达，忽视空间存在的客观构成性，而建构论作为霍尔选取的理论研究路径，克服了主客二分的理解方式，强调“表征”的文化实践性和意义建构性，即意味着将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一种文化实践或意指实践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包括物质生产在内的人类实践活动及其产品都具有“表征”性。因此，任何物质生产过程

---

① [英]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同上书，3页。

都是意义表征建构的过程。例如，家园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在其物质生产过程中，包含着人类对“家园”的情感体验与意义建构，所以家园是一个具有意义价值的文化空间，它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即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空间。

从生产实践论的角度看，“表征实践”既存在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中，又存在于精神生产实践活动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方式，“表征实践”构成人类空间生产实践的重要内容。人类空间生产实践大致可分为物质空间的生产与文化空间的生产。物质空间生产主要指，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以物质实体化为手段，对空间进行加工、生产、型塑、组织，改造空间的存在形式，进而创造生产出的新的空间形态。显然，物质空间生产所创造的空间是属人的“人化的自然”，因而是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空间，但空间的存在形态依然表现为物质实体性。例如，城市空间虽然是人所创造的“人化的空间”或“文化的空间”，但物质实体性依然是其存在的主要表现形式。与之相对，文化空间生产虽然也需要物质媒介实体，需要物质化和媒介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但其主要特征在于精神符号性，是一种想象、虚构、表意、象征、表征的符号化空间。文化空间的生产主要是指人类以精神符号为介质，通过精神生产实践，对空间进行再叙事、再想象、再隐喻、再塑造，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文化内涵，进而创造生成出符号化的文化表征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空间生产成为表征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

探寻“表征”与“空间”的关系，既是理解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建构文学空间理论的重要议题。列斐伏尔对“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概念界定，为深入理解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实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表征涉及概念化的空间……它在任何社会或任何生产方式中都是主导性空间。它趋向一种文字的和符号的系统。表征空间是通过相关的意向和符号而被直接使用的空间，是一种被占领和体验的空间。它与物质空间重叠并且对物质空间中

的物体作象征（符号）式的使用”<sup>①</sup>。因此，所谓具有表征性的空间就是一种象征想象的空间，一种体验的空间，一种符号化的空间。总之，表征空间既是充满着象征的符号化空间，同时也是充满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充满着相互纠结着的真实与想象的内容，充满着资本主义、种族主义、父权制，充满着具体的空间实践活动的空间。<sup>②</sup>

文学艺术并不是对空间的简单再现式反映，它直接参与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意蕴，成为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空间生产的表征性建构，是一个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促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产生不同的空间象征意义。例如，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花费十年时间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重建，其作为封建王朝建筑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中国的民族象征，其使用功能及象征意义均发生重大转换。文学在这一空间意义转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运用想象、象征、隐喻等手段，重建了空间的表征性，赋予天安门广场以现代性的文化内涵。其中，郭沫若的《颂北京》一诗从天安门城楼建筑的雄伟气势入手，在抚今追昔中引入革命历史和国家荣耀。“坦坦荡荡，大大方方；巍巍峨峨，正正堂堂。雄雄纠纠，磅礴磅礴；轰轰烈烈，炜炜煌煌。国风浩浩，文彩泱泱；革命壮烈，历史悠长。凤城如海，绿化汪洋；丰碑屹立，极建中央。红旗灿烂，迎风飘扬；五星闪烁，万丈光芒。天安门上，党声皇皇；多快好省，挺起脊梁。全民团结，济济翔翔；流金铄石，举国腾骧。和平共处，有纪有纲；东风永畅，天地低昂。”<sup>③</sup>作为文学空间表征，郭沫若的诗并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简单

---

①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p. 38~39, 1991.

② 参见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86、87页。

③ 郭沫若：《潮汐集》，17~1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描摹、场景再现，它在展示举国腾骧、红旗灿烂的盛况中赋予天安门广场以全新的符号意义，对于重新建构天安门的空间象征意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可见，在空间的意义发生和转换过程中，文学空间表征是赋予空间以意义或生产空间意义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之一。

当代空间理论认为，空间并不是纯粹物理学或地理学意义上的客体，它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文化空间生产是指运用文化的象征（symbol）、想象（imagination）、意指（signification）、隐喻（metaphor）等手段，对空间进行文化编码组构，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意义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过程。文学所参与的表征性空间建构作为文化表征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运用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生产出的符号化的表征空间。社会空间的文化内涵，正是文学艺术活动所赋予的，文学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因此，文学空间理论研究与传统的地域文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尽管后者也一直关注文学与空间的关系，但因受制于客体主义空间环境决定论，其研究侧重描述文学与空间环境的线性关系，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再现特定地理区域中的地域形貌、场景环境、物像景观等，由此导致对文学与空间的研究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隐秘之处，文学空间生产的真实内容因而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例如，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都市文学、乡土文学、京派、海派、东北作家群、山西作家群、荷花淀派等文学流派和作家群的分析，均侧重探讨地域环境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忽视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乃至上述文学流派的命名方式都直接源于空间地缘的简单界划，缺少表征空间建构的文化意义探究。因此，从文学空间理论视阈出发，对上述文学流派予以空间性思考，分析其如何运用象征、想象、意指、隐喻等手段，建构型塑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才能以此为基础，真正实现文学空间生产与生存体验、审美体验、空间体验的系统化研究，拓展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第三节 文化表征空间与文学表征实践

文学表征实践在文化表征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它是赋予空间以意义、建构空间表征性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实践活动。文学表征空间作为文化表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文学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媒介，以现实景观世界为对象，以思想情感为内容，运用再现、表现、想象、虚构、隐喻、象征等手段，在赋予空间以社会历史文化意义的同时，所生产出的符号化空间。当我们说空间具有文化表征意义时，表明空间不再是孤立冰冷的客体，而是蕴含着特定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的文化空间。然而，人们以怎样的方式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文化意义？或者说，人们以何种媒介为载体赋予或生产出空间的文化意义系统？从文化意义的层面看，语言无疑是赋予或生产空间表征意义的最重要媒介。因此，把握文化表征空间概念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语言、意义与表征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是把握理解文学表征空间概念的关键所在。

文学表征空间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而生产建构的具有文化意义的符号化空间。语言作为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是一种具有意指性的文化意义系统，是一种具有表征性的文化实践系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语言是具有特权的媒介，我们通过语言‘理解’事物，生产和交流意义。我们只有通过共同进入语言才能共享意义。所以语言对于意义与文化是极为重要的，它总是被看作种种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主要载体。……语言是在一种文化中表达思想、观念和情感的‘媒介’之一。因此，经由语言的表征对意义生产过程至关重要。”<sup>①</sup>语言在赋予文化以意义的同时，也赋予空间以文化的意义，并由此建构起空间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公共空间场所的命名，即是语言赋予空间以意义的最直接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城市

---

<sup>①</sup> [英]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页。



公园的建立始于租界公园。租界公园作为殖民主义的空间场所，成为歧视中国人的空间象征符号，铭刻着民族国家的耻辱。然而，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各大城市纷纷兴建起具有纪念意义的主题公园。祛除了殖民主义色彩的公园，被重新灌注以民族振兴的文化意义，成为教育引导民众、激发民族精神的表征性政治空间。在这场民族化、政治化的空间意义生产过程中，以孙中山命名的公园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城市，仅民国时期建成的中山公园就达 249 座。抗战胜利后，沈阳的千代田公园、长春儿玉公园、苏州公园、台湾台中公园等也纷纷改名为“中山公园”。作为公共领域一部分的公园因“中山”这一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而具有了明确的民族主义内涵，中山公园成为表达民族主义话语的表征空间。“显然，中山公园不仅是民族主义象征符号，也是民族主义集会、举行仪式的活动场所，民族主义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因此，中山公园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精神象征空间并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sup>①</sup>上述分析表明，语言命名在生产空间表征意义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也是文化空间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具有从世俗生活的泥潭中拯救人类的作用，还参与到空间表征的意义生产建构过程中，赋予空间以感性化的审美意义与价值，使空间的表征充满强烈的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因此，空间的意义是被生产出来，所谓的“自然空间（natural space）已经无可挽回的消逝了”<sup>②</sup>，即使自然环境也不是纯粹的地景，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有待规划和驯服的对象。正如现代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空间，不仅由街道、楼房、路灯、汽车、百货公司等物质实体设施构成，文学也参与了城市的生产、建构，并赋予空间以意义。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一书中，便以巴黎城市景观研究为重心，探究了巴黎城与法国现代主义艺术诞生的内在关联。他

---

① 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见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288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 页。

认为，1848年，由于人口增长过快、交通堵塞、垃圾成堆等原因，巴黎已经不适合人居住了。豪斯曼承担起了巴黎的改造工作。“巴黎城是以豪斯曼赋予它的形式进入这个世纪的。”<sup>①</sup>但是，在巴黎城尚未建成的数年前，“一本与巴黎规模庞大的改造工作潜在关联的书完成了……这便是梅里翁铭刻在心的巴黎图景”<sup>②</sup>。画家梅里翁的画作以艰涩、细腻和稳健的线条，刻画了“手指着天空的钟楼，向着苍穹喷吐着浓烟的工业的方尖碑，正在修葺的建筑物的神奇的手架”<sup>③</sup>等现代城市深邃而悲剧的远景，建构出一个阴郁而壮丽的巴黎。波德莱尔表现现代城市、现代生活、现代体验的现代诗歌深受梅里翁的影响。梅里翁、波德莱尔等现代艺术家凭借着超越的眼光、敏锐的体验，以表现、隐喻、象征的方式，在城市物质建设尚未完成的阶段，建构出一座符号化的、想象的巴黎城——即巴黎的意义表征空间。同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也以语言文字为媒介，为中国读者建构着西方大都市的文化想象：“芝加哥！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就想象得出这资本主义发展到极度的大都会。在它的中心，有高耸入云的摩天楼……有纵横交错的望不尽的平坦大路。火车站，大旅馆的广厅里，鲜花铺门口……浓黑的烟雾从每一个烟筒挣扎出来喷薄向四方去，铜铁的吼声震撼着每一堵坚定墙壁……”<sup>④</sup>摩天大楼、街道、车站、烟筒、机器成为现代都市的空间隐喻。现代作家正是运用这种隐喻、想象的手段，建构出充满强烈自我情感色彩和象征意义的都市表征空间，改变了都市空间与都市文学的线性机械关系，二者在互动生成中实现了辩证统一。

“representation”即表征、再现。在侧重客观模仿的传统反映论影响下，该词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机械的模仿，即“再现”，忽

---

①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10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9。

② 同上书，107页。

③ 郭宏安：《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集》，4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④ 施蛰存：《芝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载《现代》，1933（1）。

略了“representation”的“表征性”特征。为此，英国学者霍尔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特别强调“representation”所具有的“再现”与“表现”功能：“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在表征中，我们运用被组织为各种不同语言的符号同他人作意义交流。语言能使用符号去象征、代表或指称所谓‘现实’的世界中的各种物、人及事。但它们也能指称各种想象的事物和幻想的世界，或者指称就任何明显的意义而言都不属于我们物质世界组成部分的各种抽象观念。在语言和现实世界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反映、模仿或一对一相称的关系。……语言并不像镜子那样运作。意义是在语言范围内，在各种不同的表征系统中或通过它们而被生产出来的。”<sup>①</sup>众所周知，再现论与表现论是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两大艺术理论。再现论主张从客观现实出发，坚持艺术的客观性，将艺术比喻为一面镜子，认为艺术应客观地映照或反映生活，如实地描摹再现客观世界；表现论则主张从主观内心体验出发，坚持艺术的主观性，视艺术为情感抒泄，认为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物，是人类内在心灵世界的倾诉与表达。虽然，某些艺术作品侧重于主观情感的表现，某些艺术作品侧重于客观世界的再现，但再现与表现、客观与主观、物理与心理、真实与想象并不是截然对立、泾渭分明的两极，作品所显现的不同的审美特性，不过是因侧重点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效果。从文化表征的意义上理解，并没有纯然的表现，也没有纯然的再现。“表征”概念的提出，其意义就在于强调表现与再现、客观与主观、物理与心理、真实与想象的统一。

文学空间生产的表征性建构，是一个赋予空间以意义的过程，正是文学表征的参与使空间发生意义的转换，生成空间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在文学表征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表现与再现相互渗透融汇，共同参与了空间意义的文化建构。因此，再现性文学以写实风格所呈现的地域、场景、景象、环境等空间场域，并非客观中立的简单机械摹写。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谓客观中立的立场，只是一种

---

① [英]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28页。

表层意义上的形式技巧，其内里无不体现着创作主体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正是这种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直接参与了空间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现空间的生存美学意蕴。同样，表现性文学以主观化、情感化、意象化等方式所创造的文化想象空间，也并非是从现实世界脱域而出的纯粹的精神理念。文学艺术创作中，所谓纯粹的精神理念，只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心理意识，其意向性生成无不源自于对象世界的呈现，也正是这种对象世界的意向性呈现，建构起人与空间的互动生成，建构起空间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从文化表征的意义上，审视文学在多维视阈中所呈现的地域形貌、社会环境、城市场景、物象景观等多重叠加的空间场域，可见文学与空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再现反映，文学表征着空间、生产着空间，文学直接参与了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文性的表征性空间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与价值的内涵。长期以来，在空间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下，文学研究缺少从文化表征实践的意义上审视文学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关系的理论自觉，文学与空间被理解为一种线性决定的关系，其解读的重心放在文学与环境的客观再现与分类划分上，忽视了文学作为文化表征性空间建构的重要作用，难以深入到空间生产的内在隐秘之处，空间表征实践的真实内容始终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解读空间表征实践的意义在于，探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文学是如何运用表现、再现、意指、想象、隐喻、象征等表征方式，对空间进行意义的编码重组，并拆穿揭破空间生产背后所隐匿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理性规训等社会历史动机，以及它对人的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文化方式、生存方式及道德价值取向所产生的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空间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场域，作为社会空间的文化表征，文学的空间生产也不可避免地被置于社会政治权力角逐的场域。正如知识、文化背后隐匿着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关系一样，社会空间生产与权力运作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的紧密共谋关

系。“空间的定位是一种必须研究的政治经济形式。”<sup>①</sup>因此，勘察文化表征实践的空间生产过程，首先需要空间政治学批判的介入。空间政治学批判，致力于审视与解构空间背后所隐匿的社会权力关系，打开空间的隐秘处所，拆穿揭破知识、权力与空间之间的内在隐秘关系。正如福柯在《空间、知识与权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sup>②</sup>空间在现代权力规训中占据着重要和关键的位置，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知识话语与权力运作正是通过空间的组织安排得以具体操作和实施。为此，福柯特别申明，一部空间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权力的历史。从此意义上说，一部文学空间表征实践的历史，同时也就是一部权力运作实施的历史。

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环境描写，并不是客观物理空间或地理空间的简单机械式再现，其中渗透着人们对于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理解。因此，无论运用表现还是再现的方式，文学运用文化表征实践方式所生产的空间总是具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表征性空间。19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提出，种族、环境、时代构成文化艺术发展的三个要素，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塑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性格及文学艺术风格；环境制约着人，环境决定着人，人是环境的产物，要实证性地考察人及其精神文化的特征，就必须勘察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因此，空间环境描写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前提背景。受泰纳的影响，19世纪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文学创作，均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在环境描写中展现环境与人物的复杂关系，探究人性构成的动因。如果说自然主义侧重于探求自然环境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决定性影响，那么现实主义则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社会本性的决定性影响。现实主义创作致力于社会环境的描写，追求在典型环境中

---

① [法]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152页。

② [法] 米歇尔·福柯：《空间、知识与权力》，见夏铸九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221页，台北，明文书局，1998。

塑造典型人物，着力探寻典型环境中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动因，并试图通过社会环境的典型描写来揭示现代社会人性形成的复杂构成。为此，巴尔扎克将《人间喜剧》的创作称为“生活场景”系列，地理空间、生活场景不仅是《人间喜剧》得以展开的背景，更是人性生成的土壤根基。他说：“我的作品有它的地理，正如它有它的谱系和它的家族，它的场所和它的物产，它的人物和它的事件一样。……因此我把我的作品划分为已经为人熟知的非常自然的部分，就是：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事生活、乡间生活……等场景。”<sup>①</sup>其后，左拉在自然主义小说创作中，也十分重视环境描写，他提出：“人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处于他所生长和生活的土壤的种种影响之下，这就是何以某种气候，某个国家，某个界限，某种生活条件，往往都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sup>②</sup>因此，“描写是限定人、完成人的某一环境的情况”<sup>③</sup>。左拉效仿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对社会环境进行了生理学的解剖分析，构思了《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长篇小说，全面展示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场景，将人性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强调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使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描写进入文本书写的范畴，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文学表征的社会历史空间。

显然，文学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性之间关系的关注重视，与资本主义空间重组重构所产生的激变动荡，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其中，文学空间表征实践渗透着人们对社会空间的理性规划和社会历史性的理解。由此可见，现代小说对空间环境的特殊专注，是以城市化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大规模空间重组的产物。列斐

---

① [法]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转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175～17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② [法] 左拉：《戏剧中的自然主义》，转引自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44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③ [法] 左拉：《论小说》，转引自上书，441页。

伏尔曾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sup>①</sup>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自然带来空间的改变。随着现代性历史进程的展开，城市化浪潮席卷全球。都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都市带给人一种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偶然、短暂、流变和分裂的现代生活。现代人在对都市景观的沉迷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都市空间经验的感觉化、片段化、复杂化消解了传统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及话语言说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学和艺术生产自然无可挽回地陷入到表达危机的窘境。一种与都市空间体验和都市生活相契合的新型叙事方式的出现成为都市文学的内在诉求。因此，沉迷于景观，还是批判地审视景观，成为都市文学置身“景观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主题。疆域、国家、乡土、家园、都市、工厂、广场、景观、身体等空间场景或符号在文学作品中的高频率出现，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中所建构的空间意义加以不断地叙述或表征，从文本内部强化了现代性空间重组与生产的意义。文学所参与建构的民族国家空间、政治权力空间、城市景观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以及身体空间等，显示出空间生产同现代社会的生产一样，是一种被策略性地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充斥着意识形态的产物。表征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是渗透着政治文化权力的场域，它无所不在地操控规训着人类的生存状态。透过空间来重新思考文学艺术创作，可以使我们对其艺术审美的内在文化动因，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一个较为独特的理解和把握。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文化表征空间的生产并不是单一、凝固不变的，它具有无限的多样性。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会生产出占主流地位的主导空间，但多种空间的文化表征经常表现为互相重叠，彼此渗透，形成“空间饱和”（詹姆逊）的复杂形态，由此构成文化表征空间的多重差异性。在随后的章节中，本书尝试运用文学空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31, 1991.

间理论，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对中国现代小说的文化表征实践进行“历史空间化”的勘察与图绘，以此呈现文化表征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复杂形貌及内在关联，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空间化解读的崭新而独特的理论视阈。



## 第五章

# 传统空间的裂变与 现代空间的重构

人类社会步入现代性历史进程以来，伴随大规模的现代化时空重组，传统时空经验的裂变破碎与崩溃瓦解，导致人的生存体验方式和文化感受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时间与空间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维度。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从“时空重组”的角度对现代社会的特点进行分析，他认为，正是由于现代时空技术的分延拓展，促动了传统社会发生结构性的变革，并导致民族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全面危机。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变革生成不同，中国现代性具有外在嵌入性特征，其“时空重组”的过程始终承受着“时空裂变”的激荡冲突。从时间维度上看，传统封闭的时间观念——天道循环的历史观，被天演进化的历史观所取代；从空间维度上看，传统封闭的空间观念——中心一统的天下观，被万国世界的全球观所取代。现代性剧烈激荡的“时空裂变”，使古老的中国无可选择地被置入其中。如何将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轨道，如何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如何界划中国的国家空间疆域，并建构起关于中国现代性社会空间的文化想象，以获得

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和文化的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历史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大主题。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使古老的中国最终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在维护捍卫本土民族文化性的同时，重新定位中国的领土疆域和空间形象。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见证了这一巨大的历史震荡与变迁，并参与到空间重组与建构的历史过程之中，成为重组、重建现代性社会空间、历史空间与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第一节 “天下”疆域的崩解与世界视阈的开启

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时段及演进过程有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观点认为，自宋代以来，中国即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殖民入侵，中国完全有可能自行走出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遗憾的是，这种推论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假设，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法假设的。在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的殖民化过程中，古老的中国被强行拖入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嵌入性特征。“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sup>①</sup>现代性的植入使传统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正如李鸿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描述的那样：“时至今日，地球诸国通行无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sup>②</sup>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与日常生活结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转引自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3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构，同时也动摇了沿袭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是在“地球诸国通行无阻”的前提下来谈“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所谓“地球诸国通行无阻”描述的正是现代时空技术所带来的全球性“时空重组”的历史过程。可见，从时空重组的层面上来表述中国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是理解中国巨大变革的重要视阈之一。时空观念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亦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传统时空观念的崩解破碎，现代时空观念的嵌入生成，是一个从“时空裂变”到“时空重组”的过程。在裂变与重组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体验传统空间的裂变与危机，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开始重新考量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虽然，西方现代性植入所导致的传统中国的瓦解，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来理解和表达，但由于缺少空间维度，上述理解和表达，或归于历史叙事的宏大描述，或流于思想观念形态的逻辑演进，现代时空巨变的具体内容却被遮蔽、遗忘。从“时空重组”的视阈表述、理解现代时空巨变，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巨变震荡所带来的切身感受与体验入手，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近现代以来翻天覆地的时代巨变，返还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历史现场，对历史的真实情境有更为深入具体的表述和理解。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以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对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译介与接受，作为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标志性事件。这种注重从历史时间层面考察现代性的思考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过渡历史化”的现代性解释模式，使其在突出时间维度的同时，忽视或遮蔽了空间维度在现代性生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与时间观念相比，对古老的中国而言，传统空间观念崩解所带来的震荡危机，表现得更为直接、更为紧迫、更为切身，其主要表现为现代国家列强对中国疆域领土的侵入瓜分。“清末民初的主流思维一直明确地认为，中国近代的受挫只应从自身内部因素找原因，在自强变革上努力，列强侵侮中国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照严复介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国家、种族的优胜劣

汰原本是永恒的‘天演’法则。然而，人们一旦将中国的近代遭遇放入世界空间，从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扩张来观察时，优胜劣汰的客观面目顿时丧失，中国问题的解释变得与等级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不可分割了。”<sup>①</sup>地理空间的拓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空间因此成为现代性全球化推进所必须争夺的场域。从此意义上说，殖民侵略和世界大战都可以从领土空间的争夺上加以表述和理解。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此称之为“现代空间战”。鲍曼认为现代空间战是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空间的清晰性，即透明性，已成为了现代国家争夺绝对主权之战的主要赌注之一。……因此，现代化工程之一的决定性特征就是以重组空间的名义打一场旷日持久之战。这场重大战役的赌注就是赢得控制地图绘制式的主动权”<sup>②</sup>。现代性的殖民嵌入必然直接导致疆域领土的争夺、割让与占领。自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列强瓜分争夺的战场，国土沦丧、商埠租让、家园入侵，这一切所导致的生存空间危机带来了空前的中国危机意识。具体而言，古老中国所产生的现代危机意识，是从疆域、领土与家园等空间意识危机开始的。或者说，正是空间危机意识直接构成中国现代性危机意识的主要内容。因此，从空间的维度特别是疆界、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的维度，即从地缘政治学的维度，来理解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过程，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现代性的特征及后来充满悖论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从人文地理学或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植入所带来的中国传统空间裂变与现代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从“天下观”到“地球观”、从“疆域空间”到“领土空间”的嬗变过程。显然，这种空间的裂变与重组，并不仅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疆域变迁，它关涉空间的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裂变与重组，关涉与地缘政治

---

<sup>①</sup> 程农：《重构空间：1919年前后中国激进思想里的世界概念》，见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26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sup>②</sup> [英]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2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等一系列观念的震荡冲击，还关涉空间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建构。也就是说，空间的裂变与重组带来了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改变，同时也促动了文化观念的全面变革。

远古时期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识十分有限，面对浩渺无垠的宇宙星空，人类只能凭借有限的经验和想象对其加以把握和解释，并由此形成了古老久远且源远流长的古代地理学传统观念。中国古代传统地理学观念建立在“天圆地方”的宇宙空间模型之上，认为天如穹隆而地为四方，天主动而地主静，中国居四方之中心。这种传统地理观念强调地理空间与帝国政治之间的联系，以此建立起王朝政治地理学，并从中推演出一系列王权统治观念，例如《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土思想。贾谊在《过秦论》中也提出“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政治理想。自秦统一后，天朝帝国威服四海的地缘政治意识逐渐衍化为一种牢不可破的国家观念和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层面上，普遍认为地球是平面的，中国居于中央。这种地理中心感有与之相应的政治观，即在一个安排恰当的世界中，中国将是权威的终极源泉。最后，这一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它相信中国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是人类永久的合理性。中国的标准就是文明的标准；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国人。”<sup>①</sup>天朝帝国式的宇宙空间模型，所建立的“天下观”就是中国中心论，即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居于中心的天朝帝国拥有至上的统治权力，而居于四方边缘的是臣属蛮夷，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夏夷”关系：边缘必须臣服于中心，蛮夷必须朝贡于帝国。中国中心思想，虽经几千年王朝更迭，江山易主，却丝毫不曾改变。正是这种天下中心意识，导致自大自尊的传统文化心理，使中国误解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无法摆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由此形成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帝国意识

---

① [美]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形态。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坚船利炮彻底摧毁了中国中心的幻象，使中国在痛苦中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是世界中的中国。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的痛苦嬗变，使中国在被迫纳入世界历史的同时，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正视、考量中国在世界版图中的定位。它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标志事件，构成了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地表。

与中国古代地理学不同，近代西方地理学观念以“地球说”为中心，认为地球是宇宙天体中不停运行的星球之一。早在明代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就已将“地球说”介绍到中国，但被许多中国人视为荒诞无稽之谈。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西方的地理学知识，逐渐接受了以“地球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观念。例如，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1839）、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徐继畲的《瀛环志略》（1848）等介绍西方地理学的书籍相继问世。后来，致力于推广普及“泰西之学”的晚清学人王韬编写了《西国天学源流》和《西学图说》等介绍西方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著作。王韬在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时写道：“太阳者，诸行星之心也。曷谓诸行星之心？太阳居中不动，其外辰星绕之，又其外太白绕之，又其外地球绕之，又其外荧惑绕之……又其外岁星绕之，又其外……故曰太阳为诸行星之心。地球亦绕太阳乎？曰：然。然则太阳……每日东出西没者何也？曰：此地球本体之动也。地球有绕日之动，有本体旋转之动。绕日之动所以成寒暑，本体旋转之动所以成昼夜……诸行星有本体之动乎？曰：有。西国以远镜测诸行星，见其有高低形迹，因得见其有转动也。”<sup>①</sup>对于一直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人来说，接受以地球学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思想，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清代学人杨光先在批驳“地球说”时写道：“若然则四大部洲万国之河山大地，总是一大圆球

---

<sup>①</sup> 转引自 [美]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13 页。

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sup>①</sup>杨光先固守古代地理学观念，理直气壮地批驳“地球说”，认为地球不可能是圆的，如果地球是圆的，就会有横立或倒立的人。这种观点在今天的现代人看来实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却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直至晚清，薛福成在环球游历西方之后，始信“地球说”。他说：“天圆而地方，天动而地静，此中国圣人之旧说也。今自西人入中国，而人始知地球之圆。凡乘轮舟浮海，不满七十日即可绕地球一周，其形之圆也，不待言矣。”<sup>②</sup>应该指出的是，对近代中国而言，“地球说”的引进与接受，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学科学认知过程。传统宇宙空间观念一旦被西方宇宙空间观念所取代、摧毁，其后果将直接导致中国中心意识的瓦解，进而引发传统经典观念的崩溃；另一方面，宇宙空间意识的改变，在瓦解中国传统空间观念的同时，也必将为古老中国“睁眼看世界”敞开广阔的空间。因此，与其说空间观念的变革转型具有科学史的意义，不如说空间观念的改变更具有社会历史的意蕴内涵。正如西方近代“日心说”科学发现的结果直接动摇了“上帝创造世界”的宇宙神学，为现代性思想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以“地球说”为中心的西方地理学观念对“天圆地方”的中国古典地理学观念的颠覆，不能简单的归结为一种科学思想的引进，它所带来的震荡足以导致传统帝国观念的整体崩溃。对长期封闭的中央帝国来说，中心以外是蛮夷，“地球说”的接受与验证，使中国人真实地理解了世界，真正获得了全球性的视野，最终不得不放弃“天下之中央”的封闭自大心态，开始以世界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和审视世界。

---

① 杨光先：《不得已》，转引自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5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②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499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第二节 全球空间意识与文学空间的现代性发生

从文学的空间表征层面看，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宇宙空间意识与国家空间意识的裂变与重构，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空间意识与心理空间意识的裂变与重构。宇宙空间意识是指人类关于宇宙天体空间的经验、理解与认识，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国家空间意识是指某一族种群体对于所生存的领土疆域的经验、理解与认同，其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界定“国家在世界中的位置”。围绕上述主题，不同的文化体系建构起不同的宇宙空间观念和国家空间观念，这些观念的变革直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兴起的内在动力和思想资源。

清末，为顺应时代震荡的要求，被誉为“中国知识界亲历西方第一人”的王韬在危机四起的情势下，将全球视阈的打开看作中国的机遇，提出“五洲交通，地球合一”的著名观点：“今昔异情，世局大变，五洲交通，地球合一，我之不可画疆自守也明也。”<sup>①</sup>他认为“盖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也”，只有在全球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国问题，才可能找到强盛中国的道路，正所谓“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之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sup>②</sup>。王韬的上述论说虽然仍有中国中心论的余绪，但其视野已基于全球国际的背景之中，认为全球性的境遇打开是中国富强的机遇。受王韬“地球合一、道必大同”思想影响，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去国界合大地”的世界大同乌托邦构想。虽然康有为大同理想的根基尚建立于儒、佛的传统文化之中，但其文化视野已

① 王韬：《弢园尺牋》，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 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7卷，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拓展至世界万国。此时，“中国不再是普遍礼仪的代名词，也不再是至大无外的帝国，而是地球万国之中的一个守旧的国家，一艘航行于铁舰争胜的大海之上的衰朽木船”<sup>①</sup>。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打破了“中国中心主义”，以世界中的中国为背景，重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此，汪晖提出，“康有为的儒学普遍主义以世界、以宇宙为背景，追问中国在世界和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选择的道路。……康有为不是执着于‘中国’的再定义，而是着眼于世界的再组织”<sup>②</sup>。正是全球性空间意识的发现导致了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宇宙空间意识和国家空间意识的转变不仅迫使中国重新定位自己的形象，也带来文学观念的变革，使中国文学摆脱了自大的地域封闭性，初显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意识或世界意识，进而开始了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框架体系的艰难历程。

全球空间意识的改变带来文学观念的巨变，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中国人写作的以国外游记为内容的作品出现并备受关注，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王韬的《漫游随录》，容闳的《西学东渐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徐建寅的《欧游杂录》，薛福成的《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欧游心影录》等。这些文本以日记或杂记的形式记录了异域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土人情，它们虽然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其全球空间视阈的敞开不仅击破了国人封闭保守、闭关锁国的文化心态，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还为其后《后聊斋志异图说》、《孽海花》等展演异国风情小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从政治层面上看，魏源、容闳、梁启超等在文本中试图以西方为参照，探究中国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自觉意识和启蒙文化观念。自此，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全球世界意识由“中国之世界”进入到“世界之中国”。杨度在对 19 世纪中国百年

---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752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

② 同上书，752～753 页。

大变局予以概括总结的《金铁主义说》中就曾提到,“自近数十百年以来,经西洋科学之发明……西人利用之……使我数千年闭关自守、以世界自命者,乃不得不瞿然而惊,瞠然而视。仰瞩遥天之风云,俯视大海之波涛,始自觉其向之所谓世界者非世界也,不过在世界之中为一部分而已。此世界之中,除吾中国以外,固大有国在也”<sup>①</sup>。资本主义利用现代交通工具等空间技术手段,征服了全球世界,使中国不得不放弃闭关锁国的封闭,被迫置身于殖民化的全球性空间场域之中。从疆域国土殖民化的现实空间危机到全球性空间意识的接受与认同,全球性的地缘政治观念彻底击溃了传统中国的古典地理意识,打碎了中国中心的自大幻觉。与之同步,近代文学也开始成为国人观看世界、想象世界和了解世界的窗口,文学的现代性体验与想象由此发生。

此一时期,在上述游记体作品的带动下,出现了以西洋景观为异域空间、以全球国际为场域背景的近代小说创作,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王韬的《后聊斋志异图说》(1875)、罗普的《东欧女豪杰》(1902)、李伯元的《文明小史》(1903)、曾朴的《孽海花》(1905)、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5)、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南野武蛮《新石头记》(1909)、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1912)等。

王韬在《后聊斋志异图说》之《海底奇境》、《媚梨小传》中,以浪漫奇异的中西爱情故事为核心展开叙述,中西联姻的文化想象,传达出作者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重构“地球合一”的寓言式文化理念。《海底奇境》中远赴泰西,与瑞士女郎兰娜邂逅相恋的聂祥生,在沉船赴难后,坠入桃花源式的海底乐园。在这个以乌托邦文化想象建构的空间中,二人惊喜重逢、情意缠绵、琴瑟相合,共同演绎了一段充满奇异想象的浪漫生活。《媚梨小传》以英国名门闺秀媚梨的跨国三角恋爱故事来虚构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浪漫想象,显现出作者对西方异域文化的跨语境关注及镜像式表达。其

---

<sup>①</sup>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21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后，罗普、李伯元均将小说创作置于全球化、国际化的语境中，特别是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以矛盾复杂的心态，讽刺幽默的笔法，展现了古旧中国在西方现代“文明”植入后所面临的尴尬境地。

令晚清文学家林纾“叹观止矣”的《孽海花》，以金雯青和傅彩云的情感经历为依托，囊括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以及德国、俄国等异域历史事件，构筑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蒙昧闭塞的地域空间挣脱出来，寻求强国富民的艰难历程，展示出作者广大宏阔的全球空间视阈。小说以一个充满地理空间隐喻的时代寓言开篇，“在地球五大洋之外，哥伦布未辟、麦哲伦不到的地方，是一个大大的海，叫做‘孽海’。那海里头有一个岛，叫做‘奴隶岛’。地近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十度。……那岛从古不与别国交通，所以别国也不晓得他的名字。从古没有呼吸自由的空气，那国民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是个‘自由极乐’之国。古人说得好：‘不自由，毋宁死。’果然那国民享尽了野蛮奴隶自由之福，死期到了。……谁知那一般国民，还是醉生梦死，天天歌舞快乐，富贵风流”<sup>①</sup>，“孽海孤岛”作为传统中国的空间隐喻，不但构成小说《孽海花》叙述的空间视阈，而且其文化表征拓展了晚清文学创作的思想界域，开启了近现代小说的崭新空间。其后，吴趼人和南野武蛮均将《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置于全新的空间维度展开叙事。其中，南野武蛮在《新石头记》中设计让黛玉逃离大观园，远渡美国，作者以细致的笔触书写黛玉的美国留学生活及作为日本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涯，是新都市日常生活经验的戏仿式表达。吴趼人在同名小说中，借宝玉“遁地车”、“坐飞车”，上天入地下海洋，环游“文明境界”的历程，传达出晚清市民阶层初睹西方文明及器物发明后惊异、新奇的现代性体验。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将“飘零与寻找”型叙事母题置于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性背景下展开，旨在探讨全球化空间裂变与重组给民族文化和民族身份认同带来的深刻危机。小说主

---

<sup>①</sup> 曾朴：《孽海花》，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人公三郎生于日本，长在中国，作为两种异质文化杂交的产儿，认同感的丧失与危机导致其终生处于彷徨无奈、无根飘零的生存状态。这种对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等多重认同危机的书写，隐喻着东西方文化杂错撞击的时代症候。这种全球化视阈中新乡愁、新寻根的症候式表达，在“五四”后的现代小说家笔下亦时常显现，不同的作家在文本中对如何解决认同危机进行了切己的个性化思考。苦闷沉沦的郁达夫以个体生命的消亡为代价消除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危机所产生的焦灼感、抑郁感，而冷静深刻的鲁迅在目睹中西民族文化差异时，返回民族文化内部，力图清除文化性格的劣根性因素，以重构民族、国家和个体身份的认同。此外，蹇先艾、彭家煌、王鲁彦等作家虽然创作了一系列“乡土小说”，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丑恶习俗的反思性挖掘，仍是现代性植入后，知识分子在经历认同感的丧失后，重塑民族性格获取身份认同的一种文化努力。

近代以降，宇宙空间意识或全球空间意识的开启，还推动促进了以宇宙空间为场域背景的科幻小说的繁荣。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春觞的《未来世界》、肖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等梦想环游世界、飞向太空的科幻类作品层出不穷，欧美科幻小说亦被大量译介，特别是“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的作品，“已经成为其时中国文人作家、读者大众嗜读不厌的流行题材”<sup>①</sup>。其中，由国人独自创作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以科幻奇谭的形式，书写了中国、日本、英国三国探险者，企望乘气球登月，建立月球乌托邦的科幻故事，传达了国人对宇宙空间的现代性奇异想象，明显受到凡尔纳《从地球到月球的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钟》（中文译名《月界旅行》）的启发与影响。在这个“思想与政治历经巨变的时代，科幻奇谭让国人借匪夷所思的形式，推测那似乎不可理喻、却又有端倪可寻的事物”，它的风行“暗示了晚清作者

---

<sup>①</sup>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32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与读者如何迫切地回顾或预演着国族的命运，或者思索着历史表象背后的道理”<sup>①</sup>，鲁迅在1903年翻译凡尔纳《月界旅行》的译序中便写道：“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尔后殖民星球，旅行月界，虽贩夫稚子，必然夷然视之，习不为诧。……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sup>②</sup>可见，鲁迅对科幻小说的肯定源于其有益于开启国人的心智视野，有助于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具有启蒙教化的新民意义，是对政治理念的一种戏剧化思考方式。因此，我们说，从1903年翻译《月界旅行》到1918年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的关注点看似南辕北辙，相去甚远，实则却有着紧密的现代性关联。从现代性体验发生的角度看，以《月界旅行》为代表的对理性科技（即“赛先生”）的推崇与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对国家政体民主改革（即“德先生”）的呼唤，均建立在现代性空间体验的层面上，或者说，此类小说的创作表明空间意识的现代想象已然构成中国小说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地平线。

上述文本尽管叙述主题各不相同，或试图重构“地球合一”理念，或思索强国之路，或书写现代生活体验，或探寻获取文化认同的方式，或展演戏剧化的科幻奇谭，但它们均以全球性异域空间为场域背景展开情节叙述，其意义显然并不仅仅在于渲染故事或人物的传奇色彩，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我们认为，正是晚清小说文本全球性现代空间视阈的展开，使中国文学从自我闭合的传统封闭空间中脱域而出，小说从此肩负起通过文学生产想象建构全球性空间的历史使命。全球空间的文化想象敞开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视阈。

---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294页。

②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见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近代卷，605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从此意义上看，正是全球性空间视阈的打开，才真正促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推动了现代意义上新小说的诞生。通过全球性文化空间想象，中国近代小说成为全球化空间意识生产建构的重要媒介。对此，我们有理由指认，近代小说所传达的全球性空间的文化想象及意义表征，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体验发生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说晚清的空间现代性体验主要在宇宙空间意识裂变的层面上展开，即以“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为主要问题域，以全球宇宙意识的接受认同为科学支撑，策源发动起对“天下观”的传统宇宙空间模型的颠覆，并以此开启从“中国之世界”到“世界之中国”的转型，那么，“五四”后的空间现代性体验则进一步落实到国家空间重构与民族意识重建的层面上，其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的问题。与之同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复演绎的主题变奏，虽表现为多重歧义、内在矛盾的多声部呐喊，但在世界格局中，如何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如何重构中国形象，如何重建民族意识，如何拯救文化认同及意义的危机，一直是“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诉求。近年来，随着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的深入，人们已摆脱简单化理解“五四”运动的局限，纷纷从启蒙与救亡、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多个层面，展演了“五四”时期文化思想状况的复杂性。例如，汪晖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一文中深入地分析了“五四”思想的矛盾性：“对于这些标举‘个体意识’，批判‘合群的爱国主义’的‘五四’人物来说，投身于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原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这种意识上的分裂状态是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独特现象。”随后，汪晖以鲁迅、陈独秀为例，对“五四”思想的复杂性进行了个案分析。他认为：“1907年—1908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以施蒂纳、叔本华、基尔凯郭尔和尼采的‘个人’学说为哲学背景，把‘人各有己，朕归于我’作为通达‘人国’的途径，否定了一切外在于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专制’形式：国家、道德、伦理、观念以及‘公民’和‘世界人’等类属概念。但

在《中国地质略论》和《摩罗诗力说》中，又鲜明地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五四’时期他一边斥责‘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一边担忧着‘中国人’会不会从‘世界人’中挤出。明确提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问题的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把拯救中国社会的希望瞩目于青年的自觉，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他又说：‘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力生存于世界’。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sup>①</sup>

中国现代性危机意识发生的直接策源地正是从疆域、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领域开始的，空间危机意识直接构成国家民族意识危机的核心主题。因此，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阈。“以往对现代文学的研究都过于强调作家、文本或思想内容”，缺少民族国家空间重构这一重要视阈，“在民族国家这样一个论述空间里，‘现代文学’这一概念还必须把作家和文本以外的全部文学实践纳入视野，尤其是现代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建设及其运作。这些实践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文本的生产、接受、监督和历史评价，支配或企图支配人们的鉴赏活动，使其服从于民族国家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sup>②</sup>。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从“五四”后的“新文学”，到“十七年”文学以及其后的“新时期文学”，民族国家重组重构的文化空间想象一直贯穿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制与国家抽象空间的生产一直有着内在的隐秘关

---

①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②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联。因此，从空间的维度特别是疆界、地域、领土等国家空间的维度，重返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现场，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征及充满悖论的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 第三节 跨语际实践与新小说的翻译现代性

全球空间视阈的打开，促使古老的中国摆脱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封闭文化心态，从此，全球世界空间以全新的景观呈现在古老中国的面前。国际的政治经济、万国的历史文化、西方的机械器物、异域的风土民情，构成令人惊异新奇的“西洋镜”——西方镜像。全球化在引发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的同时，也触动了跨文化交流的展开。翻译作为跨语际实践的基础性介质，在现代社会交流中发挥着桥梁般重要的功能。正如刘禾在《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一文中所言：“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采纳，盗用，及其他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sup>①</sup> 翻译在语言文本的异域与本土转换间，展示出不同国度的文化空间镜像。中国翻译的历史虽然源远流长，佛经翻译，唐代的文化融合，以及清代汉、满、蒙三种语言的互译，在古代文化交流中绵延不断，但是，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现象，中国翻译的现代性兴起则应被理解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事件。正如王德威所说：“六朝以降，西域佛学母题及叙写形式的传播；唐代中亚音乐模式的引进，对古典中国的诗词叙述，均造成深远影响。即便如此，我们仍须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面对外来冲击，是舍是得，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个‘现代的’、国际的（却未

---

<sup>①</sup> 刘禾：《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见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22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必是平等的)对话情境。”<sup>①</sup>所谓翻译的现代性,是指进入全球化世界历史以来不同文化之间的文本交流与互译。对于植入性或嵌入性的中国现代性来说,翻译是西方现代性植入中国的有效途径之一,当然,它也是中国了解世界、观看世界、介入世界的有效工具和重要窗口。随着中国文化中心幻象的彻底破灭,了解西方、汲取西方先进文化已成为求新变革的强烈愿望。与传统经典的翻译不同,现代翻译要求全面地译介西方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历史、文化、艺术,并在现代性的平台上,对本土文化进行现代性改良、改造。全球空间视阈的打开为现代翻译的兴起提出了必然要求,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主张“采西学”、“派留学”、“设议院”、“办洋务”、“制洋器”。其中,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的奏章中提出设立翻译公所;1870年,容闳上奏的青少年出洋留学教育计划获准,留学事务所成立,先后有二批留学生共计120人出国留学;1894年,马建忠上书奏折《拟设翻译书院议》,奏请朝廷设立专门的翻译机构。在奏折中他提出,中国受外强欺凌,其原因在于对外国情势“不知其情伪,不知其虚实”,欲想抵御外侮,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晚清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其中仅“林纾翻译的一百六十多种”,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斯威夫特;美国的欧文、斯陀夫人;法国的大仲马;挪威有易卜生;西班牙有塞万提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诸人”<sup>②</sup>,其盛况可见一斑。如果说,19世纪末中国近代译事之兴起是被动情况下的不得已选择,那么,随着洋务救国、师夷改良运动的展开,翻译越发成为国人的主动诉求。“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阿英早已指出,晚清的译作不在创作之下,基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目录,有论者稽考出479部创作、628部译作。近年学者陈平原就此统计,1899—1911年间,至少有615种小说曾经译介至中国;而樽本照雄近年编订的目录里,确认

---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6页。

②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16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出 1840—1911 年间,至少有 2 545 种翻译小说。狄更斯、小仲马、雨果、托尔斯泰等,均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至于畅销作家,则有福尔摩斯的创作者柯南·道尔、感伤奇情作家哈葛德,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等名列前茅。”<sup>①</sup> 上述统计数字使我们大致了解近代翻译小说的繁荣盛况。而徐念慈在 1908 年《小说林》上发表的《余之小说观》则认为上述论断尚嫌保守,他大胆推断翻译小说数量巨大,与著作小说<sup>②</sup>数量之比例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综上年所印行者计之,则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sup>③</sup>随后,他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必今之社会,向以塞聪蔽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觉大快。而于摹写今日家庭之状态,社会之现象,以为此固吾人耳熟能详者,奚事赘陈耶?此著作与翻译之观念有等差,遂至影响于销行有等差,而使执笔者,亦不得不搜索诸东西籍,以迎合风尚,此为原因之一。抑或译书,呈功易,卷帙简,卖价廉,与著书之经营久,笔墨繁,成本重,适成一反比例,因之舍彼取此,乐是不疲与?亦为原因之一”<sup>④</sup>。徐念慈以社会风尚为观察视点,从小说的观念内容、艺术形式、创作难易以及生产行销等方面,分析了著作小说与翻译小说数量上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可见,翻译小说应运繁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满足了人们探求世界空间场域的时代诉求。

从全球空间视阈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建构必然参与到世界文化的整体构架之中,脱离了全球化的空间视阈,文学现代性

---

①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3 页。

② 徐念慈《余之小说观》(1908 年)将晚清小说划分为著作小说与翻译小说;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则为之划分为创作小说与翻译小说。

③ 转引自王运熙:《中国文论选》,近代卷,404 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④ 转引自上书,404 页。

就无从谈起。中国文学只能在走向世界的征途中完成现代性的建构。因此，空间视阈的展开成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性的前提条件，其原因在于，所谓文学的现代性或世界性问题的提出，并不仅仅是思想文化层面的问题，它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空间的现代性重构重组有着内在紧密的关联，或者说，它就是现代性空间重构重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sup>①</sup>列斐伏尔更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与全球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正是资本主义市场拓展生产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空间”：“历史在世界性的层次上开展，并因之在这个层次上制造了一个空间：诸如世界市场的成型、国家及其问题的国际化，以及社会与空间之间的新关系。世界空间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其中创造出来的场域。”<sup>②</sup>因此，从全球空间视阈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及翻译现代性的发生，必须首先探究“世界空间”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及中国翻译现代性所具有的文化空间表征意义。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或世界性问题的提出，为何从一开始即与中国翻译现代性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胡适文集》记载，中国文化界首次提出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51页。

“世界的文学”这一概念的，当推 19 世纪末在欧洲从事外交活动的陈季同，其于 1898 年提出：“我们现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于一国的文学，豁然自足，该推广面参加世界的文学；既要参加世界的文学，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误会。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规模的翻译不可，不但他们的名作要多译进来，我们的重要作品，也须全译出去。”<sup>①</sup>

尽管“世界文学”观念在中国并未随陈季同的倡导而大规模展开，但从“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上看，文学现代性、翻译现代性与文学世界性的跨语际实践，自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时就是紧密相连的问题域。1902 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他在这篇堪称“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中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sup>②</sup>在对小说的重要性予以阐释时，梁启超首先强调的正是小说的世界性问题，他认为，小说之所以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在于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sup>③</sup>。1902 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发刊广告中，强调著作与译作的刊发应各占一半。但是，从其预告的二十篇作品看，其中仅有四篇为著作小说，即《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海外新中国》、《东欧女豪杰》；其他作品均为译著或编译之著，如《罗马史演义》介绍古罗马历史，《十九世纪演义》记欧洲各国大事，《自由钟》讲美国独立战争，《洪水祸》叙法国大革命，还有《亚历山大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另有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德赢摩里（莫尔）的《华严界》（《乌托邦》）、矢野文雄的《新社会》、埃留的

---

① 转引自潘正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载《文艺研究》，2007（9）。

②③ 转引自王运熙：《中国文论选》，近代卷，291 页。

《世界未来记》、凡尔纳的《海底旅行》（《海底二万里》）和作者未详的《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等。《新小说》希望借翻译来实现放眼世界、开启民智的办刊宗旨，在篇目预告上可谓尽现。1906年，警僧主编《新世界小说社报》，其发刊词以新小说与新世界之关系的辨析为结语，文中提出：“凡世界所有之事，小说中无不备有之；即世界所无之事，小说中亦无不包有之。忽而大千世界，忽而须弥世界，忽而文明世界，忽而黑暗世界，忽而强权不制世界，忽而公理大明世界：种种世界，无不可由小说造；种种世界，无不可以小说毁。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政治焉，社会焉，侦探焉，冒险焉，艳情焉，科学与理想焉，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传播文明之利器在是，企图教育之普及在是。”<sup>①</sup>其后，同盟会会员、晚清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黄世仲、黄伯耀兄弟也撰文探讨小说创作与翻译现代性之关系。1908年，黄世仲著《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部为风气之先》一文，提出：“各国民智之进步，小说之影响于社会者巨矣。……自风气渐开，一切国民知识，类皆由西方输入。夫以隔睽数万里之遥，而声气相通至如是之疾者，非必人人尽精西语，尽善西文，身历西土，考究其历史，参观其现势，而得之也；诵其诗，读其书，即足以知其大概，而观感之念悠然以生。然既非人人尽精西语，尽善西文，与尽历西土，终得如是之观感者，谓非借译本流传，交换智识，乌能有是哉？……良以开通时代，势不能不扫除隔膜者而使之交通，知其风俗，识其礼教，明其政治之源流，与社会之性质，故译书尚焉。……读群书如在一室，读小说如历全球。……自西风东渐以来，一切政治风尚，自顾皆成锢陋，方不得不舍此短以从彼长，则固以译书为引渡新风之始也。欲研究地理者，一身不能尽历全球，则惟读英书者如在伦敦，读法书者如在巴黎，读日书者如在东京矣；……若夫小说，则随时随地，皆可胪列靡遗，时之今昔，地之远近，包罗万象。作者或不能

---

<sup>①</sup> 转引自王运熙：《中国文论选》，近代卷，141页。

自知，而阅者已洞如观火，而晓然于某国某时，其地理、政治、风俗固如是也。二十年来崇拜文明，已大异于闭关时代。忽有所谓小说者，得睹其源流，观其态度，宁不心往而神移？故译本小说之功用，良亦伟矣哉！”<sup>①</sup>黄世仲认为“译书为引渡新风之始也”，其具有“交换智识”、“开通时代”、“扫除隔膜”、“尽历全球”的特殊文化功能。应该说，小说特殊的文化功能与全球空间视阈的展开有着紧密的关联，全球世界空间如此之广袤，不可能人人尽历，但借助小说译介之功力，人们可以放眼世界，如历全球，洞观寰宇。同年，其兄黄伯耀在《小说与风俗之关系》一文中进一步概括道，小说与翻译之现代兴起乃“世界现象”：“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之滥觞。文明初渡，固乞灵于译本；迄于今，报界之潮流，更趋重于小说。……或章回，或短篇，或箴政治之得失，或言教育之文野，或振民族之精神，或写人情之观感。核其大旨，要无非改良社会之风气，而引导人群之智识者为近是。……世界现象，西风输灌，人人有文明之思想，有自强之志气。”<sup>②</sup>上述诸种观点，即便在今天也可谓领风气之先，不失为超前之论。但在晚清的文化历史语境中，此观念是人们所普遍认同并趋之若鹜的时代风尚。正是基于此，才造成近代译事繁荣，小说创作蔚为大观。

面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空间的裂变与重组，翻译一直担负着中国空间现代性重建的历史文化责任。因此，从空间维度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就必须确认翻译西学在建构异域文化空间想象方面所发挥的历史意义。此外，翻译也是中国文化现代性或中国文学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前提性条件之一。这样的理解和表述无疑会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端的历史上溯至近代，改变了以“五四”为分期的现代历史断代定式。这种联通近代与现代的思路，似乎认同或呼应了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观点。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提出：“如果我们不把‘现代性’一词抬举成一个魔术

---

① 转引自王运熙：《中国文论选》，近代卷，276～278页。

② 转引自上书，268～269页。

字眼，预设种种规定与目标；如果我们仍考虑现代的历史性，以回应时代的变化，那么‘五四’所建立的中国文学之现代观就必须重新予以审视。以往现代与古典中国文学的分界必须重划。我认为，晚清，而不是‘五四’，才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sup>①</sup>需要强调的是，王德威对现代性的理解局限于文学题域，而较少涉及现代性建构的社会历史维度，导致其观点尚未深入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里，并多有武断偏差。而本书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历史空间的现代裂变与重组的嬗变过程，以此探讨现代空间重组与文化空间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指认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地缘政治学或空间政治学意义。

从空间现代性的角度看，古典空间意识的破碎与现代空间意识的重组，构成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体验发生的重要内容，是中国现代性震荡激变、痛苦挣扎的表征。古典空间意识的裂变、现代空间意识的重构，使古老的中国最终不得不睁开眼睛看世界，重新审视和确立自身在世界中的位置，并在维护捍卫本土民族文化性的同时，重新定位中国的领土疆域和空间形象，而翻译则打开了看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西方文化的引进译介，参与了现代性空间重组建构，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空间重组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

<sup>①</sup>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24页。

## 第六章

# 民族想象共同体与国家空间的建构

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空间裂变与重组，突破了单纯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疆土拓展与侵占，它不仅仅是战场疆域的争夺瓜分，也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震荡与重构，空间因此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争夺场域。民族国家的空间建构与重组将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的空间生产过程集聚一体，呈现出现代性空间生产的整体性、复杂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文学发展与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一直处于紧密缠绕、互生互动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步入现代性的复杂历史过程中，始终承担着重塑国家形象、强化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国家空间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这一文学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现代文学的发展与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刚好同步，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sup>①</sup>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

<sup>①</sup>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见唐小兵主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页。



对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维护，生产出现代性建制下最大的文化想象空间——民族国家空间，赋予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合理合法化的文化政治意义。隐藏或弥散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错综复杂权力关系的民族国家空间，在通过文化想象生产出来后，又从整体社会意识和文化管制两方面隐秘地约束和规范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乃至文学的话语方式。



## 第一节 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空间的权力统制

现代中国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形式取代了前现代社会以神权政治为基础的王朝帝国。划界领土、行使主权、统一政体、建立军队、管理文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高度统一的政体诉求，它使得现代民族国家在控制、重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建构型塑出现代性建制下最大的政治权力空间——国家空间。正如列斐伏尔所说，国家空间作为一种权力高度控制的抽象空间，是国家政治权力统制的场域，成为最具压迫性的抽象权力空间。空间的规划、管理、区隔、禁闭、侵犯、占领无不渗透着政治权力的统制。因此，“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sup>①</sup>。庞大的社会空间网络在国家政治权力的编织下成为一张巨大的权力操控之网，生产出一种压迫性的空间，空间成为权力得以技术性运作实施的场域，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进入现代性历史以来，国家权力的专制暴力本性，虽然并没有根本改变，但权力实施运作暴力的形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甚至应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明。这涉及政权的一种新的机制，它具有非常

---

<sup>①</sup>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50页。

特殊的执行程序 and 方式，赋有完全崭新的工具和手段，形成与主权完全不同质的新关系。……这样的政权主要靠规训和监督进行持续的运作，而不是靠赋税和定期的劳役进行中断性的统治。这样的政权是高度组织化的强有力的物质力量，它实行着一种新的政权经济学，通过这种经济学原则，一方面加强被统治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同时加强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和统治效力”<sup>①</sup>。在现代统制的理性化策略中，权力总是以合理合法化的身份出场，其统治形式因而变得更加曲折隐蔽，更具有欺骗性。因为，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前提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运作，权力的隐蔽是与权力无孔不入的扩散渗透同步进行的，权力的隐蔽并不是权力的退场，而是权力的弥散。

作为政治工具的国家空间是通过合理化、合法化方式建构的高度组织化社会空间，它在对前现代国家祛魅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权威性的合法地位。前现代国家依靠君权神授的思想确证其权力运作的合法性，天赋神权、天授王权，巫术、神话、宗教等从文化叙事的层面强化了人间权力出自某种神秘力量赋予的思想，因而前现代国家的统治直接表现为权力的暴虐，并导致社会沦于愚昧和黑暗的状态。现代国家对神权的祛魅是针对附着于权力身上的神秘文化力量的祛魅，它以理性的名义摧毁了传统权力的直接暴力形式，反对天赋神权，主张天赋人权，以人取代了神为世界立法，人通过理性的合理化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

民族国家建构是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是通过民族主义的文化想象来型塑完成的。现代国家要建立起有别于前现代封建帝国的高度组织化集权统一的社会，就必须寻找能够整合广大民众，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服从或屈从于一个国家意志的核心理念，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为此，许多国家在现代社会的建构之初，都选择将民族理念作为凝聚国家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

---

<sup>①</sup> [法] 米歇尔·福柯：《言论与写作》，转引自冯俊：《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4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依据的世俗化位移，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契机，如所周之，现代世俗国家的形成亦是民族国家的形成。古代社会的国家更替只是‘朝代国家’的更替，现代国家的出现，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取代了‘朝代国家’形式；朝代国家以神权政治为基础，民族国家则以民权政治为基础。在国家正当性根据的世俗化过程中，神权政治的根据被搁置，国家的立国之根据只能在此世的领域中寻找，民族的理念可以为世俗国家的主权提供正当性根据”<sup>①</sup>。现代国家将民族主义作为凝聚国家的意识形态，以民族共同体理念置换前现代国家的神授王权，为确立其政权统治提供了合理合法性依据。“在整个现代世界，民族主义都是组织和强化集体性认同的一个关键方式。民族问题和社会整合问题应该共同加以探讨。”<sup>②</sup> 因此，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国家组织和强化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

中国封建王朝帝制国家的权威性建立在天授神权的意识之上。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为基础，推演出“王权天授”的理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因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董仲舒称为“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图式，其实质就是封建帝国合理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神学。这种帝国哲学伴随封建王朝帝国的统治，统摄中国意识形态长达几千年之久。每次改朝换代，统治者都要观测天象，编造诸如梦见神龙或七彩祥云后授孕生子的神话故事，以确证其真命天子身份的合理性，证明自己的统治地位来自于“天意”、“神授”。这种“受命于天”的思想也被百姓普遍接受，锻造成为民间意识形态。陈胜吴广起义时，也不忘首先在鱼腹内偷藏朱砂所写“陈胜王”的绢帛，《水浒传》中梁山英雄的起兵造反，也不忘打起“替天行道”的大旗，都是对这种意识形

---

①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9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② [美] 克雷格·卡尔霍恩：《民族主义与市民社会：民主，多样性和自决》，见 [美] J. C. 亚历山大、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33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态的策略性采用。

进入现代历史以后，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土崩瓦解，“辛亥以后的历史表明，谁想使清朝政府复辟，或谁想公开再作皇帝，倒的确是不得人心，天下共击之的。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很快都失败。但如何在更深远的含义和内容上，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以真正战胜封建主义，革命派始终没有充分的思想武装和舆论准备”<sup>①</sup>。解决此一难题，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中国建立现代国家政体所必然选择的道路。“对于什么建构起了具有自主性的、能够自决的政治共同体这一问题，民族主义以其特定的形式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种回答以两种主要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特别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间在种族或文化上的相似性；另一是特别关注在某一特定的国家（包括在其政治活动之特定模式）中共同体成员们共有的公民身份。”<sup>②</sup>从意识形态整合上看，民族意识显然是最具聚合力、号召力的理念。无论谁想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力统治者，都必须以民族利益代言人的身份确证其权力的合法性地位。因此，进入现代历史以来，民族意识成为最具认同聚合力的文化想象物。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所提出的，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现代国家整合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国家要进行高度组织化的权力整合运作，就必须建构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中国之所以选择民族国家的道路，虽然有错综复杂的原因，但从历史渊源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儒家宗法氏族观念为现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历史依据。汉语“国家”一词由“国”和“家”两部分组成，“国家”也称“祖国”。“祖”含有祖先、祖宗、宗族的意思；另一个词“家族”也同样富有文化意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同宗同族，才能同心同德，众志成城。从“家”到“族”，再到“国”，以血缘家族关系为聚合观念的传统经由现代性的改造，成为

---

①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② [美] J. C. 亚历山大、邓正来编：《国家与市民社会》，334页。

现代性建构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国族意识。家即是族，族即是国，国即是家，家即是国。国盛家兴、国破家亡、国恨家仇、保家卫国等耳熟能详的语汇，无不表明以家为单位的氏族宗法观念与现代国家政体，可谓是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看到，国民政府开始确立中国现代性时，面临的局面是相当复杂的。长期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军阀混战割据局面，使国家难以形成一个高度组织化、极具凝聚力的整合共同体。于是，组织整合一个高度组织化、极具凝聚力的现代国家，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政治、军事、经济的高度整合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同样不可忽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进入到强化独裁统治的训政时期。从社会建制或国家政体角度看，它标志着严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性规划、设计与实施的开始，即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真正进入体制性确立时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巨大的现代性整合工程而言，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是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的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建立之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始终难以达到高度整合的状态。在以党治国的明确理念下，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现代国家的文化统治整合。1929年1月，国民党中执委决议通过了《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是与政党有关的各种宣传品必须呈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仅1929年一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查禁的各类刊物就多达270种之多。1929年6月，召开了历时5天的全国宣传会议，通过了“确定本党之文艺政策案”和“规定艺术宣传案”。议案规定：“（一）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学（为发扬民族精神，阐发民族思想，促进民生建设等文艺作品）。（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的一切文艺作品（如斫丧民族生命，反映封建思想，鼓吹阶级斗争等文艺作品）。"<sup>①</sup>对于高度组织化的国家而言，文化整合或意识形态整合也可被称为“软力量的整合”。

---

<sup>①</sup> 《全国宣传会议第三日》，载《中央日报》，1929-06-06，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与政治、军事、经济等相比，软力量表面上看似并不十分重要，但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较之于那些有形的力量，这种软力量甚至更能发挥其难以估量的作用。正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深入分析所彰显的那样，文化领导权的掌握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操控，将决定一个政体统治的基础是否牢固。文化领导权的弱化或丧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失控，将导致统治根基的颠覆和瓦解。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中从外部强行植入的，因此，民族危亡像一支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必须面对的切身性难题。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随着大规模的异族入侵，血腥而残酷的战争进一步促使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强化。面对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民族这一“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文学艺术表征的绝对主题。尽管，民族在其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是听说过他们”。但是，“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sup>①</sup>。从安德森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发现，正是“民族共同体想象”所激发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其道德的崇高性消除了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在民族共同体想象中，国统区的各家各派实现了空前的团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外族的殖民化入侵，以极端的战争形式强化了现代民族意识的重建。国民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战争的极端历史文化语境下，原子化、个人化、均质化的一盘散沙式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配合军事化集权统治。因此，如何调动民众同仇敌忾的共同体

---

①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意识，巩固社会组织化的强度，也就成为战时文化统治的首要任务。重塑民族共同体的政治需求与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所沿袭的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形成契合，国统区知识分子一改往日的忧郁、细腻和敏感，在战火中雄壮而高亢起来，文学界的个人恩怨、门户之见、派别纷争统统被搁置脑后。他们将文学写作看作是激发民众抗战激情，刺向敌人以及腐败社会肌体的枪支，在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书写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加速促成了民族国家空间的建构。因此，国统区文学既代表着该时期文学的主潮，也是现代文学运用想象、表征、隐喻等方式，参与民族国家空间建构，赋予民族国家空间以意义的一种极端性、典型性的文学样态。

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其宗旨就是要将文艺界人士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一致抗战，“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sup>①</sup>。在民族主义催生下的各种文学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慷慨赴死的爱国精神。老舍以战士自居，宣称抗战八年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sup>②</sup>，“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以为，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最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sup>③</sup>。胡风积极地倡导：“在神圣的火线后面，文艺作用不应只是空洞的狂叫，也不应作淡漠的细描，他得用坚实的爱憎真切地反映出蠢动着的生活形象。在这反映里面提高

---

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17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② 老舍：《这一年的笔》，载《大公报》，1938-07-07。

③ 老舍：《八方风雨》，载《新民报》，1946-04-04。



着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趋向民族解放的总路线。”<sup>①</sup>郭沫若的《沸羹集》、《天地玄黄》，茅盾的《时代的书录》，朱自清的《标准与尺度》，何其芳的《星火集续编》，聂绀弩的《血书》，林默涵的《狮和龙》等作品，也都没有了先前作品中轻灵俊逸或激情四射的美之赞歌，而侧重彰显公众对民族历史的关切和为挽救民族命运可以自我牺牲的崇高激情。此时，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文学所推崇的拜伦式的叛逆精神、维特式的感伤情绪、尼采式哲人的疯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癫狂病患者的迷乱，在文学中都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因为，任何远离民族国家想象的文学都难以进入文化生产的领域，势必被放置于边缘化的地位。

在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理念是建立高度组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向公众传播民族国家理念的现代文学生产，则在建立和发展现代民族国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民族国家空间的文化生产与表征，高度组织化社会的建立几乎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民族国家意识的表达、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成为现代国家建制下中国文学创作的题内应有之义。现代国家只有让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服从或屈从于一个国家意志的核心理念，才能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民族主义理念的趋同表达既符合民族危亡局势下，公众（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的政治和道德抉择，又从更加深广的层面上强化了政府的文化统治、文化征服。在现代殖民入侵的屈辱历史中，民族形象的塑造、民族文化的建构和民族国家空间的型塑，以其极端的方式完成了中国现代性国家的基本建构。



## 第二节 领土疆域的沦陷与战争意识形态的强化

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中国进入战时紧急状态，国民政府开始强

---

<sup>①</sup> 《胡风杂文集》，30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



力推行和实施现代国家的文化统治整合，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国族意识形态。以战争意识为主导，以民族救亡为主题，以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为主流的文化生产传播模式得以最终确立和完成。战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极端的事件，无论对国家群体，还是家庭个人，都将产生震撼性的强烈冲击。战争机器一旦启动，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势必被卷入其中。因为，战争改变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疆域边界，它关系到国家和个人的生死存亡，同时也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构成全面的威胁。大敌当前，一致对外，这是其后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确立的核心宗旨，国民党内部各派分歧得到暂时的统一。1933年，随着蒋介石在南京政府的核心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国民政府开始紧密围绕战争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治国方略，同时宣布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进入紧急战争状态。于是，战时经济、战时政治、战时文化等一系列战时方略和律令纷纷出台。1935年，“战国策派”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九三四年世界文坛的总清算》的文章，对当代世界战争与文化的关系作了如下的描述：“一九三四年，是世界危机的新的阶段，世界各国都陷于经济恐慌的难局，帝国主义又疯狂地竞扩军备，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因为法西斯主义之雄飞世界，各国先后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经济上，文学上，都以民族主义乃至国民主义为中心，而加以强烈的保护，干涉，管制；结局，在政治上产生了独裁制度的‘强力政治’，‘民族国家’，在经济上显现了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统制经济，集团经济，在文学上体现了发扬民族光荣代表全民利益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乃至国社文学，法西斯文学。”<sup>①</sup>“战国策派”宣称，中国已进入到一个“战国”的时代，为全面的文化统制提供理论依据，认为

---

<sup>①</sup> 林国才：《一九三四年世界文坛的总清算》，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227页。

“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实际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sup>①</sup>，这三个口号可概括为：第一个是“战”，第二个是“国”，第三个是“策”。为此，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也必须按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和程序来执行、操作与运转。“战国策派”曾旗帜鲜明地将战时文化的理念加以绝对化的表述，宣称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大战国时代”，极力主张建立战争文化，要求文艺为战争服务，使文艺成为战时宣传鼓动的机器。“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林同济在《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中认为，现时代的意义可用一字以蔽之，就是一个“战”字。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大战国时代”：战争构成现时代“最显著最重要的事实，它成为决定一切社会行为的主要标准，——社会上的一切都要逐步地向战争的影子下取得存在的根据”<sup>②</sup>，在战国时代，必须“人人皆兵，物物成械”，建立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把国家建设成“战国式”的国家，把文化建设成“战国式”的文化。战国策派的观点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同，将战争意识融入文化意识之中，用战争意识统摄文化，建立为战争服务的国防文学和国防文化，也就成为当时的必然国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中国进入全面战争的战时紧急状态。极端的战争状态，完成了极端现代性在中国的建立，一个极端集中、集体、集权的高度组织化的民族国家带着战火硝烟的胎记诞生了。文学艺术必须趋同于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型塑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战鼓号角。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确定了抗战时期的文化纲领：“建国之文化政策，即所以策进抗战之力量”，“而现阶段之中心设施，则尤应以民族国家为本位。

---

① 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271页。

②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转引自上书，261页。

所谓民族国家本位之文化，有三方面之意义，一为发扬我国固有之文化，一为文化工作应为民族国家而努力，一为抵御不适合国情之文化侵略”<sup>①</sup>。文化建设纲领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精神，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文化建设原则。传播作为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战时状态下变成了战争的宣传鼓动机器，因此，常规状态下传播的文化功能及商业功能被大幅度削减，传播不仅要承担战争信息发布传导的任务，如及时的战争新闻发布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传播必须承担起战争的宣传鼓动之能。全民参战的整体战事，必须要有全民战争总动员的宣传配合，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战争要求调动一切力量投入其中。因此，战争要求文艺为抗战鼓动宣传服务，这种要求以文艺法规法令的形式颁布，带有很强的军事强制性特征。因为，“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军事审查是最简单的屏障方式”<sup>②</sup>。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陆续颁布了《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战时新闻检查惩罚办法》、《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杂志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和《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一系列法令、法规，强化了对新闻舆论、书刊杂志等传播领域的控制。1941年，国民党中央宣部成立了下属的“文化委员会”，宣布张道藩为主任，潘公展和洪兰友为副主任，下设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科学、哲学、宗教各组。这些部门将“战时”中国文艺的监督和管理纳入“体制化”的轨道。文化委员会在《告文化界书》中强调，抗战以来，虽然文化界“为抗战建国尽最大的努力”，“不惜牺牲最大的代价”，“忍饥受冻，流血流汗”，但是“目前抗战形势已和从前不同”，所以更应该注意“民族道德的激励，社会风气的转移，民族伦理观念的革新”，“今

---

① 引文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卷，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② [美] 奥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后无论团体或个人”，都要“切实服从军令政令”<sup>①</sup>。为落实上述方针政策，国民党政府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和新闻检查局，在各省市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处和新闻检查处等文化检查机构。据不完全统计，1938年至1941年6月，被查禁的书刊有96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禁止上演的剧本有160种，1942年被封闭的报纸杂志有500种。由此可见，战时状态下，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统制力量在不断地强化。

随着现代整体战争的爆发，以国家为主体的战争机器进入到全面启动和加速运转的阶段。现代整体战的特色是全国总动员、全民总动员、全军总动员，而要实现全国、全民总动员，就绝对离不开现代文化传播媒介的介入，因此，战争机器与宣传机器的启动同步进行，有时，宣传机器的启动甚至要先于战争机器的使用。国统区时期，随着传媒被带入战时状态，传播肩负起了战争宣传鼓动的责任和义务，文学作为文化传播内容，也同样被带入战时状态。文学努力以更加激励人心鼓舞斗志的艺术形式为整个国家的战争服务。文学因此成为战争宣传鼓动的最有力的形式之一。人类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伴随着大规模、大面积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安排，伴随着现代整体战事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战火，宣传传播成为20世纪的重要问题，德国的于尔根·韦尔克甚至宣称20世纪是宣传的世纪，他说，“当20世纪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将它称为宣传的世纪几乎是并不夸张的”<sup>②</sup>，拉斯韦尔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将宣传称为“现代社会的发动机”，是现代社会的有力工具之一，并总结了现代战争与现代社会、现代战争与现代传播宣传的内在关联，拉斯韦尔指出：“过去这次大战的历史表明，现代战争必须在一个战线展开：军事战线、宣传战线、经济战线。”<sup>③</sup>在拉斯韦尔看来，通过宣传的运作机制的分析，可以揭示社会的秘密

---

① 引文见《文化运动委员会告文化界书》，载《大公报》，1942-02-07。

② 转引自[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③ 同上书，214页。

原动力。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在现代战争之中是如何被现代传播纳入到现代宣传战的体系之中的，而文学一旦成为现代战争宣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自身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宣传的世纪中，在现代战争的宣传战线中，国统区文学亦从总体上体现出宣传意识的凸显和强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文学的宣传意识。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抗战文学应时而生，并成为国统区文学的主要形式。提到抗战文学，人们有时也将其称为战争文学，其实这并不十分准确，战争文学主要指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但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可以在战争状态下创作，同时也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创作。虽然从总体上看，两种创作状态都与战争紧密相关，都以战争作为写作的背景，但内里的差别却是很大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参与度不同。相较而言，非战争状态下的战争文学写作，战争参与度弱，而战时状态下的战争文学写作则具有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投身到战场上。国统区时期的抗战文学无疑具有强烈的战争参与意识。“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成立宣言中也称：“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sup>①</sup>在战争中，作家的身份意识也随之改变，作家首先作为一名战士，以笔为刀枪，以文化为战场，投身到战火硝烟之中。《文艺阵地》的发刊辞说：“我们现阶段的文艺运动，一方面须要在各地多多建立战斗的单位，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理论，讨论问题，切磋、观摩——而同时也是战斗的刊物。”<sup>②</sup>抗战时，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各

---

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参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17页。

② 《发刊辞》，载《文艺阵地》，1938（4）。

类文学期刊的名称也直接地表达出奔赴战争前线的强烈参与意识，如《抗战》、《战线》、《前沿》、《救亡》、《烽火》、《文艺阵地》、《文艺突击》，等等。

宣传是现代社会的有力工具之一。宣传鼓动无论对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还是对“现代整体战”而言，无疑都具有明确的工具性。所谓工具性，即是指服从、服务于某种明确的功利目的，为达成某一明确的目标而实施的手段、方法和操作过程。工具性的特点是目标的确定性，但工具并不是目的本身，因此工具性具有辅助性、过程性的特点。艾里希·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写道：“必须致力于利用报纸、广播、电影及其他各种出版物，穷尽所有的手段来维持国民的团结，为了制定妥当的对策，政治要了解人类精神的法则，做妥善的安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大战让普通人和学者都发现了宣传。”<sup>①</sup>文学成为战争总动员的宣传工具，即意味着文学确立起十分明确的功利目标，一切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文学艺术必须要服从、服务于战争。如此一来，文学艺术就必须放弃自己的自律性追求，沦为战争宣传的工具。在战时状态下，文学艺术不得不放弃自律性的诉求，无条件地服务于战时宣传鼓动的要求。客观地说，在大敌当前、战事危机、生死攸关的时刻，考虑文学艺术自律性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奢侈的妄想，甚至有涣散军心、投降叛国之嫌疑。在国统区，自抗战爆发，几乎所有的文学家都毫不迟疑地行动起来，达成了一致抗战的共识。就连一向主张文学自律或自娱的作家，也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贯的文学创作立场，投身到战时宣传的文化战场上来。为了使文学成为抵御侵略、服务战争的特殊工具武器，抗战时期提出了“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战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口号。郭沫若在谈国防文学时说：“‘国防’——在英文是 national defence——本来是军事性质的用语。在初‘国防文学’这个新的旗号标举出来的时

---

<sup>①</sup> 转引自 [日]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12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候，大家都觉得有点异样，在目前的救亡关头上要找一个共同的目标以促进战线的统一，除掉用这个名义而外，觉得也像没有再适当的语汇了。”<sup>①</sup>“在这时候，我们的文学，应当竭力发挥它的抗争作用，应当防卫疆土，帮助民族意识的健全成长，促成有着反抗意义的弱国的国家观念，歌颂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应当建立崭新的国防文学！”<sup>②</sup>国防文学的提出虽引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但主张“国防文学”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争论，在文学为抗战服务这一问题上基本是一致的。两个口号的差别在于，“国防”带有政府官方的色彩，而“民族革命”则带有底层民众的色彩，在战争时局下，无论是政府官方，还是底层民众，都别无选择地投入到战争之中，全国总动员，全民皆兵，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必须以笔为刀枪，以文学艺术为战斗武器，投身到抗战的烽火之中。文学因此成为国防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不同党派、不同观点、不同流派、不同社团、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们纷纷联合起来，在“文学为抗战服务”的大旗下，开动起文学的战争机器，使文学成为战争的工具。

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也是速度的较量，迅速高效的行动决定着战争的胜负。所谓进入战时状态，也就是进入紧急状态，意在表明战争中高速高效的行动具有决定生死的意义。战争机器仿佛一部超速运转的加速器，一个国家被战争机器卷进来，就只能以疯狂的极速运转，否则必败无疑。同样，一种文化被卷入战争机器，就必须卸掉高雅文化的面具，放弃雍容高雅的节奏和韵律，代之以暴力野蛮疯狂，进入加速运转的状态。常规状态下，文化艺术虽不乏激烈昂扬的旋律，但文化艺术总有其精神贵族式的优雅传统，深邃细腻、从容雅致、诗意浪漫。文学艺术总是以其千锤百炼、精雕细琢，作为精品创造的最高境界。然而，进入战争紧急状态的战时文化，不得不脱离文化的常规轨道，被并入战争机器的轨道上来。文

---

① 郭沫若：《国防·污池·炼狱》，载《文学界》第一卷，第二号。

② 立波：《关于国防文学》，载《时事新报》，1935-12-21。



化人别无选择地脱掉雅致高贵的外套，配备上战斗的全副武装，整装待发。投入战争的文化，一如投入战场的军队，十万火急、刻不容缓。这就要求，文学艺术从生产到传播的流程，必须符合战争的节奏速率，剑出鞘、弹上膛，金戈铁马，万箭齐发。于是，文学艺术工作者摇身变为随时准备冲锋陷阵的战士。文学艺术作品恰似吹响的军号、进军的鼓角，这种战时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特点，决定了国统区文学传播观念的基本模式。迅速成立的社团协会，如同迅速集结的军团，高效、高产的作品如同兵工厂日夜兼程赶制的武器装备，传播媒介如同紧急输送的军需运输线。一切的一切，均在战争机器的轨道上加速运转。因此，在国统区战时状态下，许多作家以令人惊奇的速度赶制着大批量的作品，传播媒介异常繁荣，但存活周期却又异常短暂，由此造就了国统区文化传播业发展的畸形态势。许多学者曾惊叹于这一时期媒介的繁荣，不理解为什么在经济遭受战争重创的情况下，文化传播业不仅没有萎缩凋零，反而会不合时宜地畸异发达。这种不理解缘于以惯常的思维解释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为了整个国家战争机器的超速运转，战时经济与战时文化都不得不以超常的速度生产出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战争产品，创造出某一领域内的经济奇迹和文化奇迹。就战时经济而言，许多位居世界百强之列的老牌企业，都曾创造出战时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奇迹，在战争中壮大发展起来。在相同技术条件下，常规生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造出可以与战时经济相比较的生产效率。列宁在谈到德国战时经济时曾认为，德国战时经济是现代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技术、计划与组织的最高形式，正是战争“工程”将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到如此巨大程度。列宁不仅赞美战时经济建立了最现代的机械化工工业纪律、组织和协调合作的原理、最严格的责任和控制度，同时，还积极地效仿并推广德国的战时经济，认为应该对其进行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实行这种制度并使之得到运用。<sup>①</sup>与经济领域一

---

<sup>①</sup> 参见 [美]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134 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样，传播媒介作为战时文化的宣传鼓动机器，在战争中同样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离开传播宣传，大规模的整体战争是难以进行甚至是难以想象的，诸多战争强势国家都对传播的统制和生产超强重视。如纳粹德国的宣传鼓动，以及苏联的文化控制，无一不是将文化传播牢牢地操控在政党或国家手中，实行媒体极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国统区时期，国民党在谋划文化政策时，就有人提出要效仿德国、意大利和苏俄的国家媒体极权主义控制政策。对此，梁实秋曾发表与之不协调的反对意见，他倡导自由的媒体民主主义。梁实秋认为，实行国家媒体极权“必将步苏俄德意的后尘，而酿成惨酷的文字狱，这对文艺的打击是致命的。即或从宽，在作者的情绪上也留下一些不愉快的痕迹，不会产生好的结果”<sup>①</sup>。梁实秋的观点不仅遭到了国民政府方面的反对，还遭到了来自左翼力量的猛烈攻击。值得一提的是，站在今天来看，梁实秋的观点不能不说具有某种耐人寻思的意义。历史已经证明，那些推行国家媒体极权主义的国家，无论纳粹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最后都以极权统治失败而告终。从文学艺术的层面上看，将文学艺术捆绑在战争的战车上，势必造成文学艺术自律性的全面丧失，使文学艺术成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扩音器。战争是政治的极端表现形式，为战争宣传鼓动服务的文学艺术，在战争的状态下势必要无条件地服从于政治。从战争现代性的角度看，现代性本身即包蕴着极权主义的必然性。战争极端状态将现代性的极权本质特征推向了顶峰。在反思批判现代性的今天，我们应该对现代性自身所包含的战争、暴力和极权主义倾向保持高度警觉。因为，只要现代性仍在继续，战争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战争就依然存在。

战争从来都具有群团性。远古战争在部落之间展开。进入现代历史以来，以国家为群团的整体战事成为现代战争中的典型形式，因此，战争要求群团整体的编队。在战争中整体群团意识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个人化的随机行动不仅会导致整体作战能力的削弱，甚

---

<sup>①</sup> 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载《文艺先锋》，1924（8）。

至可能导致总体性的溃败。战争要求个人绝对服从集体的命令。为了整体的战斗，牺牲个体或局部可以说是战争中习以为常的惯例。战争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步调一致，绝对服从整体的指令，要求高度组织的同质化，而绝对不允许异质的个体化随机行为。显然，战时文化传播也必须要服从战争这一整体要求，国统区传播在进入战时状态开始，就有意识地确立起服从统一整体的军团集群理念，将文化传播的运行机制纳入到战时整体的律令之中。在抗战的前提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一致抗敌，抵御外寇。不同党派、不同政见、不同文学观念的人，在抗战的总旗帜下，集合组织成群团协作共同体，传播机构在此一背景下迅速集结，增强了整体作战的能力。这一时期，各种全国性的抗敌协会纷纷成立，不同的媒体纷纷合并，在民族抗日的总目标下，相互合作、协同作战，使媒介传播机制形成了高度组织化和军团集群化的特征。与军团集群化紧密相关的是对命令无条件的服从与执行。大规模军团作战要求绝对执行指令、服从指挥，因为如果没有指令的权威性，规模巨大的军团是无法统一行动、整体作战的，越是高度集群，对高度组织化的指令要求也就越强，所谓军令如山，违令者军法惩处，立斩不赦，就是要强化指令的不可怀疑性和不可逾越性，即指令的绝对权威性。听令者生，违令者斩，极端的战争状态赋予国家以极端的权力形式。劳伦斯在分析战争现代性与集权独裁之间的必然联系时，认为纳粹的独裁统治与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和战争的军事组织化构成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战争不仅培植了独裁主义的社会文化温床，还制造了所谓独裁领袖人物的疯狂幻象，使独裁人物为所欲为、狂妄自大。“战时经济与它的巨大命令力量以及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动员，让这位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产生了对新秩序的幻觉。在这个新秩序中，全体国家的所有社会组织都遵从一个人的意志，全部人民将形成一个服从命令的整体。”<sup>①</sup> 军事集群

---

① [美] 菲利普·劳伦斯：《战争的现代性：现代化理论和暴力问题》，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1辑，17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化的强调势必对个人主义的个性文化绝对的排斥。正是在这样的战争背景下，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反个人主义的强势浪潮。战争必须要求集权，要求集群化。战争彻底否定了“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诉求，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地融入国家、民族这些更大的共同体之中。“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皆以国为单位，个人殊无足道。”“国家是‘时代的界线’！是‘时代的大前提’。”任何个人都“不可背国力而发展”<sup>①</sup>。

就当时战争紧急状态的历史背景而言，提出“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口号，强调文艺的战争宣传鼓动功能，无疑是一种历史的现实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实在是战争紧急状态下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就是说，这种选择并不是文学艺术本然性的选择，因为就文艺的自律性而言，文学创作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自足性，文学的这种自律性和自足性的重要前提就是它不允许自己成为自身之外的工具和手段，不允许自己成为自身之外的附属和辅助，文学一旦成为某种功利目的或政治诉求的宣传工具，便丧失了自身，文学此时也便成为非文学。如此说来，正是战争的非常状态将文学逼迫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困境当中，为了战争，必须牺牲自身的自律性和自足性，这是一种军事性的文化战略逻辑，正如为了整个战役的胜利，牺牲部分是战略必要的当然也是绝对正确的命令安排。自此，在战争现代性的语境下，文化的战争现代性在战火硝烟的洗礼中产生。文学完成了从内在的自律性、自足性向外在工具性的转换，服务意识、听令意识成为文学创作所必须树立的军事化原则。

战争总是敌我双方的两军对垒，两军交战中的敌我双方对垒，呈现为极端对立的局面，诸种矛盾无法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失败就是胜利，不是战友就是敌人，战争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案是以生死胜败为最后标准，因此战争被人们称为“最后解决方案”，与这种最后解决的极端战争行为相吻合，战争的文化意识或战争的思维方式必然是极端的两极对立模式。作为战争现代性文化的重要

---

<sup>①</sup> 引文见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269～270页。

组成部分，国统区时期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同样形成了强烈的两极对立模式。

文学艺术进入战争总动员宣传状态之后，确定了“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口号，并成为战争状态下文学艺术必须执行遵守的基本准则，在当时战争危机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无疑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响应，以往不同的党派、不同流派团体、不同创作风格的作家在抗战文学的旗帜下团结一致，捐弃前嫌共同作战，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作理念共同一致的局面。毫无疑问，这种空前团结、共同一致的文学艺术创作倾向对抗日救亡的战争宣传是必须和有效的。但另一方面，这种空前高度统一的理念势必会造成对不同声音的排斥，而且这种排斥往往采取敌对的思维方法，即稍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就会被指认为敌对反动的观点，非友即敌，非对即错，非进步即反动，非正义即邪恶，极端的两极对立思维模式的表达是非此即彼的，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否认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模式。国统区时期也曾有极少数人对这种战争状态下的文学观念提出质疑，试图挽救文学的自律性生存，摆脱文学在战争状态下所面临的迫不得已的困境。1938年，梁实秋挑起了“文学要不要为战争服务”的文艺争论。梁实秋在中国国内“一切为抗战服务”的呼声中，发出了不合时宜的、不太协调的声音。他提出要防止抗战文学八股，并提出与抗战无关的文学也不应排斥。梁实秋的观点很快遭到激烈攻击。梁实秋一贯坚持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坚守文学的自律性，反对将文学当作宣传品，他说：“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就是文学”，“即使宣传文字果有文学意味”，也不能就此认为“宣传作用是文学的主要任务”。他还断言：“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都不会有多少文艺价值，因为“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sup>①</sup>梁实秋认为，文学自律性的丧失，文学宣传鼓动意识的强化导致了文学成为

---

<sup>①</sup> 引文转引自倪伟：《“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41页。

简单的战争宣传机器，导致了文学成为战争意识的传声筒和扬声器，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逐渐丧失，抗战文学成为一种缺少文学性的八股文章，即“抗战八股”。从战时政治要求的角度看，梁实秋的观点显然是战争总动员中一种逆动的声音，因此梁实秋的观点很快遭到普遍的声讨和强烈的反对。然而，从文学自律性层面看，梁实秋的观点至少提出了文学自律性与战争宣传的服务性之间的内在冲突问题，认为战争宣传功能与文学审美自律之间构成了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战争宣传的工具性诉求，必然要以文学自身审美性牺牲为代价。同时，文学一旦成为战争宣传的工具，也势必要成为战鼓号角式的口号呐喊，成为一种宣传单一理念的八股式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梁实秋的反并没有多少学理上的辨析，而是以战争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梁实秋予以定性划界。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被定性为“汉奸”、“卖国”、“投降”，至此，“与抗战无关论”的争论已超出了单纯的文学艺术题域，上升为战争的立场问题。在战争思维的框定下，对与错、敌与我，成为无须争辩讨论的问题。应该看到，“一切为抗战服务”的文艺创作口号，确实在文艺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声音的绝对操控，从而抹杀了不同声音的差异，造成对相异观点的排挤打压。

在战争的两元敌对思维的统摄下，势必会导致对一些真实具体问题的遮蔽，导致复杂问题的简单化，使战争时期的文学艺术创作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简单化创作倾向。如文学要不要反映或揭露战争所暴露的国内政局的种种动荡不安——政党纠纷、内战冲突、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等诸种疾患隐忧，文学对之是否应视而不见？从战争两极对立思维的文化模式看，为了鼓舞斗志、宣传抗战、增强必胜的信心，文学只能描写我方的正面形象，而不宜揭露自身的阴暗面。文学如果描写和揭露自身的阴暗面，就只能起“灭自己威风，长敌人气焰”的作用，这样的文学无异于“投敌叛国”。在战争两极思维的指导下，文学艺术所需面对的精神层面、生存层面和审美层面的复杂性，被简化为立场或阵营的问题。从具体的创作层面看，战争两极对立思维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容易导致思想内容的概

念化、矛盾冲突的公式化、人物塑造的脸谱化，并形成“抗战八股”式的创作模式。当时就有人批评这种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的文学创作：“描写义勇军，前线的英勇将士，一定把他写成高大的身材，坚强的体魄，严肃的沉毅的面孔。几乎个个都是中世纪的骑士英雄一样；描写汉奸，一定把它写成四五十岁的年纪，穿着长衫，有两撇胡子的；描写敌人的个性，一定把他写成无理性的凶暴，脸肉横生，手上长了毛，用尽魔鬼野兽等字眼。”<sup>①</sup>无可否认，这样的批评无疑是十分准确的，抗战文艺的口号喊得再响，拿不出高水准的艺术作品，也难以产生有效的作用。茅盾在《文艺阵地》中也对那种差不多的是一杯温水，不冷，也不怎么热的“抗战八股”进行了批评，认为它抓不到人内心的痒处。“抗战八股”式的创作模式成为抗战文艺的致命伤。

郁达夫在抗战初期曾说：“我想，反映着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大小小说，大叙事诗，将来一定会出现，非出现不可。不过在战争未结束以前，或正在进行的现在，却没有出现的可能。”<sup>②</sup>当然，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文学与战争有无关系，文学要保持自身独立性并非必须远离战争，问题的实质是文学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审视战争、反思战争，或者说介入战争。中外文学史的经验表明，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并非必然沦为战争八股，战争将人类置入极端的生存境遇之中，战争与和平、生存与死亡、正义与邪恶、道义与罪愆、崇高与荒诞、意义与虚无、个体与战争、女性与战争等战争所带给人类的极端经验，同样给文学带来了极端的经验，为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对文学艺术家来说，仅仅参与战争是远远不够的，文学艺术家与战争的关系决不仅限于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投入到战争的行列队伍之中，成为战争宣传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艺术家不仅要参与战争，更要反思战争、超越战争、批判战

---

① 祝秀侠：《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论》，《文艺阵地》，1、2卷合订本，116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版。

② 郁达夫：《战时的小说》，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3号。

争、揭露战争、控诉战争，这就需要文学艺术家具具有超越战争文化的意识，因为置身于战争文化语境之中，用战争话语来表现战争或言说战争，就依然无法超越战争，只要我们依然在战争文化的意识之中来言说战争，我们就依然处于战争的暴力与恐怖之中，这种言说或许正隐藏着战争，同时也煽动了战争。中外文学史上，许多文学艺术家在直面战争或参与战争的同时，都能够以文学艺术的形式高度关切人的生存境遇，以实现超越战争、反思战争，从而使关于战争的文学艺术超越了单纯战争宣传鼓动的功能，提升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和体悟。如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达利的《内战的预感》以及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都成为超越单一战争宣传功能而具有人类生存境遇深切关怀维度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争文学。应该看到国统区时期关于战争的文学虽然以战争宣传为主导取向，以“一切服务于抗战”为口号，但仍有一些超越战争、反思战争的创作努力。某些作品有意识地摆脱单一战争宣传功能的阉限，从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维度切入战争的书写和叙事，如钱钟书的《围城》、沈从文的《长河》、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此类作品曾一度被视为边缘化的创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侧重于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而弱化了战争宣传的功能。然而，随着战事的结束，在战火硝烟退去消散的同时，那些战鼓号角式的战争宣传文学，因其工具性、服务性的单一理念，逐渐失去了效用和魅力，而那些深切关怀人类生存境遇的战争文学，却日益显露出自身的魅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弥足珍贵的经典作品。

20 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已在人类头脑中沉积了过于厚重的战争现代性的文化心理积淀。战争现代性思维模式，战争现代性文化模式，战争现代性的文学及其传播，在和平时期依然十分有效地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平现代性的乌托邦设想依然遥不可及。在对现代性建立之初与战争现代性的遭遇战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国统区时期建立起的一系列现代性方案，带有浓重的战争、暴

力、极权、统制的色彩，并使文学艺术生产和传播同样浸染着难以摆脱的战争文化色彩。值得反思和警醒的是，以宣传功能为主导的战争文化意识，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硝烟散尽。情况也许恰恰相反，战争文化意识在后来的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反而不断地得到强化，并积淀为一种文化习性和思维惯性，文学的工具意识、宣传意识逐渐被确立为衡量文学的主要标准，致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自律性的话语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文学从战车上松绑之后，又被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继续成为政治的附属和工具。中国的战争现代性文化是在战火之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性是带着战争胎记的战争现代性，这段历史并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退出历史舞台，它积淀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因为，极端的战争现代性依然在不断吹响进军的号角。



### 第三节 文学宏大叙事与国家空间隐喻

清晰完整的领土边界、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以及对社会有效监控的政府组织是构成国家空间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对领界完整和领土拓展的希求是国家空间形成并运转的地理学基础。当构筑在民族共同体基础上的国家空间继八国联军侵华后再度燃起战火，众多有着强烈家国一体观念的作家在体验到国破家亡的痛苦感受后，均对国家空间的权威性予以认同，他们力图通过蕴含民族国家精神的文学生产来巩固、强化国家空间的意识形态，其文本中的宏大叙事与国家空间隐喻成为国统区文学创作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两种主要方式。日本对中国的侵犯行为，必然在客观上促成南京国民政府和民众双方以各种方式强化民族共同体。全民抗战是对国家空间统一性、整体性遭受侵犯的顽强抵抗。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机与苦难只有在高扬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意识中才能得以抚慰。“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激情被再度点燃，对享有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尊严的渴求，使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



形态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普遍认同，甚至某些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国家建制的理解上一直颇有争执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国家这类中国人固守的“民族大义”和“公众利益”原则，也与政府达成妥协和共识。

正是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赋予了作家的个体身份归属，使作家的个体独立意识融入国族的文化想象之中。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群体或一个人归属或希望归属的那个群体的成规所构成的”<sup>①</sup>，它既是社会给予的，也必然符合社会及个体的想象与冀望。因此，个体身份必然随着历史语境的更迭发生转变。战争中弥散的硝烟、战火、血腥、苦难拆解了文学生产者和平时所形成的文化身份以及生活秩序，那种书斋式的写作空间在战火中的国统区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战火残酷地将满脑子充斥着启蒙主义思想的作家从营造艺术宫殿的虚幻生活中连根拔出，他们真正走进了民族解放战争那充满血与火的现实生活，在以文学为武器，重振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振臂一呼中，实现了战士—文学生产者—文学传播者多种身份的同一。荷兰学者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曾提出，“一个人可以属于不只一个群体，而且一般来说都是如此。……从心理学上说，存在一个时而激活此一种时而激活彼一种的对群体的忠诚或身份的自我”<sup>②</sup>。因此，战士—文学生产者—文学传播者多种身份的合一，在国统区不但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也是个体自我兴趣和集体兴趣合一的必然结果。国统区持续了近十余年的战争改变了作家积习的文化生活方式，他们走出了文学沙龙和亭子间，第一次把自己的生命与民族危难、抗战救亡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因此战士的身份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既是文学生产者，更是民族战士，这是国统区绝大多数作家的自觉认同。这里的战士不仅指利用战时空隙从事文学写作的来自

---

① [荷] 佛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11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② 同上书，117页。

抗战前线的士兵，而且包括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将文学写作看作是激发民众抗战激情，刺向敌人以及腐败社会肌体的枪支、匕首的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尽管他们不是军事意义上的战士，但是他们的文学写作充满了斗争精神和民族意识。巴金在1937年《呐喊》创刊号中提出，一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但群体的生命永生，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寄托在群体的生命上。换句话说，把个人生命联系在全民族的生命上面，民族一日存在，个人也不会灭亡。因此，作为记录生命体验和再现生存境遇的国统区文学自然也无法回避型塑国家空间的历史使命，文学在这个时代，在战争的压力下自愿地开始书写民族—国家情绪，建构国族文化意识，努力实现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为构筑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服务。作家对战士身份的认同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攻击性。

从文化领域看，中国全面进入战时文化状态的标志性事件，是1936年数百名文学艺术家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了救亡图存、共同抗战的意志决心。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宣告成立，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至此，中国文化领域全面进入战时文化状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的发刊词，表达了这种战时文化的强烈意识。发刊词可视为全国进入战时文化状态的总动员令，它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为着巩固文艺的国防首先强固起自己营阵的团结，清扫内部一切纠纷和摩擦，小集团观念和门户之见，而把大家的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民族大敌。”<sup>①</sup>几乎所有的文化工作者都以激愤昂扬的战斗姿态，参与到战时文化的建设当中。1938年4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建立，各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文化界人士共同作战，在军事委员会的战时政体下，开始了战时文化的具体领导和实施。

---

<sup>①</sup> 见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269页。

许多在某种意义上处于边缘性的作家，也毅然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转向战争文学的创作，从个性化的低吟浅唱转向战斗的呐喊，从商业化的市民情调转向从容赴死的斗志豪情。文学的个体精英意识和个人意识为大众群体意识和国家意识所取代。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充斥了以大众传媒为载体和平台的全部公共领域中，民族国家想象成为公共领域中的主流音响，凡是与之相违背的声音，都被当作干扰社会发展和国家建制的噪音，被无声地清除和扼杀在公共领域之外。

在国家空间的监控下，国统区文学生产者自然放下个性话语，操持宏大叙事，关注民族国家命运，挖掘民族痼疾，令文学承担起重整山河的神圣使命，而与战争无关的艺术审美追求则受到抑制。适合大众的叙述方式，符合大众的战时文化诉求，成为小说家的自觉追求。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将陈蝶衣提出，在目前这样的大时代里，文学应该尽速地和大众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被并置于战争轨道的国统区小说不得不适应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战局战况，剑出鞘、弹上膛，金戈铁马，万箭齐发，小说从生产到传播的流程，必须符合战争的节拍。从叙述方式上考察，无论是战争前期的充盈着强烈乐观情绪的战地小说，还是中后期浸润着批判反思情绪的讽刺小说、抗战小说；无论是鸿篇巨制，还是短小篇幅者，大多重新以“情节—性格”结构统摄全篇，小说叙事时序、时间刻度以及时间转换语显现出清晰严整的特征，无论是全知型还是限知型的视角选取，叙述人“讲述式”叙述口吻的采用使受众很容易从中获取明确的意义，归纳出教化意图或得出某些符合民族国家建设的道德结论，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和道德劝谕功能。1938年，巴金带着一颗憎恨的心，目睹了桂林的每一次受难，旋而创作了控诉敌机滥炸的小说《还魂草》。这篇四万多字的小说以还魂草的童话故事为中心线索，按照人物性格逻辑的发展，竭力铺陈出利莎和秦家凤之间的真诚友谊，精心刻画她们的纯洁心灵和美好情操，关于敌机狂轰滥炸的描写仅83个字，却构成美与丑的极致对比，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创伤，无论是叙事逻辑线索还是价值趋向都清晰明

确。丘东平《第七连》、曹白《这里，生命也在呼吸》、阿垅《闸北打了起来》、端木蕻良《螺狮谷》、碧野《乌兰不浪的夜祭》、沙汀等人合著的《华北的烽火》等凝结了民族的斑斑血泪，回响着战士的呐喊呼叫，体现了伟大民族斗争意志和坚韧精神的作品中，抵御外敌、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宏大话语书写成为文学的自觉追求。就连以“社会言情”小说写作而大获成功的张恨水此时也摒除了《金粉世家》式的浪漫唯美，向时代中心意识——国族共同体意识——突进，在《虎贲万岁》、《巷战之夜》、《桃花港》、《潜山血》、《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游击队》、《敌国的疯狂兵》、《疯狂》等作品中，再也找不到翩翩美少年那百转千回终不悔的爱之绝唱，通篇充斥着战斗的情节、史诗的品格和高大全式的战地英雄形象，以此来唤醒国民、鼓舞士气，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张恨水的小说写作借助报纸连载的优势，把注意力放在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之上。在一系列抗战小说的写作中，他放弃了诗意浪漫的笔法，以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以清晰的线性时间逻辑，以类型化、戏剧化人物为主的人物形态，张扬了民族团结抗战的献身精神，而小说流畅、通俗的民族风格及简洁的白描式语言手法的采用，最大限度地适应了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认知水平，拓展了小说传播的接受范畴，为小说社会教化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形式保障。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有效地利用全知视角，鸟瞰式地记录了生活在北平小羊圈胡同中的人们八年的亡国奴生活，作品在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方面取得极大的成功，老舍以深邃的视角，通过对百余个艺术形象的刻画，透视民族文化心理，挖掘民族痼疾，探寻疗救根源，实现了大众化与艺术性的合一，该小说经翻译，被介绍到法国、苏联、日本等国家，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杰作。20世纪40年代，小说创作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大众化叙述手法的回归，都是战争文化传播观念制约下文学的必然状态。小说写作在符合社会意识形态规范，切近受众需求，满足受众阅读期待的同时，受民族国家理念影响，把个体“询唤”作为主体，从而使民众内化出一种自我压迫和束缚的法则。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

真正适应战时文化观念的需求，实现强化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需求。

当战火点燃时，日军对中国的侵犯，破坏了为现代世俗国家的主权提供正当性依据的民族共同体的理念，因为民族总是被想象成一个特定的空间范畴，即特定的领土，世界的一部分，只有在这个属于共同的统一的空间范畴中，民族主义、民族身份甚至民族国家才得以建立。强烈的疆土意识一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这种疆土意识经由民族国家理念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文化空间的传统资源。“中国古代的疆土意识在中国古人那里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深刻性，这是因为中国古人的疆土意识是植根于他们对于土地的生命依恋的。中国古人一向把土地看得极重，视土地为生命之本。……中国古人的疆土意识一方面体现为疆土空间感，即很重视、很自豪于自己国家的这块国土，形成很强烈的国土体验；一方面是对疆土的赞美和依恋，这里饱蕴着得之于历史的丰厚的文化内涵。”<sup>①</sup>暴露民族精神的萎靡、力图恢复民族生命力的动力，源自对伟岸的中华民族这一想象共同体的认可和接受，民族存在，个体就不会消亡。对民族国家的构筑和对地理空间疆域的关注，使得国统区的文学生产成为现代事业的一部分。国家空间作为主导空间在多种空间中居于核心地位。只有符合国家空间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态的文学，才可能顺利地通过文学生产与文学传播的全部流程，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实现教化和审美的功能。透过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老舍的《四世同堂》，曹禺的剧作《家》，艾芜的《丰饶的原野》、《故乡》等作品，我们同样不难发现山河、故乡、家等作为国家空间的隐喻大量充斥于文本之中，在对山河、故乡、家等空间里或苦难、或抗争、或感伤的描绘中，显露出文学生产者心灵内部对民族国家意识的或显现或潜在的认同。如在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中，那群“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

---

<sup>①</sup> 高楠：《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354页。

养出畜类，勤勤恳恳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的卑微的男女老幼，在日军的进逼和入侵下，却一改从前“蚊子似地为死而生”，歃血盟誓、齐天大呼，“巨人般为生而死”。尽管作品没有张扬激昂向上的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豪迈气概，注重表现战争中弱小个体在历史进程中承受的不幸和悲苦，渗透着女性的细腻敏感乃至个体感悟，但从作者对战争促使处于偏远空间中、受主流意识形态浸淫最少的最平凡个体生命迸发民族意识和民族尊严的带有肯定性的描写中，依然可以认定它是国家空间意识下的文学产物，并未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潮流。

#### 第四节 “时空分延”与国家空间想象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建构起一个有别于传统的现代性社会，其中时空观念的改变是现代性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重要特质。在前现代社会中，尤其是运用机械时钟统一测定时间，以确保全球时间精确性之前，时间一直与空间（地点）紧密相连，空间需要通过时间的支撑来获取具体、真实的存在意义。但是，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到来，现代性带给人类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它在拓展人类享受生活的空间范围的同时，潜藏着“巨型怪兽”般的高强度风险。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互相连接、互相缠绕，缔造出一个现代性网络系统。在这样的网络系统中，不同的区域、空间挣脱了时间的束缚，同时性、并置性地存在，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时空观念的转变上发挥着绝对化与极致化的促进作用，不同空间中的人们，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享受着“天涯若比邻”的曼妙感觉。福柯正是由此提出，这是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而吉登斯在研究现代性、全球化与时空关系时进一步解释，“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间与空间的伸延和分离，即‘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

“时空分延”不仅意味着时间与空间分离以及空间范围的拓殖，更为重要的是空间从具体场所中“脱域”（disembedding）而出，社会关系从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空间阻隔被彻底打破，亲临现场对现代人而言不再具有魔魅的吸引力，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在场越来越直接地为那些在时间—空间意义上的缺场的东西所取代。由此，以报纸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衍生成为纠合在场与缺场的重要介质，它凭借着机械可复制性、高强度弥散性和即时性等特质，打破了古典空间相对凝固静止的封闭状态，以世界是由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构成的现代时空经验，消解了举头望月、伤别思乡、“家书抵万金”式的古典时空经验，创建了一张联结全球的现代之网，在这张“魔网”的笼罩下，人即便可以日行千万里，翻越高山海洋，也都依然不同程度地为现代大众传媒所控制监管。故而，吉登斯在研究现代经验的传递时提出，最初“报纸（以及所有种类的其他杂志和期刊）把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印刷和电子媒体融合以后，这个过程才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而直到今天“印刷物仍然处于现代性及其全球化网络的核心”<sup>①</sup>。

现代大众传播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式和样态，形成了空间媒介化趋势。传播媒介已不仅仅是空间的填充物、构成物，而且成为建构、型塑空间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战争制约下，国统区传播媒介的空间型塑发生巨变，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转换，传播主体由战士、文学生产者和文学传播者等多重身份构成，政治公共领域内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功能强化、趋同，上述诸种趋向实现了国家民族空间的建构生产。深入分析文学、现代传播、公共领域、国家空间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理解国统区文学艺术与现代性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揭橥国统区文学与传播的内在特质，挖掘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规划策略。

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的产物，它的出现与城市有着天然

---

① 转引自 [英]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6～27 页。

的血缘关系。日本学者佐藤卓己在《现代传媒史》中提出：“如果说媒介具有沟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功能的话，那么城市就是媒介。而所谓城市论，就是阅读作为文本的城市空间。建筑物在向人们发出信息，繁华的街道、公园或者说办公室与工厂，是为了主流而创造出来的空间。城里人指的是可以解读这种城市的人。空间（space）是由于经验而产生关联的场所（place），城市是浓缩这种关联性的场所。既然城市化是空间的组织化，出版、报纸、广播等大众媒介自然会集中产生于城市。”<sup>①</sup> 在高度现代性的城市空间中，远距离发生的事件与近距离事件对人的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亲密关系。因此，城市作为传播业最为活跃的空间，在不断自我生产、扩大的同时，也框定了传媒的品性，固化了传媒在城市空间中的核心地位。因此，现代社会中，传媒业大多聚集在大中型城市空间中，引导舆论及文化的潮流。这一点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中国也有同样的表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处于初步发展期的中国传播媒介大多聚集于北京、上海。特别是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堪称中国传媒中心。许多内地的中小城镇，自“五四”新文学高潮过后，就几乎从未有自己像样的文学期刊。从晚清到 1949 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明确创刊日期的共 988 种，分析这 988 种文学期刊可见，其中上海 455 种，北京 106 种，共 561 种，占了总数的一半多，并且前者是后者的 4 倍。从 1917 年到 1949 年，上海每年都有文学刊物创办，而且在 30 年代达到高峰，1928 年 33 种，1929 年 23 种，1930 年 18 种，1931 年 20 种，1932 年 10 种，1933 年 22 种，1934 年 20 种，1935 年 28 种，1936 年 39 种，1937 年 23 种。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大型书局也在上海涌现。上海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都市，其所拥有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空间为传播媒介的繁荣及文学革新提供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与此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的知识环境、城市知识分子的网络给知识分子的精神赋予了足够的营养，大大地刺激了他

---

<sup>①</sup> [日] 佐藤卓己：《现代传媒史》，24 页。



们的精神活动。许多知识分子在进行‘反城市话语’言说的同时，又纷纷移居城市”<sup>①</sup>。因此，当20年代末北京的一大批传媒机构迁移到拥有丰富读者资源，报刊、文化消费方式充分舒展的上海时，连一贯以“乡下人”自喻、对城市文明抱有强烈抵触情绪的沈从文亦于1928年南迁到上海，其后近一年间，现代、新月、北新、中华、华光等书店以及许多知名杂志都曾销售、登载过他的作品。

现代性不断向外扩张的本质，给人类带来世界性的“整体战争”。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作为“整体战争”的一部分，是现代性社会建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打破了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空间平稳的表象。随着京津失守、沪宁沦陷，中国原有的文化中心在刀光剑影中黯然失色。大批工厂、机关、文化教育机构被迫迁移，知识分子则以其执著、坚守的本性，在流亡逃难的历练中依然坚持文化生产与传播。重庆、昆明、桂林、成都、西安乃至浙江金华、丽水及福建永安、云南丽江等偏远乡村小镇，随着各种文化团体、教育机构、抗日组织、文艺界学术界名流的聚集，首次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版图上标识出自己的位置。1937年后，成都、重庆、西安、桂林、昆明都曾出现大量的文学刊物，其中成都7种（1937年）、武汉10种（1938年）、桂林10种（1942年），重庆出版的文学刊物由1925年的1种发展到1944年的7种。国统区文化中心在萎缩后的再度拓殖过程中，其传播空间在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由沿海转向内地、由城市转向山区、由繁华都市转向穷乡僻壤，凸显出流散性特征。如果不是战争，可能谁都无法料到一个封闭的地区性内陆城市——重庆会成为战时中国的地位与形象的象征。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随后，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韩国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立使领馆或办

---

<sup>①</sup> [日] 山口久和：《中国近世末期城市知识分子的变貌》，见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事处。抗战爆发前中国共计有 108 所高等院校，在抗战中迁到四川的有 48 所，其中 31 所聚于重庆，包括著名的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大多曾在重庆从事文学创作，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巴金、田汉、洪深、夏衍、阳翰笙、宋之的、吴祖光、陈白尘、艾青、臧克家、胡风、艾芜、吴组缃、姚雪垠、张天翼、张恨水、靳以、杨朔等。《新蜀报》文艺副刊《新光》、《蜀道》，《新民报》文艺副刊《血潮》，《商务日报》文艺副刊《文艺战线》，《国民公报》文艺副刊《文群》，以及老舍、罗荪等编辑的《抗战文艺》，罗荪主编的《文艺日报》，胡风主编的《七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叶以群主编的《文哨》，洪深、吴祖光等主编的《戏剧时代》，邵荃麟、葛琴主编的《青年文艺》，陈西滢主编的《微波》等媒介机构的大规模发展，则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传播渠道。与此同时，另一个仅七万人口、毫无文化地位的小城市桂林也转瞬成为云集三四十万人口、数十家报刊社及上千名文化人的重要文化城市，并在以后几年里成为中国南方的文化中心，享有“桂林文化城”的美誉。以原始部落名字命名的昆明此时也一扫蛮荒遗迹，迎来了西南联大的鸿儒硕学，成为中国文化学术的中心，战时中国文化人心灵、情感和智慧的栖息地。

当战时状态切断了乡村与城市的血缘关系，在传播空间上由“在场”走向“缺席”时，文学作品及其背后的作家并未从现代性统制中脱域而出，他们在相对清新宁静的边缘生活中，依靠文化传媒“时空分延”的优势，坚守着生产可以强化国族的意识形态，建构民族共同体，实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国家具有“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因此，“属于富裕与权力之中心的支配空间，不得不去型塑属于边缘的被支配空间”<sup>①</sup>。因此，回顾

---

①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52 页。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国统区文化传播境况，不难发现，虽然大批知识分子和文化传媒教育机构在空间上由文化中心向文化边缘地带流散，但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空间的有效连接，作家们不但知晓政治局势及战况变化，而且还可借助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投身到主流文化建设的洪流之中，以拯救破碎世道、重振民族精魂的博大胸怀和无畏姿态，实现文学生产者与民族战士身份的合一。文学生产者的生命与民族危难和悲壮的抗日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借助于《文艺战线》、《抗战文艺》、《七月》、《蜀道》、《血潮》及《中原》等以期刊报纸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对民族国家共同体理念的广泛宣传，原有的文化中心虽然毁灭在枪炮之下，但无数新兴的文化堡垒却建立起来。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成为悬挂在国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重庆、成都、昆明、桂林乃至福建永安、云南丽江、浙江金华和丽水等地均先后拥有一大批作家，他们或直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或致力于文学创作，期待通过文化传播，激发民众抗御外侮、促使民众反思民族痼疾。文学成为刺向敌人以及腐败社会肌体的枪支、匕首。因此，对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无论他们如何向边缘地带退却，都无可逃避地置身于现代大众传播媒介所生产、型塑的现代民族国家空间之中。空间是政治的，是被建构出来的，建构的过程也是被赋予意义的过程。被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总是充盈着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即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任何语言或书写文字都必囿于空间之中”<sup>①</sup>，在现代民族国家空间的决定并制约下，国统区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只能顺应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文学和以张扬民族魂、民族精神为旨归的文学巨型叙事方式，也就自然成为文学的必然选择。1940 年，身在重庆的老舍为巩固民族国家而大声疾呼，“在完整区域的总后方，文艺活动应该有努力加紧的必要”，“作家更应拿起创作的笔扫荡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加强抗战的力量，培养革命的新世代”，“使偏远的地方也能听到炮声，也能看见浴血抗战的现实”，“使整个的文艺活动参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62, 1991.

加到民族解放这一伟大的事业里面，使民众理解抗战这一神圣事业固有的革命性质，动员他们起来，贯彻抗战的目的”<sup>①</sup>。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大后方的文艺家们也不断以召开座谈会或撰写文章的形式，总结与阐释抗战文学——大后方文学的得失与经验教训。因此，这一时期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生存空间与充满政治权力斗争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战场被超时空地并置，无论是作家、传媒人还是作品，都无法从现代性统制中“脱域”。以茅盾、田汉、艾芜、巴金、张天翼、老舍、端木蕻良、沙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尽管辗转于边陲之地，但是相对清新宁静的乡土化生活并没有使他们放弃以文学生产强化国家空间，建构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使命”，《霜叶红似二月花》、《劫后拾遗》、《秋声赋》、《穷追一万里》、《黄金时代》、《怒吼吧，香江》、《双忠记》、《金钵记》、《岳飞》、《山野》、《故乡》、《落花时节》、《还魂草》、《某夫妇》、《科尔沁旗草原》、《华威先生》、《腐蚀》、《寒夜》、《四世同堂》、《在其香居茶馆里》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国家文学特征的作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出去，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史上涂上灿如夏花的一笔。在由大众传播媒介所生产的现代性空间网络系统中，只有民族国家文学才能够得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从而真正打破时空阻隔，在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受众中获得快速、及时、广泛的传播。

当国统区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主导性空间由中心租界向边缘城乡、由前线阵地向大后方拓殖时，作家们原有的世界经验、感知方式、文化视野、审美心理等均遭受着巨大的挑战。一部分原本就追求超然物外、自由洒脱的个性化叙事方式的作家，此时面对着贫困、流离而又不乏淡远余味的乡野艰苦生活，感受着由生活空间的置换而引发的关于都市/乡村的复杂经验，重新体悟到自然与生命原有的乐趣与庄严。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回忆随北大辗转西行至昆明的经历时说，除晨晚散步外，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

---

<sup>①</sup> 引文见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载《大公报》，1940-07-07。

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楼下泉声深夜愈响，每梦在苏锡乡下之水船中，或携陶渊明诗一册，一路吟诵取温泉。冯至回忆起创作于1937年到1942年间的散文集《山水》时也说，在抗战中……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无论在多么暗淡的时刻，山水中的风景和人们都在我的面前闪着微光，使我生长，使我忍耐。梁实秋应友人刘英士之约为其在重庆主办的《星期评论》而写作的《雅舍小品》，更是直指颠沛人生中难有的超脱与淡逸。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得可怜的雅舍，以其清雅的乡野美色傲视战争的炮火硝烟，雅舍“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雅舍门窗不严，邻里间“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雅舍“入夜有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缘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角磨牙”<sup>①</sup>。雅舍远离战火、一派空灵，蕴藉着作者面临苦难时的从容超脱、怡然自得，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作品所没有的别样之美。至今，《雅舍小品》在海内外已印行三百多版，并于1999年入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作者梁实秋被公认为华语世界中散文天地的一代宗师。而边缘化的生存方式则给一向憎恶城市、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提供了机会，使他将在城市中所形成的乡村之爱落到实处，因此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于西南联大生活期间所写就的略显纪实风范的作品，如《昆明冬景》，都有着明显的亦乡亦城的特性。审视以沈从文、梁实秋为代表的热衷书写宁静、恬淡的乡野生活，追求轻盈与个性化审美方式的文人，他们尽管置身乡野、赞叹乡野，对乡野式的边缘化生存方式心驰神往，但在内心深处，他们是齐美尔（又译西美尔）笔下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现代“外乡人”（stranger，

---

<sup>①</sup> 《雅舍小品》，见梁实秋：《槐园梦忆》，2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又译“陌生人”)。作为“外乡人”，“他们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漫游者，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漫游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sup>①</sup>。在一个由现代性战争所强化的极端、典型的现代性社会中，外乡人作为漫游者的身份及其流动性本质所决定的陌生、疏远的都市心理症结，使得他们在不得已斩断了与城市的密切关联后，远未流落为耕织传家的乡民，他们知道迟早都要回归，因此在灵魂中他们不但没有切近乡土生活，反而成为乡村中的精神贵族，他们身上由疏远和亲近、中立和介入混合构成的特性，使得他们能够抛却战火中的血肉横飞，以优裕而美好的心境审视他们所置身的乡野，享受乡间野趣。战争对文化人这种不彻底的放逐，反而成就了一部分作家新的审美状态。

总之，鸟瞰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文学，不难发现城市与乡村、战争与和平、激越与宁静、超然与济世、救亡与启蒙、国家与个人、凝重与轻盈、悲壮与恬淡、政治与审美等主题多重变奏，如此嘈杂地交互存在，使新文学在 40 年代更加丰富多元。但是另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利益被推向极致的年代里，承载着生产民族国家空间、重振民族国家共同体的重担的现代传播媒介，只能大张旗鼓地引导与加强民族国家文学生产，像钱钟书、梁实秋、沈从文等人书写自然与生命感悟的作品、有悖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文学都只能掩迹于文化的边缘处，无法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空间对文学的一种有效监管手段。文学生产与传播始终置身于国家权力“眼睛”的控制下，无法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建构的国家空间相脱离。

---

<sup>①</sup> [德]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齐美尔社会学文选》，143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第七章

# 都市空间景观与 感觉经验表达

在通过合理合法化的方式建构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空间重组、重构，由此催生出真正意义的现代城市。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的重要标识之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城市化浪潮突破了欧洲大陆的地理场域限制，席卷全球，几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由此而展开的。现代城市空间孕育着发展和变化，正如涂尔干所说：“思想、时尚、习惯、新的行为正是在城市里哺育的，然后传到国家的其余地区”<sup>①</sup>。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也提出，随着现代都市的扩展，“一种在日常话语中被奉为神圣的空间被破坏了，它就是常识、知识、社会时间、政治权力的空间……欧几里得和透视法的空间作为参照体系已经消失了，连同其他一些从前的公共场所一起，

---

<sup>①</sup> 转引自 [英] 克瑞珊·库玛：《现代化和工业化》，见汪民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499 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诸如城镇、历史、夫权、音乐中的调性系统、传统道德，等等”<sup>①</sup>。正是现代城市的出现，割裂了人与土地的关系，破坏了传统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的秩序感，颠覆了前现代社会相对静止凝固的时空观念。现代城市带给人一种与前现代社会完全不同的，充满着矛盾、偶然、短暂、流变和分裂的现代生活。在这个“万物土崩瓦解；中心无法支撑；释放在这世上的只不过是混乱”（叶芝）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现代生活表现为各种声、色、光、电等都市景观的庞大堆积、挤压。现代人在对都市景观的沉迷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因此，沉迷于景观，还是批判地审视景观，成为都市文学置身“景观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主题。都市空间经验的感觉化、片段化、复杂化消解了传统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及话语言说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文学和艺术生产自然无可挽回地陷入到表达危机窘境。一种与都市空间体验和都市生活相契合的新型叙事方式的出现，成为都市文学的内在诉求。



## 第一节 都市的兴起与空间体验的“感觉化”

随着都市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迅速扩展，作为现代性重要特征之一的都市化成为生活现代化的空间标志。19世纪中叶，现代性这一“巨型怪兽”植入中国，中央帝国的封闭版图被打破，漫长而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由此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全新的以商业经济为本位的空间样态——现代城市孕育而生。这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以工业文明为形态，以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为关系结构而建构起来的现代都市，因人口聚集、流动频繁、职业构成驳杂、消费形态欲望化、社会生活节奏快以及公共领域增多等原因，显现出差异性、开放性、流动性、消费性、矛盾性等多重杂糅并置的空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28, 1991.



间特征。对于一向封闭保守、和谐宁静，重视人伦道德的乡村中国而言，现代都市不仅极度陌生，甚至是不可想象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中国现代性转型的深入，都市化已经成为 20 世纪中国社会的既定经验事实。20 世纪初，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具有国际色彩的大都市先后出现，而上海作为早期现代中国城市的示范性样本，无疑是中国走向现代性的一座纪念碑。鸦片战争后，即 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被迫开埠通商，昔日的旧式小镇，披上奢华外衣，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亚洲最大的金融、贸易、商业中心，号称“东方巴黎”。1843 年，第一家现代出版印刷企业墨海书馆在上海创立；1844 年，第一家英资医院——仁济医院在上海成立；1861 年，天主教在上海设立震旦博物馆，陈列动植物标本；1865 年，电灯在上海出现；1882 年，中国第一家自来水公司在上海成立；1908 年，上海街头出现第一辆有轨电车；1910—1920 年，霞飞路现代商业中心已颇具规模，百货公司、咖啡厅、专卖店等应有尽有。与此同时，英美烟草公司、东方百代唱机唱片公司、日华纺织株式会社、法商投资的电车电灯公司等外资企业纷纷在上海投资建厂。30 年代，随着国民政府迁都以及日军侵略的威胁，北平原有的文化中心地位失落。诗人林庚就曾感叹：“九一八以来，市民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北平故都的身份全然失去！渐来的是边疆之感了。”<sup>①</sup>此时的上海拥有中国最发达的出版传媒机构，仅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这三家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就占全国所出新书的 65%。<sup>②</sup>就连新文学阵营最有影响的两大社团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代表刊物《小说月报》、《创造季刊》，也都是在上海印刷出版的。美国图书公司（Kelly & Walsh）、法国联合书店（Uchiyama）等国外大型书店也纷纷抢滩上海，好莱坞电影更是风靡全沪。国内大批文人及归国留学生也随着文化中心的迁移齐聚上海。这是

---

① 转引自张杰林：《都市环境中的 20 世纪 30 年代诗歌》，2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② 参见上书，28 页。

一座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但乡村图景并未彻底消逝。“水稻田和村庄，可以从市区的任何一座高楼大厦上瞧得清清楚楚，这是世界上最轮廓鲜明，最富于戏剧性的世界之一。传统的中国绵亘不断，差不多伸展到外国租界的边缘为止。在乡村，人们看不到上海影响的任何痕迹。”<sup>①</sup> 城乡以巨大落差为前提的戏剧化并置，既强化了都市空间矛盾错杂的一面，同时也凸显出都市孤独而奢靡的色彩。“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sup>②</sup>，生产方式的更迭变化必然导致新空间的产生。尽管新都市空间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旧有空间的迅速消亡、凋零，二者总是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但不可否认的是，从鸦片战争至此，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市这一全新的、有别于前现代乡村社会的空间样态，神奇地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扎根存活下来，流光溢彩地展示出迥异于古典城镇的都市图景，成为中国诸多现代因素的培养基。

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构成文学的内在生命意蕴。现代都市的建构，带给人一种有别于乡村生活的全新的生存体验，形成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特征。都市中“街道纵横，经济、职业和社会生活发展的速度和多样性，表明了城市在精神生活的感性基础上与小镇、乡村生活有着深刻的对比。城市要求人们作为敏锐的生物应当具有多种多样的不同意识，而乡村生活并没有如此的要求。……正是在这种关系中，都市精神生活的世故特点变得可以理解”<sup>③</sup>。同样，都市人的冷漠、孤独、厌世、计较等性格特征也皆是都市生活体验、调整的结果。因此，在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看来，“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人们被吸引到城市，被纳入城市生活体系这个过程。它也指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

---

① [美]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②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31, 1991.

③ [德] 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见汪民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639页。

联的生活方式具有的鲜明特征的不断增强。最后，它指人群中明显地受城市生活方式影响的变化”<sup>①</sup>。20世纪30年代前后，当已具有相对完整的工业、贸易、金融和服务体系的上海从以宗法制为本位的城镇中剥离出来时，乡村中国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长幼有序、克己守礼、平和仁爱的生存法则也被一步步地瓦解，其显露出与文化古都北京不同的生存样态。奔腾着金钱的波涛，弥漫着流光溢彩的都市作为异质性殖民空间侵入的必然结果，消解了巫魅化、田园化的前现代空间，带给人一种与乡村完全不同的都市生存体验。过度、短暂、偶然成为现代生活的代名词，生活内容的丰富复杂、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精密度的提高、人际交往的表面化和事务主义以及强烈的个人自主性成为现代都市生活的主要特征。

对文学艺术家来说，上海作为现代大都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而且使他们在都市生活的现代震撼中，摒弃了传统空间经验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都市赋予海派作家以现代的书写视角，他们放逐了“五四”时期以民族、国家、自由和解放为核心建构的启蒙话语模式，在都市日常生活体验中寻找灵感，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和心中一刹那的感觉和印象，从生存体验的层面上确认了都市文化的内蕴。玄明在《现代》创刊号上刊载《巴黎艺文逸话》一文，以巴黎为例指认出人类已经进入大都市生活的时代。这个时代里，“裸体替代着拖泥带水的裙裾。南美洲的下流地方来的黑人的jazz和tango征服着waltz和polka。……地下铁道，立体派的图画，打字机，布尔什维克主义，足球，拳术，留声机，五彩照片，电影，庞大的广告牌，夜总会，古加音，丝袜，安全剃刀，空头支票，费洛伊特主义，快而没有痛苦的离婚，英文报纸，第一流音乐都可以在家里听到的无线电，飞机和cocktail（鸡尾酒）。cocktail！这真是我们这时代的大发现。……我们的时代是cocktail的时代！……你可以把各种玩味和各种阶级的人都调和在一起，

---

<sup>①</sup> [美] 沃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见汪民安主编：《现代性基本读本》，702页。

cocktail 的时代啊!”<sup>①</sup>尽管都市生活在大工业生产时代被锻造成一架有条不紊、高速运转的机器，然而其内里却是诸种事物的无序并置。鸡尾酒这种什么都有一点，什么又都不是的闪光混合体成为无序化、零乱化、并置化生存空间的象征。随后，施蛰存又在《现代》第4卷第1期上发表文章，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内涵予以界定，他说：“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 JAZZ 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情感，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吗？”此外，《幻洲》、《金屋》、《无轨列车》等二三十年代声名雀跃的海派刊物，也都无一例外地介绍现代人的现代城市生活体验，娓娓地述说着“城里人”的人生故事。其中，由叶灵凤、潘汉年主编的《幻洲》杂志在第1期便声明，该刊物围绕“城市”问题展开叙述，其从书写内容的选取到装潢设计均“洋味”十足，被看作是一份真正的城市刊物。<sup>②</sup>从大众传媒对都市生活的痴迷言说中，我们清楚地看到都市彻底俘获了海派艺术家。注重以西方文化想象为参照，书写都市空间改变带来的生存体验、情爱体验、审美体验的全方位转换，成为这一时期海派文学观念的基础。都市空间特征、都市生活方式以及都市生活体验的变化必然带来文学艺术的根本性变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说：“随着城市数目的增加和密度的增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强了。这是经验的融合，它提供了一条通向新生活方式的捷径，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在艺术家的画布上，描绘的对象不再是往昔的神话人物，或大自然的静物，而是野外兜风，海滨漫步，城市生活的喧嚣，以及经过电灯照明改变了都市风貌的绚烂生活。正是这

---

① 玄明：《巴黎艺文逸话》，载《现代》，1932（1）。

② 参见姚玳玫：《想象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1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种对于运动、空间和变化的反应，促成了艺术的新结构和传统形式的错位。”<sup>①</sup>

从感性层面上看，都市的“技术文明不仅是一场生产革命，而且是一场感觉的革命”<sup>②</sup>。现代通信革命和运输革命，给都市空间带来“运动、速度、光和声音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了人们在空间感和时间感方面的错乱”<sup>③</sup>。因此，都市空间经验的区别在于，传统空间经验主要特征是感觉的新奇性和感官的刺激性，正是这种感觉的新奇性和感官的刺激性决定着现代都市文学“感觉化”的经验表达方式。20世纪30年代，上海这个推崇声色娱乐、带有浓重异域气息的大都市不但吸引了无数投机者前来冒险，而且也召唤着文学生产者以现代传媒为依托，借声、色、光、影等形象图式，传达其独特的都市生活体验，参与了摩登上海的文化空间建构。特别是散发着现代主义气息的新感觉派小说，从城市空间的生存体验、审美体验入手，在都市景观的话语范畴内，打造出上海浮华世界的感性一面。刘呐鸥明确提出，都市景观及现代空间技术所提供的“新的空间及新的角度都能给我们以新的幻想意识情感”<sup>④</sup>，因此，作家、艺术家应该离现代生活再近一点。在由汽车、酒吧、舞厅、电影院、游乐场、跑马场、大型百货公司、十字街头、旅社等所构筑的像鸡尾酒一样，具有流动性、多变性、异质性的现代空间中，传统的理性判断、秩序束缚及道德规范都像《子夜》中的吴老太爷一样土崩瓦解，历史与时间失去了效力，只有人类即刻的身体感官知觉，即“新感觉”，才是切进都市景观的唯一通道。新感觉派作家从消费主义立场出发，摒弃了对都市单纯的价值肯定或道德否定的传统做法，以真切、直观的方式书写了在都市以其掩耳不及之势主宰现代人的生活后，人们惊恐、震惊的感觉。其文本内部的空间场景也成为感官碎片的“感觉化”集合体，缺少前现代空间的整齐划

---

①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② 同上书，135页。

③ 同上书，194页。

④ 转引自孔另境主编：《现代作家书简》，18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一性。刘呐鸥《游戏》中“探戈宫”里充斥着“男女的肢体、五色的灯光和发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桌椅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这里，作者既未对舞厅场景做单纯外部空间的描摹，也未开掘舞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仅仅以感觉外化的手法，表达了始终作为都市人异己力量而存在的舞厅带给人的迷幻震惊的感官体验。同样，他笔下的商业街是“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 似的，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大路，从住宅区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的，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女的灯光”（《都市风景线》）。很明显，由于汽车这一现代空间技术的使用，“凝视者”视点的快速移动，街道呈现出都市景观更迭、堆积、挤压的效果，这种印象叠加的怪诞感觉，近似“神经衰弱症”的奇异症候，真实地记录了现代都市景观压迫人的空间体验，传达了异质化的都市景观与人的生命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十字街头在被称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笔下，变成了“卖报的小孩子张着蓝嘴，嘴里有蓝的牙齿和蓝的舌尖儿，他对面那只蓝霓虹灯的高跟儿鞋尖正冲着他的嘴。‘《太晚报》’！忽然他又有了红嘴，从嘴里吐着红舌尖儿来，对面的那只大酒瓶里倒出了红葡萄酒来了。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夜总会的五个人》）。在感官知觉的参与下，夜晚都市的街头被切割成一个个零散的碎片，在这个由酒、烟、女人构筑而成的都市特有的感官欲望空间里，多变的色彩不但包裹不住都市影像的支离破碎，反而凸显并强化了都市扭曲怪诞的感觉。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电梯在新感觉派的作品中，成为“楼腹内的直肠”，电梯的故障像“直肠忽然闭塞起来，简直比大便不通更让人郁悻”（《方程式》）。百货公司张着大嘴，像个怪物，把

人吞进去，又吐出来。作家听凭感觉欲望的张扬恣肆，主观化地将都市人的生存经验、审美经验，拆解成空间的、片段的形式传达出来，塑造了一个虚幻的、感觉的都市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在施蛰存的《魔道》、《夜叉》、《旅社》等作品中，“竹林里的落日，山顶的朝阳，雨天峰峦间迷漫着的烟云，水边的乌桕子和芦花，镇上清晨的鱼市，薄暮时空山里的樵人互相呼唤的声音，月下的清溪白石，黑夜里远山的野烧”<sup>①</sup>等自然图景尽管回望在都市的视野里，却不再言说着乡村的诗情画意，自然被包裹上鬼魅、虚幻的外衣，根本无法疗救都市人“吃药也无法预防的”精神痼疾，人最终只能像《夜叉》中的卞士明、《旅社》中的丁先生、《魔道》中的“我”那般，带着深深的失望、无尽的恐惧逃回都市。被都市的概念控制着的都市人从根本上丧失了享受自然的能力，不能以真实的状态与自然相遇，只能停留在对乡村的疏离和无聊、挫折、恐惧之中。施蛰存在小说中以离奇的感觉叙述着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乡村的失效以及都市对乡村无可挽回的吞噬，乡村空间的魔幻化、鬼怪化、巫魅化、异己化缘自都市人多疑、厌世、冷漠、孤独的心理状态，是都市空间经验的曲折表达。因此，李欧梵在《现代性追求》一书中将施蛰存的这类小说称为“城市新型怪诞侦探故事”。

新感觉派小说既利用空间符号大量堆砌的隐喻手段，参与了虚拟变异的表征性都市社会空间建构，另一方面，新感觉派小说也是新都市空间经验的衍生物，正是基于此，我们认为，新感觉派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正如吴福辉在《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中所说：“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乡土文学……只有到了20年代末期，文化中心南移并与经济中心合一，现代都会上海与现代化都会的文学表现，几乎同时升起，我们方才有了全新意义的都市文化。”<sup>②</sup>

---

① 施蛰存：《夜叉》，参见《中国现代文学百家——施蛰存代表作》，184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② 吴福辉：《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14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第二节 都市艺术与小说叙事的“空间化”

现代都市生活体验给现代艺术家，特别是现代主义艺术家提供了思考的原点。都市生活的焦灼感、孤独感以及城市空间的陌生化也正是现代主义艺术叩问的中心。“在文学和绘画中，现代城市的观念很难与物理空间的变化、社会混乱、心理创伤及现代主义观念密切相连的知识分离。都市环境铸造了审美感受，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都市形式和景观，城市是现代主义艺术的焦点，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产生或展示了这场艺术运动的特征——意义的多元、连续性的消失或偶然性以及社群的解体。”<sup>①</sup>现代主义无可辩驳地成为一种都市艺术。它的天然习性显然要在都市中寻找。因此，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都市现象，即它存在于一种对于都市爆炸性增长的体验”<sup>②</sup>。都市体验成为塑造各种现代主义运动的文化动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书写都市感觉、都市体验的新感觉派小说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第一波，同时它也策动了文学叙事空间化的整体变革。或者说，新感觉派叙事技巧的革新不仅仅是向西学的借鉴，更是作家内在新型都市空间体验的合理化言说方式。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时间与空间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既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也是小说叙述的最原始层面，小说形式最尖端的操作规程，在小说叙事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时空体验的不同决定并控制着小说叙事的文化逻辑，由此不但改变了小说的言说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导致小说叙事策略的革新与更迭。传统小说叙事存在着注重时间维度而轻视空间维度的倾向，

---

<sup>①</sup> W. Sharp, L. Wallock, *Visions of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3~5, 1987.

<sup>②</sup> [美] 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37~38页。



人们更多地关注文本中的情节结构、性格发展、叙事因果逻辑等历时性因素，空间成为时间性事件情节的表演舞台。随着都市日常生活、都市空间经验、都市景观感觉进入小说创作的视阈，叙事的空间化成为现代主义小说文本建构的重要策略。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框定与古典的前现代空间有着内在关联。以乡村文明为基础建构的前现代空间尽管散发着浓重的巫魅、田园气息，但是秩序性、完整性、闭合性是其空间建构的基础。因而，中国古典小说在对故事情节连贯完整的追逐和对线性因果逻辑的笃信中，形成以“全知视角连贯叙述一个以情节为结构中心的故事”<sup>①</sup>的叙述模式，该模式既凝集着数代文人刻意谋篇行文的审美智慧，又融汇了历代说书人极尽腾挪变化的叙事辩才，在后人的顶礼膜拜中发展成为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尽管，20世纪初，西方小说的启蒙和中国小说价值地位改变的合力共同促成了“五四”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手法的局部松动，但是小说内容在推陈出新的同时，相对传统的叙事方式仍然被大多数作家采用。

随着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建构成形，一种多变性、零散化、无序化的都市生活，偕同资本逻辑的巨大涌动力量以及大众传媒“时空分延”的超常魔力，瓦解了传统的线性有序化时空观念，消逝的过去以及一切时间性存在不再让人着魔，时间蜕变成零散的片断，以空间化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种新型的都市空间经验并不是线性的通过时间发展出来，而是一张空间网络。因此都市化的时代，必然也是共时性的年代、并置的年代，空间着魔的年代。正如“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像以往的作者那样，如歌德、托尔斯泰在事件的跨度上，从历史的发展中来描写人的命运或事件的发展，而是在现在进行时的共时性中展现人性、展现社会”<sup>②</sup>。作为全新的异质化的都市生存经验表达的新感觉派小说，为了适应都市生活杂乱并

---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30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4。

置的鸡尾酒特征，其言说方式的突变之处正是“叙事时间的空间化”，或“非时间的空间性”，人物、故事在时空并置和时空倒错中展开。这正是都市的文化逻辑，不理解都市，不紧紧扣合都市的文化脉搏，就无法理解新感觉派小说叙事策略的先锋性。

小说文本包含两种时空方式，即故事时空与叙事时空。故事时空是故事、事件发生的自然时空状态，它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依据日常生活逻辑建立起来的。所谓叙事时空才是作者经过对事件的加工改造提供给读者的现实文本秩序。在传统的时空观念中，空间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意义，被挤压、附着于时间之中，而时间则是一个“常数”，它的长短快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在流动过程中，一去不复返。因此，在绝对时空观念的熏陶下，作家在写作小说文本时多倾向将叙事时空完全压制到故事时空中去，即追求叙事时空与故事时空的完全一致。故事情节是从始到终的发展，人物是从小到大的成长，矛盾冲突是从产生到解决。当需要叙述几个共时性发生的事件时，叙述人便会采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类叙事策略，将事件一件一件从头说起，以维护叙事时序线性流动的清晰、严整。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传统小说处理叙事时空的手法就是单一无能的。在顺叙的同时，预叙、倒叙、插叙等手法也频繁出现，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多种叙事时空手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让小说文本尽现多姿风貌，但这些努力还只是小层面的局部的革新，并未从根本上搅乱时空的顺序流动转换，小说仍是在顺序性和稳定性的时空维度上演绎人物和事件发展的历史。

作为都市艺术的新感觉派小说致力于都市空间感觉的展现、空间体验的表达，它们在将都市作为审美对象予以关照的时候，抛弃了自然时序，在感觉体验的错杂并置言说中，实现了小说叙事的空间化。例如，在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春阳》等小说文本中，过去、现在、未来等任意交错跳跃；想象、回忆、联想、幻觉、梦境与现实交相辉映，在文本中纵横驰骋，在时序倒错、时间跨度的无时性和不确定性中建构出一个意象化、情感化、体验化的空间，展现了人类心理世界的散乱、错杂，变幻莫测。叶灵凤在《鸠绿眉》

中不但别出心裁地将真实与梦幻交错、古代与现实穿插，而且消解了故事清晰的时间刻度。在现实与梦境、古与今的空间随意并置中消解了文本的时间转换语，从而神秘且晦涩地展示了现代都市人全新的空间体验，并因此赋予了传统文本中那个香艳的故事所难以具备的审美张力和审美意蕴，实现了文本的革新。新感觉派小说的时空错乱使得文本内部的事件不再有时间序列的联系，而是遵循空间并置的原则，在叙事的空间化中实现了“非时间的空间性”。因此，自然场景描写消逝在新感觉派作家的视野中，以酒吧、赌场、百货公司、舞厅等为代表的社会空间场景被景观化、象征化、氛围化。经过叙述人任意打乱、细细切割零散后突兀地连接在一起的社会空间场景，不但在文本的空间状态上呈现出零散、紊乱的态势，而且使都市空间弥漫着隐喻的气息。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中发生暗杀的林肯路、淫乱的豪华洋房、疯狂的舞厅、发生惨剧的建筑工地、金碧辉煌的华东饭店……这些似乎没有任何因果关联的场景在文本内部随意交错并置，既展示了一个非理性的颠倒错乱的视像世界，又使文本“在时空错杂之间产生强烈的对比，别具匠心地揭开了都会之夜的帷幕：在这儿，道德被践在脚下，罪犯被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sup>①</sup>。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上海感受都市风云变幻，专肆书写都市生存体验、情感经验的张爱玲在小说《金锁记》中有这样的描写：“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成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sup>②</sup>作者创造性地将两个非连续性的空间场景组合在一起，以空间场景的变化替代了时间性的描述，在场景的瞬息转化间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读者产生“人生恍然如梦”的联想，也隐性地传达了作者感

---

①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7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② 《张爱玲文集》，第2卷，9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悟到的人生恍惚感和危机感。这也正是叙事时间空间化所产生的艺术魅力。

叙事的空间化成为小说叙述方式的构成主体，它的变化必然带动小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的革新，使小说叙事艺术获得空间转向的可能。其中小说文本的叙事结构是作家充满生命投入的一种形式，它不但决定素材的选取编排，统摄叙事的程序，而且还外在地指向作者的生存体验和人生哲学。作为新兴都市空间经验表达的新感觉派作家拒绝了传统小说生动故事情节和丰满人物性格的诱惑，在努力向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展示反叛姿态的同时，一向缄默的心理情绪体验成为编排结构、决定顺序的核心力量。他们在创作中尝试和盘托出人物内心世界的立体图景和纵深，热衷于表现人类感觉、梦境、幻觉、情绪、潜意识，力图通过对人类心灵的透视或感觉经验的表达来表现都市空间的生存体验，形成了以“感觉—体验”结构小说全局的叙述模式。因此，感觉、体验成为推动小说结构得以形成的隐含动力。文本中残存的人物或成为感觉体验的载体，或简单得像一个符号，不具备完整的个性特征。自称对人类心理“黑暗王国”情有独钟的施蛰存在《春阳》中抛弃了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淡化了人物外在行为和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完整情节，完全借主人公蝉阿姨的回忆和想象，揭示了无意识欲望对青年寡妇心灵若隐若现、若断若续的骚扰，性心理的流动构成小说的全部。《梅雨之夕》则通过一位男子情绪、感受、想象和幻觉的变化，反映他内心“深处本能的恋情、道德的自责和现实恐惧的复杂交织，特别是妻子、酒店妇人、雨中女子三个形象蒙太奇叠化，生动象征了他无意识中多重人格的折磨”<sup>①</sup>。小说中的一切都染上了主观心理色彩，感觉体验成为结构小说全篇的核心力量。

随着散乱无序的感觉体验成为文本结构的重心，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在超越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同时，搅乱了传统文学遵循的叙述逻辑，拆解了传统小说常规性的因果链条与

---

<sup>①</sup> 尹鸿：《论中国现代新感觉小说》，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5）。

封闭整合的叙事结构，造成叙事的空缺、整体感的碎裂和叙事能指链条的断裂，形成文本主题的多义性、难辨性。这一叙事策略的使用打破了故事时间性的因果勾连，消解了文本的逻辑性、统一性和整体性，小说的叙事结构在空缺与断裂的状态下看似杂乱无章，读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实质上是以都市人“感觉—体验”为轴心谋篇布局，这种叙述结构最擅长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现代人的“现代情绪”和“现代人的心理困惑”。因而，他们的小说文本大规模地以限知视角取代上帝式全知视角，并将叙述人有限的视角聚焦于人类内心，构成了独具魅力的限知型内视角。在“限知型内视角”的控制之下，叙述人仅仅可以向我们描写人物所见到、听到的东西，但他不能代替其他人物，叙述他们的心理意识。《石秀》便借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水浒传》中“石秀杀嫂”的全知视角及叙述人转化为石秀本人的限知内视角。文本窥探着石秀，性心理的颤动，挖掘着作为青年男性的石秀，性意识怎样瓦解着他的英雄侠义之心。凭借着散发弗洛伊德气息的新视角的采用，文本得以把古老的故事翻过一面，进行别开生面的审视，并闯进了古典名著《水浒传》未曾到达的心理世界层面，创造了心理分析小说这一新的文体。从中可以看到“成功的视角革新可能引起叙事文体的革新”<sup>①</sup>。除限知型内聚焦视角的使用外，“跳角”即视角的非连贯性高频跳跃或转换，因为适于传达短暂易变、混乱复杂的都市生存体验，亦大量出现在新感觉派小说的文本中。随着视角犹如摄像机的镜头般推、拉、升、降、摇、移，灵活多动，叙述人不但借助视角的空间跳跃、转换得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叙述，而且叙述人有意制造阅读困难，淡化视角转换信号，视角转换突兀。穆时英小说中，叙述视角和叙述人犹如一个精灵，它忽隐忽现，诡异多端，诱惑着人们在对它的追逐中走入叙事的迷宫。小说《黑牡丹》中，“我”、舞女黑牡丹、圣五在叙述中都运用第一人称“我”，但视角却一直在变。在众多“我”形成的叙述迷宫中，读者经常会发出

---

① 杨义：《小说叙事学》，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我”究竟是谁的追问。这些叙事手法的创造性运用，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限知视角叙述不完整的缺憾，又带给读者全新的艺术冲击力。

以都市空间经验取代启蒙工具理性和乡村道德理性的新感觉派小说，所采用的消解逻辑、整体破碎的“感觉—体验”型叙事结构、限知型的叙事内视角、并置错杂无序的叙事时空以及叙事节奏加快等叙事策略，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隐喻效果，甚至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文本能指的无穷转换与无限运动产生无限多元意义，增强了小说的隐喻能力。新感觉派小说叙事的空间化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特别是都市化进程快速拓展以来，世界的荒诞感、人生的困惑感、主体的失落感以及危机感的表征。我们在被其带入都市景观世界的同时，也在深层次上感受到都市人的心态和思绪，或深沉的回旋，或紧张的激越；体悟到焦灼中的渴望、空虚中的追求、幻灭中的希冀或无奈中的挣扎诸心像。



### 第三节 “景观社会”与单向度的人

都市社会是一个景观化的社会。景观作为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景色、景象，成为都市一个重要的本质特征，对景观表象的感觉体验成为把握都市生活的重要方式。基于对都市景观化的批判理解，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提出“景观社会”的概念。在德波看来，大规模都市化进程已将人类社会带入到一个景观社会。“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ectacle）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sup>①</sup>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影像物品生产与物品影像消费为主的景观社会，景观已成为一种表象化的世界，这一表象化的世界是役人于无形的、更加异化的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

---

<sup>①</sup> [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的景观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人及其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已经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sup>①</sup>景观作为被展现的图景，并不仅仅是“凝视”的对象、“看”的客体，它还是一种由视觉所建构起来的表象或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表现为各种声色光电等影像符号的庞大堆积、挤压。甚至可以说，都市正是在景观、影像的堆积中矗立而起的，景观也正是都市最具震惊效果的魔魅之所。它是都市的表象，甚至成为都市本身，诱惑着人，使人不由自主地痴迷于其中。都市中琳琅满目的商品、奔驰的汽车、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充满诱惑的广告牌乃至文化所生产的诸种城市幻象等影像群，建立起了一个表象的空间、一个景观化的社会。它决定并控制着人们的生存体验和审美体验。作家、艺术家借助艺术生产的方式参与到都市空间的想象性、象征性建构中，赋予都市空间以表征的意义，从叙事层面上描绘着都市空间的生存样态。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费尔巴哈判断的那个‘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的事实，被这个景观的世纪彻底证实。”<sup>②</sup>在由影像而构筑的都市景观中，“影像的流动势如破竹，这一流动的影像类似于随意控制这个可感觉的世界的单一化内涵的他者；他决定影像流动的地点和它应该如何显示的节奏，像不断的而又任意的奇袭一样，他不留时间给反思，并完全独立于观众可能对他的理解或思考”<sup>③</sup>。因此，景观在本质上是分离的，置身于生存世界景观化、客观世界镜像化的都市中，大众丧失了主体的批判性、否定性、超越性，成为“单向度的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沉迷于都市的景观中，丧失自我，成为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陌生人。沉迷于景观或批判地审视景观，因此成为都市文学置身“景观社会”中所必须面对的主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作为第一个从都市视角审视中国现

---

① 张一兵：《德波和他的〈景观社会〉》，见〔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7页。

②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30页。

③ 同上书，119页。

代生活的小说家，曾指出《呐喊》书写的是“老中国的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的心的跳动”<sup>①</sup>。在《子夜》中茅盾以都市的景观书写开篇，在都市的景观化显现中概括出都市生活的特征。“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 NEON 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 HEAT, POWER!”<sup>②</sup>在茅盾看来，光电（LIGHT）、热能（HEAT）、力量（POWER）构成了都市景观的基础，诱惑着都市人沉醉其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推崇备至的中国新感觉派作家更是将都市的景观当作风景细细鉴赏、仔细临摹，甚至是由衷赞美。刘呐鸥在致戴望舒的信中曾说：“我要做梦，可是不能了。电车太噪闹了，本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碳烟布得黑濛濛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塞们，拿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那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那里，有的，不过形式换了罢，我们没有 romance，没有古城里吹着号角的声音，可是我们却有 thrill, carnal, intoxication……就是战栗和肉的沉醉。”<sup>③</sup>正是出于对引发人战栗和肉的沉醉的都市景观的痴迷，刘呐鸥将其小说集命名为《都市风景线》。施蛰存在介绍芝加哥诗人桑德堡时，也表达出其对都市景观的由衷赞美，“这资本主义发展到极度的大都会。在它的中心，有高耸入云的摩天楼，人们乘着电梯在这里面又升又下降。有大的银行、现金、票据在那里乱流。有纵横交错的望不尽的平坦大路。停车站，大旅馆的广厅里，鲜花铺门口……浓黑的烟雾从每一个烟筒挣扎出来喷薄向四方去，铜铁的吼声震撼着

---

① 转引自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72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② 《茅盾全集》，第 3 卷，3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③ 转引自孔另境编：《现代作家书简》，186 页。



每一堵坚定墙壁……”<sup>①</sup>当这些作为“游荡者”的都市文人，在拥挤不堪的都市中漫步、张望时，他们“绽开了他们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因此，漫步在两种意义上成为文人的工作，“其一，他只有在这种漫步中，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有事可做，才能找到他自己的下一个题目；其二，这种漫步也展示了作为他工作的一部分的闲暇……仿佛他已从马克思那里弄懂了产品的价值由制造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sup>②</sup>。因此，游荡者在深刻洞悉都市罪恶的同时，又与都市形成一种难以离弃的微妙关系。与这些城市游荡者不同，普通的芸芸众生没有游荡艺术家的回旋余地，他们在对景观的痴迷中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

新感觉派作家塑造的人物大多是沉迷于景观社会中的异化的、无根的、漂泊的都市人。《夜总会的五个人》中，无论舞女、商人、学者、大学生还是职员，无一例外都是没有理性、没有自我、没有灵魂，“从生活里跌下来的人”。《CRAVEN A》中充斥着乱抖乱跳的，一群暂时剥去了文明，享受着野蛮人的音乐情感的，追求着末梢神经的刺激感的人们。《黑牡丹》中，舞娘黑牡丹坦言：“我们这代人是胃的奴隶，肢体的奴隶，都是叫生活压扁的人啊！”“譬如我，我是在奢侈里生活着，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汽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sup>③</sup>尽管她也感到疲惫厌倦，但想喘口气来的时候，已经沉到水底。《杀人未遂》中，年轻的女职员的最大特点就是像哑巴一样不声不响，她像是一尊缥缈的无名塑像，没有体温和血，没有神经中枢，没有触角，只有机械般无情的躯壳而已。《PIERROT》中的潘鹤龄感叹着：“站在哪儿去呢？哪儿都是寂寞的！……绝对的人和人与人中间的了解是不可能的事，纵然有友谊，有恋——恋也只有相对的了解。没有相互了解的人，只有本质地互相类似的人。”在这个隔膜

---

① 施蛰存：《芝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载《现代》，1933（5）。

② [德]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5页。

③ 《穆时英小说全集》，2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的社会里，“爱是必须的。它是抵御孤立或孤独感，与 20 世纪的荒诞所造成的痛苦进行斗争的武器”<sup>①</sup>。在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风景》、《游戏》、《热情之骨》、《赤道下》，施蛰存的《花梦》，穆时英的《夜》，黑婴的《五月的支那》，徐霞村的《MODERN GIRL》等文本中，对真情、真爱的追求为放浪形骸、纵情声色所代替，爱情堕落为肉欲的游戏，男女两性在这近乎梦魇的体验后，显露的依然是自我精神的空虚和孤独。变异的爱不但抵御不了孤独、落寞，甚至加剧了生命的破碎无妄。然而，这些被生活压扁了、挤出去的社会大众并没有反抗的姿态，甚至没有仇恨的面容，他们戴着快乐的面具，沉迷于都市景观及其所造就的大众文化的声色娱乐之中，尽管快乐的面具下面是一颗孤寂落寞的心。西美尔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曾提出：在大都会中“无限地追求快乐使人变得厌世，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到最后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神经在拒绝对刺激物做出反应中发现了适应都会生活的最后可能性。”因此，“城市是厌世态度的真正场所”<sup>②</sup>。随着厌世态度的不断堆积，自杀似乎成了都会必不可少的衍生物。“夜总会的五个人”都是厌世之徒，他们在舞厅里转啊，跳啊，舞厅这个被生产建构出来的魔魅的、扭曲的空间掩盖了生活的失意、不快。然而，当舞会结束、灯光打亮、人去楼空之时，金子大王胡益均突然发现，魔魅消散了，这不过是一间极普通的房子，它掩盖不了任何失意，解决不了破产危机，只能暂时成为精神的慰藉所。在空间转换还原所造就的精神危机中，胡益均采取了厌世的极端方式——自杀。因此，隔膜、厌世、孤单、冷漠成为都市人最有代表性的性格特质。“也许这就是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在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要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

---

① [美] 布勒：《人本主义心理学导论》，10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② [德] 西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642 页。

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连哭泣都成了游戏，已丧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内容与实质。”<sup>①</sup>正是都市空间的景观化遮蔽了社会的本真存在，大众在迷人的“看”中，丧失了人的自由意志，沦为纯粹的工具。因此，景观在现代都市中隐匿着麻痹和蒙昧大众的功能，而都市陌生人的文化身份及其审美取向，也正是都市空间所赋予的，是都市空间的特点所决定的。

正如都市是商品社会的产物一样，景观是商品社会的表征。因此，“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是一场根据自己的法则不断扩张的、精心设计的、强迫人们把货物等同于商品，把满足等同于生存的鸦片战争”<sup>②</sup>。作为商品社会的产物，景观是一个欲望化的空间，而景观空间的欲望化势必导致人的物化——在欲望化的空间里人成为单向度的异己之物。德波在《景观社会》一书中，对景观在现代都市中所发挥的近似宗教的作用进行过细致的分析。他说：“景观是对宗教幻觉的具体重构。景观技术没有驱散人类将自己异化的力量投射其中的宗教迷雾；相反，它只是将这些迷雾降落到人们生活的尘世，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生活最世俗的方面也日益变得暧昧不清和令人窒息。代表对世俗生活整体拒绝的幻象天堂不再投向苍天，而被植入世俗生活自身。”<sup>③</sup>当大众从宗教彼岸回到现世时，工厂、车间、写字楼、公司成了他们的压迫场所，甚至连他们消费的场所、休闲的模式也是被控制的。因此，我们说，新感觉派小说中充斥着的舞厅、酒吧、百货公司等作为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所构筑起的景观，从实质来说不但不具备休闲的功能，相反倒成为奴役和压迫的延伸地。当虚拟的景观抖动着欲望的翅膀，任由大众张望时，它已在不知不觉中激发并规范着大众的消费欲望，并由此决

---

① 邱华栋：《摇滚北京》，13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②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15页。

③ 同上书，7页。

定着物质生产。景观的制造者，那些幕后的资本家“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因此，景观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表象化的景观制造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完美分离，规范了闲暇生活的模式，“这是资本逻辑对劳动之外的时间实施的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sup>①</sup>。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的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sup>②</sup>。因此，新感觉派小说通过景观布展虚假欲望，建构全新的生活情境，宣教全新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做法，乍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其实其内里依然隐藏着都市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原先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压迫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此时已经演化为温柔的压迫，人们在娱乐之中成为景观的奴隶，这种不干预中的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

#### 第四节 娱乐化都市空间与时尚的双重性

都市娱乐空间的深在隐秘由何构成？都市娱乐空间兴旺发展并成为时尚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都市娱乐空间里簇动的人群获得了怎样的宣泄与满足？当我们一层层地揭去笼罩在都市娱乐空间的诗意叙事、浪漫情调和西方想象时，作为娱乐消费的空间显露出物化的消费主义内在逻辑。正如戴锦华所描述的那样：“90年代，在中国都市铺展开去的全球化风景，尽情地渲染着金钱的魅力和奢华的物的奇观。不仅是商场、商厦，也不仅是短短几年间爆炸式的星罗棋布地分散于中国主要城市的麦当劳、必胜客，而且是充满‘欧陆风情’的‘布艺商店’（家居、室内装饰店），‘饼屋’（面包房，这

---

① [法]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31页。

② 同上书，11页。

一次是来自台湾译名)、咖啡馆、酒吧和迪厅,是拔地而起的‘高尚住宅’区,以及以‘一方世外桃源,欧式世家别墅’,‘时代经典、现代传奇’或‘艺术天地’为广告、名称的别墅群。”<sup>①</sup>

消费的欲望和欲望的消费构成都市娱乐空间的隐秘驱动力。都市娱乐空间是一个欲望消费的空间场所。欲望是人之本性,欲望的压抑与满足构成生命存在的基本内容。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把人生之欲望视为生命内在的本质构成。叔本华认为生命即意欲之表现,意欲乃无法满足之渊藪;而人生却总是追求这无法满足之渊藪,所以,人生即是一大痛苦。“食色,性也”,应该如何面对自身的欲望,始终是人类所无法回避的切身性难题。在古典主义时代,社会主张克制或清除人的欲望。人的欲望肉身乃尘世堕落之物,要拯救这尘世的堕落,必须“存天理、灭人欲”。只有除去自身的欲望,人才可能摆脱物质欲求的缠绕,成为圣人或天使。然而,肉身欲望毕竟是人之存在的世俗基础。消灭了肉身欲望,人就被抽象为干瘪苍白的理性或伦理存在,因此,人欲与天理的紧张冲突成为生命的难解之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反对蒙昧的禁欲主义,肯定自身的欲望,尤其是商品社会对人的欲望的肯定,越来越没有节制。商品的生产本质就是欲望的生产。商品的消费就是欲望的消费。欲望的生产与消费构成了商品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欲望本身始终处于理性超我的压抑控制之下。社会的日常生活空间在道德理性的组织之下一直对本我欲望实施着严格的监管,被压制监管的欲望时时都处于躁动之中,寻找宣泄的出口。如果说,在古典主义时代,欲望宣泄不具有合理性或合法性,它们往往以各种方式寻找替代性的宣泄或转移,那么,进入商品社会,欲望的宣泄与商品消费紧密结合在一起,消费即是欲望,欲望即是消费。欲望与消费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都市空间因此被娱乐化,都市空间因此成为欲望消费的公共空间。

显然,都市空间的欲望消费不同于一般日常生活的欲望消费。

---

<sup>①</sup> 戴锦华:《隐形书写》,26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如果说，一般日常生活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基本的物质性欲求，如吃、穿、住、行等物质欲求的满足，即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满足，那么，娱乐化都市空间的欲望消费则是一种象征性消费的欲望满足，是在一般性物质欲求满足之后的更大的欲望需求，是一种休闲性的欲望消费，一种炫耀型的欲望消费，一种增值化的欲望消费。从消费价格上说，休闲性消费多属于价格昂贵的炫耀型消费，正是这种炫耀奢侈才可以满足欲望消费的增值扩张。欲望的大小与消费水平的高低成正比，高消费换来欲望最大化的满足。为了让消费者得到欲望最大化的满足，都市娱乐空间一直在追求欲望与消费的不断结合。进入娱乐化的都市空间，人便为五光十色的广告所迷惑，充满诱惑的形象和语言无所不在。传媒煽动起消费的欲望，各式各样的广告刺激着人的感官，调动着人的欲望，让人产生强烈的消费诉求。都市娱乐消费的营销推广，往往采用“美色+营销”的模式，完成“欲望+消费”的形象隐喻。在都市空间中，娱乐化即是欲望化，其形象主要由女性来展示表演，“女性的形象被赋予消费品的交换价值而成为了‘欲望交换的手段’：因为女性意味着欲望，她成为后者的标尺。她在可行的范围内表现并调节了快乐……和性特征，使欲望被人理解……她是一种以自由为手段的社会控制的标尺”<sup>①</sup>。都市空间里的娱乐化、欲望化展演多为性感的女性，意在唤起消费者的欲望冲动。都市空间将情欲与消费直接勾连在一起。消费刺激着欲望，消费服务于欲望，消费满足着欲望。同时，以资本为尺度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决定着人的欲望满足程度。都市空间的娱乐化、欲望化说到底是赤裸的欲望消费和消费的赤裸欲望。

娱乐化都市空间往往表现为欲望的狂欢化。在欲望的狂欢仪式中，欲望以更加放纵的形式表达出来，从而构成都市空间消费的特殊场景。从文化社会学的意义上说，狂欢作为一种仪式和一种节庆，几乎是人类社会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活动。各种文化都传承着本

---

① [美] 珍妮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9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民族的文化狂欢仪式。狂欢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古老的狂欢节。远古神话传说记载着民间的狂欢仪式，它以酒神崇拜的祭祀形式为主要内容，后逐渐演绎为民间化的节庆活动。在欧洲的城镇中，狂欢活动每年大约长达三个月。在狂欢节日，人们纵酒狂欢，放浪形骸，戴上假面具，穿上奇装异服，在郊外森林，在大街小巷，纵情欢乐，尽情地放纵自己的原始本能。歌德曾记录参加罗马狂欢节的亲身经历：“化装舞会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首先上场的是穿着下层妇女穿的、领子开得很低的连衣裙的男人。他们拥抱男人们；对女人，好像对待自己的同性一样，随心所欲地做出种种放肆的举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年轻人。他把一个性情暴烈、爱争吵的妇女扮演得惟妙惟肖。‘她’走遍科索，沿途找碴儿与人争吵，侮辱人，而‘她’的同伴们则假装尽可能让‘她’平静下来。有一个普尔希那拉人跑过来了。他臀部挂着一个用彩带穿着的巨大号角，甩来甩去。当他和女人讲话时，他试图模仿古代伊甸园上帝有点无礼的、轻佻的举动——这可是在神圣的罗马呀！但这一举动引起更多的是笑声，而不是愤怒。女人们也像男人一样，对于自身的异性打扮兴奋不已。她们中许多人穿着普尔希那拉男人常穿的衣服，而且，我得承认，当她们穿着这种暧昧的服装时，常试图显得很迷人。”<sup>①</sup>在法国也经常举行类似狂欢节的“愚人宴”，以表达一种滑稽的模仿和嘲弄。在这些庆祝活动中，人们可以在祭坛边纵酒狂欢，参加化装舞会，跳古怪的舞蹈，还可以暴食，脱衣服，做出粗俗下流的举动。

在商业社会，狂欢化的诸种仪式逐渐转化为欲望化消费的重要仪式。都市娱乐空间作为欲望化的消费场所，把欲望的狂欢发展成商业时代的庆节仪式。本来，在西方狂欢节仪式中，欲望肉身的宣泄就占有很大的比重，狂欢节就是“为肉体恢复名誉”。狂欢节的特征是笑声，是过度 and 放纵，是粗俗与冒犯。狂欢节时的狂欢是暂

---

<sup>①</sup> 转引自[澳]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23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时的解放，即从占统治地位的真理与既定的秩序中脱身的解放，它标志着对所有的等级地位、一切特权、规范以及禁律的悬置。著名学者巴赫金在论述狂欢仪式时认为，在狂欢仪式中，“物质和肉体本性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完全不是它的那种自私自利的形式，也完全不是脱离其他生活领域的因素，在这里，物质和肉体因素是作为包罗万象和全民的东西被看待，并且作为这样一种东西同一切脱离世界物质和肉体本源的东西相对立，同一切自我隔离和封闭相对立，同一切抽象的理想相对立，同一切与人世和肉体分离独立的价值追求相对立。我们再说一遍，在这里，身体和肉体生活具有宇宙的以及全民的性质；这决不是现代那种狭隘意义和确切意义上的身体和生理。身体和肉体生活还没有彻底个体化，还没有同整个外界分离”<sup>①</sup>。在都市娱乐空间里，世俗化、肉身化、欲望化的狂欢仪式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狂欢是荒诞的身体（grotesque body）的庆典：丰盛膏腴的筵席、烈性酒、纵欲。在这样的场景中，官方文化被完全推翻覆灭。狂欢中的荒诞不经的身体是不纯洁的低级身体，比例失调、及时行乐、感官洞开，是物质的身体，它是古典的身体（classical body）的对立面，古典的身体是美的、对称的、升华的、间接感知的因而也是理想的身体。因此，荒诞不经的身体及狂欢活动，在中产阶级身份与文化的形成过程被排除在外。随着文明进程在中产阶级中扩展延伸，需要对情感与身体功能加以更大的控制，这就使风俗习惯、举止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着力宣扬对情感与身体所表达的厌恶。”<sup>②</sup>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都市空间希望把每一天都变成欲望的狂欢节，使欲望消费获得某种仪式象征的意义，文化仪式因此成为消费的节庆。人们仿佛可以天天沉浸在狂欢节的氛围之中，放纵狂欢，去体验狂欢文化的异质性、颠覆性、世俗性、放纵性。

---

① 张杰主编：《巴赫金集》，149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② [英] 迈克·弗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1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都市空间的欲望狂欢化把传统节庆都改造成欲望化的狂欢节庆。都市空间为此掀起一个又一个欲望狂欢的高潮，制造一个又一个欲望狂欢的热点，把所有的节日都变成了欲望狂欢的仪式。在“春节”、“情人节”、“愚人节”、“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元旦节”等中西方传统节日来临之时，商家都会精心策划，推出系列的狂欢节目，让商场成为节庆狂欢庆典的场所。在节日里，都市娱乐空间成了欲望狂欢化的海洋，传统节日的宗教神圣性或民间意义被消费瓦解，节日只剩下一个空洞的形式。在这一空洞的形式中，填满了欲望化的消费。欲望的狂欢成为所有节庆的真实内容。

卫慧在小说《纸戒指》中是这样描写酒吧的圣诞狂欢夜的：

---

\* 圣诞前夜，恰好是我的生日。于是这一夜理所当然地成了纵情狂欢夜。上好鲜艳欲滴的彩妆，我找出了一只夸张的黑松石耳饰，那耳饰的穗带上嵌了小粒的水钻，摇曳至肩。单耳悬佩的戏剧感，就是属于拒绝平淡的节日的。对于一些过着平庸生活却憎恶平庸的人们，狂欢的节日就如同仅作一日游的诺亚方舟，载着他们淹入快乐的海洋。嗅着昂贵的 Estée Lauder 所散发出的性感而神秘的芬芳，我虚荣而满足地单身上路了。车停在 JJ。迪厅里声色狂乱。年轻的肢体上下左右飞舞，构筑成欲望的迷宫，四周充满了滑腻而粘稠的某种体液的味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几个臭钱！一个小青年在我边上嚣叫，便有几个朋克打扮的同伴附和着狂吠起来，我们要爱！要被爱！要造爱！他们喊着口号，显得才思喷涌、触类旁通。我笑得止不住，身体内有岩浆呼啸滚动，就是放纵的感觉。我跳上音箱，大幅度地摇摆着，一个高个男孩贴过来，我们相缠相绕，技艺不凡。这是当众亲热的方式之一，具有某种因假想而衍生的诱惑。<sup>①</sup>

---

邱华栋在《摇滚北京》中也写了同样的场景：

---

<sup>①</sup> 卫慧：《纸戒指》，见《“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纸戒指》，9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 那年的圣诞之夜，我和杨哭穿戴齐整……到饭店的舞厅参加圣诞化装舞会了。这座四星级的饭店像一块银制物体耸入天空。不知为何，到了年终，在我们心中涌起的只有一种空茫和疲惫的感觉。这个城市叫我们经历了太多，也叫我们付出了很多。生活中有一种迅速流变和沉闷的东西毁坏着我们年轻的心。有些东西，是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之外并无法去把握的。比如这个轮盘城市转动的节奏。我们对很多东西已失去了兴趣。生活变得简单了，也更麻木了。我甚至都变成了不读书的平面人。

我和杨哭走下舞厅，在入口处一人选了一个面具。我们选的是老态龙钟、满脸持重的老人面具，加入到了那场圣诞之夜的化装舞会之中。这是一个假面的海洋，每一个人的真实面孔都消失在假面之后了。我几乎看不见一个人的脸。也许这就是城市的象征，充满了假面人和在假面后面转动的眼睛。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假面舞会，在这里，一切的游戏规则被重新规定，你必须学会假笑、哭泣、热爱短暂的事物、追赶时髦。你必须要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转瞬即逝，再也没有了永恒和停止不动的事物。连哭泣都成了游戏，已丧失了哭泣本身的深刻内容与实质。<sup>①</sup>

---

在欲望狂欢的节日，各种消费品的推广活动也都在精心策划后隆重登场。它们共同营造着狂欢仪式的隆重庆典。这是无程序的仪式，无内容的庆典，无禁忌的节日。它就是欲望的狂欢、放纵的叫喊，消费的庆典。应当看到，狂欢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资源，对于正襟危坐的正统文化具有相当大的颠覆瓦解力量，它使文化生命富有活力和冲击力。狂欢的文化使人类文化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然而，在商业消费日盛的今天，狂欢仪式日益为消费意识形态所浸染，狂欢性的民间文化资源在这种消费意识形态之中被削减成单一的欲望化狂欢平台。当欲望的消费变成一种过剩的消费时，狂欢过后的疲惫或疲软同样也会带来民间文化资源的疲惫或疲软。

---

<sup>①</sup> 邱华栋：《摇滚北京》，130～131页。

时尚充斥着都市的每一个空间，它到处游走、展示、闪烁、炫耀。时尚在城市的空间中快乐地尖叫。都市空间作为一个时尚的空间，成为时尚表演展示的舞台。消费已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一般的物质欲求，它成为时尚的前提。消费行为因此也负载了更多的商品消费意义，比如，炫耀型的消费就已经不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满足。在炫耀型的消费中，消费者获得了心理学或文化学意义上的满足，消费成为一种自我表现、自我炫耀、自我宣泄的方式。因此，在消费主义时代，消费成为一种时尚。都市娱乐文化的消费特点，从多方面迎合满足了消费主义时代的时尚诉求。

时尚潮流的表征是新奇、新异、新变，其标志是另类性。在今天，另类已成为时尚的特别标签。另类就是特立独行，就是标新立异，就是先锋前卫，就是与众不同，另类就是时尚。娱乐化的都市空间有意识地营造另类异端的风格：嬉皮士、朋克、摇滚、波希米亚等历史上异端叛逆的形象，在今天的都市空间中已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昨日的叛逆，今日的时尚，另类叛逆的文化特性在今天已全然消失，它以时尚的形式，成为都市中可以展览的流行。

随着都市另类的流行，都市娱乐空间生产、复制、克隆出一批又一批的另类一族，文坛也涌现出一大批号称新生代的另类作家。表面上看，他们独立于世、个性张扬、我行我素、卓尔不群，以其特异的个性风格，展示着当代都市生活中的另类生活状态，给人以新异的感觉。然而，另类的表象却掩盖了消费化的总体趋势：低级的模仿雷同与极端个性、立异标新的奇妙混杂在一起。在都市的流行中，另类被消费化的时尚大批复制和克隆。以叛逆个性著称的摇滚乐也难以逃脱消费化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一无所有》敲响中国摇滚的鼓点，电影《摇滚青年》将摇滚青年的形象推向了文化生活前沿，震撼、叛逆、狂放、独立、自由的摇滚精神始终以一种反叛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然而，随着全球化消费主义的蔓延，随着时尚化社会的来临，摇滚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其原本具有的文化政治学意义渐趋淡化。在都市娱乐空间里，摇滚所蕴藏的叛逆、自由、狂放精神，被时尚化地使用、消费。它体现出时

尚消费的力量，时尚将异端前卫变成一种流行。时尚在不断地成为前卫流行的同时，逐渐地消解了自身，成为一个空洞而华丽的镜像。在时尚的镜像中，一切真实的姿态都因华丽而成为空洞，消费化的时尚向人们许诺着空洞而华丽的现实。

今天，时尚已经渗透到都市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市日常生活时尚的氛围中展开。时尚无所不在，又稍纵即逝；时尚标新立异，又媚俗流行。时尚的面孔如此扑朔迷离。一方面，时尚标举个性、另类、前卫、特立超群；而另一方面，时尚需要流行泛化，而流行泛化却需要抹平个性超群的特质，使时尚成为媚俗。时尚不得不在这种独立个性、异质另类与大众流行、媚俗泛化的双重境域中不停地变换着面容。对此，罗兰·巴特把时尚看作是一个流行的双重体系：“流行的双重体系（A 和 B）就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读出现代人的道德困境。每一个符号系统一旦被世事‘充斥’，它就要被强行拆散，改变自我，崩陨。为了将自身向世事开放，它必须逐渐异化。一种深奥的二律背反，使生产行为模式与反应行为模式分离，使行动系统和意义系统分离。经其 A 组和 B 组的分散，流行亲身体会到了这种双重假定。”<sup>①</sup>被誉为“时尚哲学家”的西美尔也认为双重性是时尚的特别面孔：“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是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一件起先只是少数人做的事变成大多数人都去做的事，例如某些衣服的式样或社会行为开始只是少数人的前卫行为但立即为大多数人所跟从，这件事就不再是时尚了。时尚的发展壮大导致的是它自己的死亡，因为它的发展壮大即它的广泛流行抵消了它的独特性。因此，它在被普遍接受与因这种普遍接受而导致的自身意义的毁灭之间摇晃，时尚在限制中显现特殊魅力，它具有开始与结束同时发生的魅力、新奇的同时也是刹那的魅惑。……在

---

① [法]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号》，32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时尚中生活的不同方面仿佛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汇聚，时尚是一种复杂的结构，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表现着灵魂中主要的对立性倾向。”<sup>①</sup>

时尚的双重性在自身的流行过程中不断地自反自毁，消解抹平自己。一方面，时尚文化不断创造着另类个性、标新立异、超群反抗的文化异质性；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在流行化过程中将其抹平、消解、泛化。当昨日的先锋成为今日时尚时，先锋的意义已被抹平，先锋变成了一个意义匮乏的符号；当昨天的反叛成为今日的时尚时，反叛只作为一种姿态，丧失了反叛的力量；当昨日的个性成为今天的时尚时，个性也就在泛化的模仿中丧失了自身的魅力。正是在这种双重的二律背反中，时尚不断地流变，不断地创造自身，不断毁灭自身。在时尚中，昔日叛逆的挣扎痛楚已变成今日值得炫耀的美丽与时髦。时尚所具有的这种双重特性，正反映了当代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

## 第五节 都市空间的异质性与放浪的美学

近代西方建立起现代性合理化、合法化的叙述。这种现代性的合理化、合法化运动构筑和生产出无所不在的现代性空间。现代性空间把现代性诸多观念布满、充盈于人所栖居的空间领域，使现代性通过空间形式覆盖日常生活。现代性空间是一个理性规训的秩序空间，是一个明晰温馨的优雅空间，是一个诗意浪漫的美学空间，是一个布尔乔亚式的空间。由于现代性合理化、合法化的确立，致使西方的文化想象建立于现代性合理合法化基础之上，人们对于都市空间的理解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于西方现代性的合法化想象。因为，现代性已构成关于空间想象的文化无意识。显然，仅仅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都市空间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都市空间所具有的

---

<sup>①</sup> [德] 西美尔：《时尚的哲学》，7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后现代性特征。如果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阈出发来定位都市空间，可以肯定地说，娱乐化的都市空间生产绝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性的空间生产，它无疑也是一种后现代性的空间生产。作为一个后现代性的空间，它以另类异度的特质，拒斥着现代性的空间叙事。

都市娱乐空间与常规的公共空间领域截然不同。随着社会空间生产的逐渐扩大，人类所处的常规公共空间已成为理性规划的一部分。在理性规划的空间中，人的生存空间被规划为一种规范标准的存在。常规空间如工作空间是一个制度化的空间，其空间诉求是效率最大化。工作空间以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实施着管理，因此，可以将其称为“管理的空间”。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组织的复杂化，使人类对空间的管理不断加强，向管理要效益已成为社会文化的基本准则。各种管理学的书籍不断出版，各种管理学的课业不断推出。管理是一种看护，是一种监视，是一种制度规范的强制。人在这种强制性的空间中工作，只能执行、遵守和服从。从生存论角度说，工作空间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压抑性或压迫性，人长期置身于这种压抑性或压迫性的监管空间里，身体成为被监看、被监管的对象，人性的发展被束缚规范。在长期监看监督的工作空间里，人性的发展被规范为一种单向片面化的模式。正是这种以空间形式存在的监管压迫，即圆形监狱式的空间建构，造成了生命存在的焦虑感。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把这种焦虑视为我们时代的焦虑。他说：“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sup>①</sup>也许是因为常规空间的监管压迫性越来越强，人们才需要寻找或建立非常规空间来宣泄、舒缓、放纵被监管压抑的深层潜意识或潜在的本能冲动。对于常规空间而言，娱乐化的都市是一个另类异质的空间，其表现的样态与常规空间相异，它构成了对常规空间的反动、抵抗、颠覆。常规空间是理性的，都市娱乐空间则是非理性的；常规空间是理智的，都市娱乐空间则是癫狂的；常规空间是

---

①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页。

规范拘束的，都市娱乐空间则是无拘无束的；常规空间是压抑的，都市娱乐空间则是放纵的；常规空间是诗意化的乌托邦，都市娱乐空间则是恶之花的异托邦。总之，都市娱乐空间是一个另类，是一个异端，是一个叛逆，是一个反动。

后现代思想家福柯为了揭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的关系，始终把注视的焦点聚集在非常规的空间里，以解构颠覆常规空间对人的压迫。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为了使常规空间更加合理化，成为人们愿意趋从的空间，常常会把常规空间涂抹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赋予它以完美的形式。“乌托邦”（utopia）意指理想完美的乌有之地。人们试图把他们置身的常规空间描述为一个理想完美的乌托邦之地，把都市娱乐空间诗意化、浪漫化、美学化。在这种诗意的乌托邦化的叙述修辞过程中，都市空间变成了理想的合理化的常规空间。福柯认为，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非常规的异质性空间，它与常规空间相对抗，构成人类生存中一个完全别样的景观。福柯为了更突出地标识出这一空间的别样性，将其称为“异托邦”（heterotopias）。都市娱乐空间具有异托邦特征。在今天，伴随乌托邦运动的破产，人们开始告别乌托邦，纷纷逃入异托邦。他们是异托邦的一代，标新立异，放荡不羁，不再循规蹈矩，以另类自居，以异类标榜。另类成为一种时尚，成为一种“酷”。另类需要有另类的空间，异类需要有异端的舞台，都市娱乐空间就是另类的空间，异端放荡的舞台。当人们面对或进入都市娱乐空间时，已很难用常规的尺度和标准来描述和评论。它展示出完全另类异质的征象，颓废得时尚，叛逆得新潮，放纵得前卫，表征着这个时代焦虑的症候。从传统道德的角度看，它充斥着堕落、罪恶、黑暗、败坏；从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它颓废、虚无、垮掉、绝望；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病态、疯狂、扭曲；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异端、另类、叛逆；从美学的角度看，它丑陋、粗鄙、恶俗。总之，它是非传统的、非常规的另类异质性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体验着疯狂、鬼魅、飘移、沉沦、虚无。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看来，光显的层面始终压抑着幽暗的不可光显的一面，两者形成强烈的冲突。幽暗的

不可光显的潜意识在压抑中，在黑暗里涌动着，找寻发泄表露的出口，找寻发泄的平台与空间。都市空间提供了这种潜意识放纵发泄的出口与平台。如果都市夜晚可以作为一种空间的生产来看，那么，它所诉求的人性欲求，它所要满足的消费欲望，就是人性中的深层潜意识的发泄。弗洛伊德的理论为人们打开了人性封存在黑暗之中幽锁已久的地窖。它像夜晚的幽灵在都市的黑夜里行走游荡，欲望麇集在空间里，这里也许是唯一适合它的空间。20 世纪的文学逐渐摆脱了用诗意的光辉来说人与世界的方式。茨威格、卡夫卡、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文学家，纷纷转向了对人与世界的黑暗性的关注，他们大胆地开始了对人类幽暗空间的探险。对黑暗的注视，对黑暗的探险，打开的是幽暗的空间，因为，让人正视，让人直面，总比用阳光隐蔽黑暗更加真实。在阳光中，我们看到的是人性虚假伪饰的光明一面，而在黑暗里，我们或许才能真正窥视到人性潜藏的深层真实。都市娱乐空间是人性在深夜的黑暗里出没游荡的场所，它因此充满着鬼魅的气息，它是一个另类异度的空间。人性的构成是复杂的，人所置身的空间也是复杂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描述了人类置身空间的悖谬境况：“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均质的和空洞的空间中，相反，却生活在全然地浸淫着品质与奇想的世界里。我们的基本知觉空间、梦想空间和激情空间本身仍紧握着本体的品质：那或是一个亮丽的、清轻的、明晰的空间；或再度地，是一个暗晦的、粗糙的、烦扰的空间；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巅峰空间，或相反的是一个塌陷的混浊空间，或再度地，是一个涌泉般流动的空间，或是一个像石头或水晶般固定的凝结的空间。”<sup>①</sup>这种空间的悖谬，表征着生命存在的悖谬。

都市空间与现代艺术构成某种紧密的关联。都市空间中的艺术观念与传统艺术观念迥然不同。传统艺术以高雅为崇尚，将艺术视

---

① 转引自 [法]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 页。



为某种神圣之物，而生长于都市空间中的现代艺术，表露出对传统古典艺术的强烈反叛意识。它是一种先锋性的实验，一种颠覆性的叛逆，一种反艺术的艺术。作为后现代性的异质空间，都市文化为各种反艺术、反美学的艺术实验，提供了资源和场地。在反艺术、反美学的实验空间中，艺术从神圣的殿堂坠入到大众消费的空间。在许多人眼里，都市是艺术的天堂和圣地，那些行为乖戾、愤世嫉俗的艺术家在都市里放浪形骸、遗世独立的身影，为都市染上一层厚重的迷幻色彩。

都市空间与现代艺术的关联可谓历史悠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的西方现代派先锋艺术与都市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先锋派艺术的产生都与都市文化有着特定的亲缘关系。19 世纪末，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左岸，聚集着一批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的性格和人品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侈的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厅到郊外，毫无计划地荒度终日。他们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酒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sup>①</sup>。在这群人中，毕加索、海明威、阿波里奈、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雅各布、马雅可夫斯基等，后来均成为大师级的艺术家。艺术的崇高与肉体的卑微，灵魂的圣洁与酒后的放荡，痛苦与狂喜，创造与疯癫，在塞纳河左岸的都市空间里展示着光怪陆离的面影。阿波里奈在醉酒中写下了他的诗作《酒精》，并在酒吧的喧嚣声中高声地朗诵。毕加索经常泡在“机灵兔酒馆”中寻找灵感，还创作了一幅浑身披戴花环的自画像《在机灵兔酒馆》。在“流浪者之家”，海明威与菲茨杰拉德、与乔伊斯喝酒放歌。在自杀之前，海明威为怀念青年时代在塞纳河左岸所度过的放浪生活，写下了《欢乐巴黎》。达达主义曾在“伏尔泰酒馆”里向世人发布宣言。同样，超

---

① [法] 达恩·弗兰克：《巴黎的放荡》，2 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现实主义的宣言也是在酒吧的迷醉里发出自己的声音。“垮掉的一代”的艺术创作与大都市的关系达到了唇齿相依、水乳交融的境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金斯堡在烟雾缭绕、酒气熏天的酒吧里一声《嚎叫》，宣告了垮掉的时代的开始。与金斯堡同道的凯鲁亚特、巴勒斯等人从一个都市流浪到另一个都市，将艺术创作带入了纷乱迷醉的后现代时期。都市已成为他们生存的一种形式，都市成为他们生存的唯一空间。20 世纪 60 年代在美国纽约的格林尼治村聚集了一大批先锋艺术家。格林尼治村的崛起是后现代文化历史时刻的关键性象征。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是格林尼治村的主要创建发起人之一。在格林尼治村，后现代艺术的时间与空间诞生了。先锋派表演、波普艺术、行为艺术、摇滚音乐等后现代主义艺术在这里滋生蔓延。小说家罗纳德·萨根尼克在《下去与进来》中描绘了 1948—1986 年间的文学景象。在萨根尼克的叙述中，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是最为某些“垮掉的一代”诗人及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所喜爱的地方。萨根尼克说：“他们中有天主教社会活动家多萝西·戴维斯，还有约翰·凯奇、默瑟·坎宁安、保罗·古德曼、朱利安·贝克与朱迪思·马利纳。60 年代也有许多作家不去圣热默及布利克街的咖啡馆，而到‘东村’的一个叫‘斯坦利’的酒吧去。‘东村’的诗人与小说家，比如戴安娜·狄普瑞玛、特德·贝里根、杰罗姆·罗腾伯格、罗切尔·欧文与卡罗尔·伯奇——这些比‘垮掉的一代’稍年轻的同时代的人，已经在试图创造出自己的‘景观’来对‘垮掉的一代’卓著的声名做出反应。他们在咖啡馆参加社会活动、交流思想，并进行表演。正是这种流动的咖啡馆景观——非正式集会场所的规律性巡回演出——为所有领域的艺术家提供了社团基础。”<sup>①</sup>与法国的塞纳河左岸、美国的格林尼治村遥相呼应，在英国伦敦也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波希米亚地带，即“苏和区”。“大都市的、波希米亚式的、疯狂追赶时髦的苏和区，是伦敦

---

<sup>①</sup> [美] 萨利·贝恩斯：《1963 年的格林尼治村》，12 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自身的与外界分离的一道裂缝。这一平方英里的时尚是一个独立王国：是一个啤酒午餐和工余卖酒处的国度，是一个服饰附件和姿态的国度，在那里流行一时的东西无情竞争，想要成为时尚，形象就是一切；也是媒体国度的闪亮心脏地带，在那里，艺术、新闻、电影、广告和戏剧混合成一个引人注目的令人陶醉的鸡尾酒会……怎样才能成为这个波希米亚世界的一部分呢？你怎样才能像一个成功的顽重大出风头而又似乎漫不经心地显露出那种苏和区时尚的精华——那种你刚从《面孔》杂志上看了几眼的时尚？……这里有你应该学会的一整套无声语言、行为和穿衣的规矩，一长串的要和不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由生气勃勃的但疯狂的消费驱使的小宇宙。”<sup>①</sup>

都市空间是一个另类异质的异托邦所在。今天，塞纳河左岸、格林尼治村、苏和区已经成为文化地图上最具后现代艺术象征意义的都市空间，它们促进了后现代艺术的诞生与发展，后现代艺术在都市中找到了可以恣意纵横发挥的空间。都市空间的异质叛逆性滋生着都市艺术的异质叛逆性。它的美学原则是反美学，它的艺术原则是反艺术。在都市空间的放荡里，美学同样放荡着自己。作为一种异质文化，都市空间艺术对古典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颠覆和反叛。在都市空间里展示着迥异于传统的后现代艺术谱系。后现代艺术作为一种大众消费时代的文化，在都市空间里得到了充分的展览、实验。后现代艺术大师杜尚在1917年创作了一件惊世骇俗的艺术品《泉》，他堂而皇之地将一件现代日用品——小便池，摆放在纽约独立者展览会上，并将它命名为《泉》。杜尚的“小便池”颠覆粉碎了传统的艺术观念，彻底地宣告着一个反艺术时代的来临。在反艺术观念中，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一切也都不再是艺术。反艺术完全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它以极端怪诞的方式，宣布一切传统艺术观念的崩溃瓦解。传统的美学艺术观念是一种建立在高雅、高尚基础上的理性意识形态。在传统的美学观念中，艺术总是以一种高雅神圣的姿态君临于日常生活之上。支离破

---

① [英] 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194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碎的生活在传统的形式美的造型中，变得和谐完美；荒诞悖谬的生存状态，在传统美学的光照下，变得充满意义；卑琐烦扰的日常生活，在传统艺术的修饰中，变得优雅崇高。从后现代视阈来看，传统美学或艺术的矫饰，遮掩了真实的生活境况，蜕变为美丽的欺骗和虚伪的谎言。在都市欲望的放纵下，在都市欲望的空间里，生命的放纵、艺术的放浪成为颠覆固有观念的一种力量。里查德·美尔策在《摇滚美学》中将这种放浪叛逆的美学艺术描述为一个新的未知领域：“在不可捕捉的瞬间与不可感知的无限之间有一舞台，上面表演出某种介于捉摸不住的崇高和令人忘却的粗俗之间的东西……那种是未知的语言领域。”<sup>①</sup>古典艺术对生活的矫饰在这一放浪的空间里，完全失去了效力。诗从优雅的歌吟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号叫；绘画从和谐美的造像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变形；音乐从典雅的旋律变成了震耳欲聋的噪音震荡；舞蹈从美学的程式变成了身体欲望的摇滚宣泄。这一切具有叛逆性的反艺术形式，都为传统艺术空间所拒斥。博物馆、展览馆、大剧院、音乐厅，这些神圣的艺术殿堂，都将叛逆性的反艺术视为大逆不道。具有另类异质性的都市欲望空间因此成为这些叛逆艺术家的表现舞台。

后现代都市欲望空间中，放浪就是生活本身，因此，放浪也就成了艺术本身。后现代艺术在创作上打破了传统的美学形式。传统美学将艺术理解为创造，而后现代则将艺术理解为复制、并置、戏仿、装置、现成品；传统美学将艺术理解为美的追求，而后现代却不遗余力地展露着丑；传统美学将艺术理解为完美形式的和谐创造，而后现代则鼓吹表现碎片、断裂、不和谐、无秩序；传统美学主张艺术的崇高神圣，而后现代则极尽戏谑、反讽、游戏、调侃之伎俩。一切都是碎片、一切都是游戏，意义的丧失、价值的断裂、心灵的虚无，构成后现代艺术的精神困惑。

---

<sup>①</sup> 转引自 [英] 伯尼斯·马丁：《当代社会与文化艺术》，195 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第八章

# 面向生活世界与 日常生活空间的发现

人作为此在的生存者，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无法挣脱于世俗琐碎的日常生活世界。20 世纪，胡塞尔、海德格尔、卢卡奇、列斐伏尔等“面向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批判”的哲学致思，祛除了日常生活被遮蔽的状态，将存在回复到日常生活空间之中。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和每一个人存在的社会关系的综合，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在现实中发挥出整体作用的这些联系，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实现与体现出来。”<sup>①</sup>日常生活是人最现实、最具体的生存实践场域。日常生活空间成为人存在的起点和终点，人的解放只有真正回落到日常生活空间中，才能真正实现。

长久以来，日常生活因其庸常、琐碎、世俗的本性被长期地疏离于宏大的社会改造方案之外，文学艺术也都自觉打碎日常生活的

---

<sup>①</sup>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Vol. 1, p. 97, 1991.

自身逻辑，剔除其平庸本性，在将日常生活理性化、历史化、本质化的同时，形成了宏大叙事的诗意氛围。以苏青、施济美、予且、池莉、刘震云、方方、刘恒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尽管置身于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体制之下，但他们均着力消解过度“历史化”的文学神话，致力于还原完整、流动的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本相，破除抽象权力空间的绝对垄断地位，强化日常生活空间之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维度。他们的文本面向生活世界，展示了现代日常生活平庸与神奇的两面性，在抽象权力空间之外，带给人一个非课题化的、直观切己的日常生活空间。

## 第一节 日常生活批判：生活世界的平庸与神奇

几个世纪以来，在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下，日常生活被排斥于哲学家的思考范畴之外，他们专注于社会存在或世界存在的本体根基和本质规定的探索，甚至认为只有摆脱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思考。第一个洞见平庸生活神奇亮点的当属德国现象学派的缔造者——胡塞尔。他以现象学还原的方法，肯定了生活世界的先在性和前提性，认为生活世界是“预先就存在着”的地平线，“所有理想化及其意义基础都起源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使得这些理想化得以可能并且引发了这些理想化”<sup>①</sup>，甚至“科学的世界和包含在它之中具有科学的真理性的东西，正如一切以某种目标为划分范围的世界一样，本身属于生活世界。这正如人、人的群体、人的目标及其相应的创造物都属于生活世界一样”<sup>②</sup>。尽管胡塞尔现象学“面向生活世界”的研究方法并非真正要沉入生活中解决现实问题，但其从正面肯定了生活世界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的关系，将日常生活纳入哲学思索的范畴，使之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堪称 20 世纪日

---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273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② 倪梁康主编：《胡塞尔选集》，1085～1086 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常生活哲学的肇始者。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研究相比，海德格尔真正为“‘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打开了局面”<sup>①</sup>。在献给胡塞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在承继胡塞尔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中的此在还始终是个课题——不仅一般地在一个世界之中，而且它是在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向世界存在的方式中有所作为的”<sup>②</sup>。日常此在的人即“共处存在”的人，他们处于“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sup>③</sup>的“常人”状态，不具备主体性质，是失去了本真存在的人。只有艺术、审美，才能将“此在常人”从日常生活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实现“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从日常生活入手，阐释日常此在的原初性、根基性、构成性，建构出此在的生存论，但其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使其对“此在”的关注最终从日常生活的维度超越并抽离出来，日常生活向人敞开的同时，又被遮蔽起来。

真正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神奇亮点，肯定日常生活的革命力量和批判功能的，首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基人卢卡奇，其后列斐伏尔更是在大规模的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中发现，抽象权力空间对现代日常生活的控制已经渗入其间的所有细节，进而由日常生活批判转向空间政治学研究，拓展了日常生活研究的深广度。

卢卡奇在《审美特性》开篇即明确提出，日常生活永远是第一性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态度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日常态度既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sup>④</sup>不仅存在要以日常生活为场域展开，就连科学、宗教、审美也都是从日常生活的长河中分流出来的，因此，尽管日常生活“显得特别纷乱和毫无方向，但体现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之中的社会性，却只有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逐渐成熟起来”<sup>⑤</sup>，人的异化首先是从日常生活的异化开始

---

①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②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32页。

③ 同上书，148页。

④ [匈] 卢卡奇：《审美特性》，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⑤ [匈]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64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的，而根除异化的力量也来自于日常生活，因为“异化和反异化的斗争恰恰只能主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sup>①</sup>。这种肯定日常生活具有神奇与平庸两重性的观点成为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核心点，其历时 35 年创作完成的《日常生活批判》三卷本，被认为是西方理论界日常生活研究的典范之作。在这部巨著中，列斐伏尔将被哲学家拒之于门外的日常生活纳入研究范畴，使之成为哲学思考的对象。这种“用一种非平庸的看法来看平庸……把哲学运用到实践、人体、游戏、赌博和人类其他活动方面，从而改变陈旧过时的哲学研究”<sup>②</sup>方法在改造并扩大哲学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撼动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惯有认识。列斐伏尔由此与阿多诺、马尔库塞、卢卡奇等并列进入 20 世纪社会批判理论大师的行列。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其研究逻辑起点——对现代日常生活的界定——的巧妙确立。在《日常生活批判》中，他不断地强调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在强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彰显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分离的现代社会中，古典社会中每日生活（daily life）与艺术、科学、宗教、哲学等领域以及自然界和谐共处的关系被打破，日常生活被课题化、理性化、本质化的同时，亦被纳入到异化的轨道之中，像工业化的大机器一样单调、乏味而富有节奏。“让我们简单地说就是，每天生活是从来就存在着的，但充满着价值与神秘。而日常一词则表示这种每天的生活已经走向了现代性：日常作为一种规划当中的对象物，是通过一种等价交换的体制，一种市场化与广告，即市场而展现出来的。至于说到‘日常性’这个概念，它强调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同质化、重复性与碎片化特征。”<sup>③</sup>确立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内涵后，列斐伏尔从资本主义社

---

① [匈]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805 页。

② 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558 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③ [法] 亨利·列斐伏尔：《面向左翼文化》，转引自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39～40 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会生活的细微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工具理性、官僚体制、商品拜物教等牢牢地浸润并肢解着日常生活的肌体，资本主义的异化正是从日常生活的层面展开，并通达日常生活世界的所有细节。因此，“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充满幻象的庞大领域，我们所发现的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把自己表现得像真的一样，也因为紧紧效仿着真实的生活，好以相反的一面去取代真实的生活；它还以虚拟的欢乐取代真实的不幸，例如——以一种虚假的满足搪塞真实的快乐需求——诸如此类”<sup>①</sup>。在这样一个“虚拟化”、“抽象化”的世界中，人的解放脱离了日常生活的解放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因此，列斐伏尔在对非本真的、异化的日常生活予以拒绝的同时，也“坚持日常生活中尚存一些非工具理性和非功能主义的空间，诸如身体、感性、欲望”<sup>②</sup>，因为它们被寄寓为反抗压制和异化的革命性力量。日常生活列斐伏尔的理论视阈中始终具有压制与反压制、异化与反异化的双重可能性，反抗压制与异化的革命力量蕴含在日常生活内部。

然而，经过 35 年的研究，列斐伏尔目睹着人类日常生活异化的不断加剧，将探讨人类解放的视野全部向空间敞开，他认为，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空间特别是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空间取代了时间并成为最重要的统治工具。如何用日常生活的实践展开去建构一个适应人生存的差异性空间（differential space），以抵抗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矛盾空间（contradictory space）等对人的压迫控制，成为列斐伏尔思考的重要内容。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认为只有认清空间的政治性、策略性，才能“生产出适合人类存在的空间……以此作为变革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sup>③</sup>。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改变空间”<sup>④</sup>，“如果未曾生产一个适

---

①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Vol. 1, p. 35, 1991.

②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39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③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422, 1991.

④ Ibid., p. 190.

合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sup>①</sup>。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建构起的日常生活空间作为个体化、私人化的差异性空间，打破了抽象权力空间试图同质化地控制每个个体生命及其私人领域的企图，在强化差异的同时，提供了让人重新获得自由的可能。与列斐伏尔天才地将日常生活批判导入空间研究的范畴，并由此引发了西方文化思想研究的空间转向相比，匈牙利学者赫勒和法国学者德塞托的日常生活研究尽管成就不及前者，但他们或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或寻求对抗日常生活异化的策略，在 20 世纪的日常生活研究中别具一格，亦不可忽视。特别是德塞托彻底摒弃了日常生活形而上学的解放道路，他真正地沉潜到日常生活中，以迂回曲折、趁其不备的偷袭方式和最具可操作可行性的小策略、小花招、小诡计颠覆现代社会的理性秩序，削弱社会权力机制对人的控制压迫。其观点尽管不无消极抵抗的色彩，但却清晰地言说着抵抗日常生活异化的力量绝非来自于日常生活之外，它就孕育在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正是平庸日常生活的神奇和亮点，从而与列斐伏尔的观点不谋而合。

胡塞尔、列斐伏尔以及赫勒、德塞托等西方哲学家、社会学家对日常生活理论的构筑，不但使哲学思考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偏执，而且在让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的过程中，颠覆了艺术能够以超验之光烛照、拯救平庸生活的审美乌托邦。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裂痕消弭，日常生活或是以平民记事的方式统摄叙事程序、结构艺术全篇，借此还原完整、流动的日常生活图景和人生本相，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或是将日常生活的现成物直接作为艺术品展演出来，以此消除艺术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的“光晕”和“膜拜价值”，产生极大的震惊效果，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偶发艺术、激浪派艺术。作为二战后艺术界思想领袖的约瑟夫·波伊斯就曾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一旦他们相应的自由创作活力被激发并彰显出来，他们固有的艺术癖好就会使无论何种媒介都转变为

---

① [法]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47 页。

艺术作品”<sup>①</sup>。因此，艺术必须介入生活，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雕塑社会。上述林林总总的艺术创作，无论其艺术观念有着怎样的冲突，如狂热的波伊斯就曾对杜尚冷静旁观的艺术表达方式表示不满，高呼“人们高估了杜尚的沉默”，但他们都将日常生活带进艺术的殿堂，生产建构出一个符号化的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以艺术的多样化强化着差异性空间的多样化、个体化。类似的艺术创作在中国尽管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但依然层出不穷，它们摆脱了主流话语过度“历史化”的控制，破除了“民族国家”空间、阶级革命空间等抽象权力空间的束缚，既是个体性、私人性、差异性空间体验的结果，也是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一个生产主体。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的缺场与生活空间的消散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为解读思考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一个理论参照，成为我们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逻辑起点。纵观中国现代小说史，我们不难发现，启蒙、种族、国家、革命、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始终盘亘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它们在自我确证、自我辩护的文本书写中，消解了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日常生活被等同于“罪恶”、“堕落”及“小市民趣味”，只有经过“典型化”、“本质化”、“历史化”、“崇高化”的清理，才能以“寓言”的形式，重新进入话语系统，泛出诗意的光泽。

即便在高举个性解放，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五四”先锋人物，尽管将家庭、伦理、种族、国家等作为“解放自由的我”的对立物予以激烈批判，但他们“解放自由的我”的努力，却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个人

---

<sup>①</sup> 转引自马永建：《后现代主义艺术二十讲》，129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犹疑徘徊中，无法沉潜到生命存在的基底层——日常生活的层面。陈独秀就曾提出国家应被视为需要破坏的“虚伪的偶像”，它与民族、家庭、婚姻等一样，“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sup>①</sup>。李大钊也把“家园、阶级、族界”视为“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sup>②</sup>。但是，“五四人物的上述思想并没有形成逻辑一致的体系……‘种族’、‘国家’只有作为从前当作天经地义的一种偶像时，它才会成为个体意识的形成前提和部分归宿”<sup>③</sup>。对批判“合群的爱国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而言，“民族思想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sup>④</sup>，投身于政治性的而非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运动与他们宣扬的理论毫无矛盾。因此，以政治民族主义而非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建构的现代民族国家思想成为“五四”的主旋律，启蒙不过是该主旋律的“副部主题”<sup>⑤</sup>。

列斐伏尔在《什么是现代性？》中借用马克思的观点——即“国家的抽象性，直至现代世界才诞生，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性直到现时代才产生出来”<sup>⑥</sup>——指出出现代日常生活的抽象异化与国家的抽象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此外，现代国家的产生还进一步导致了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分离。我们认为，日常生活“五四”时期没有因自我的高扬、个人的发现而闪现出神奇亮点，以及人们对个性自由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关注始终疏离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现代世界对民族国家的抽象。包括“五四”文学在内的现代文学正是在民族国家主旋律与启蒙“副部主题”的交相辉映或此消彼长中，以启蒙理性、民族国家、阶级革命话语建构出

---

① 《独秀文存》，73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② 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见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47页。

③④ 同上书，48页。

⑤ 关于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问题，见汪晖：《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

⑥ [法]亨利·列斐伏尔：《什么是现代性？》，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的生产》，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表征性抽象权力空间，并以此强化着社会空间中权力空间的主导性、政治性。日常生活甚至被拒绝于以再现广阔社会历史生活为写作宗旨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大门外。只有数量微小的作家，以单薄之势顽强地在抽象权力空间的边缘缝隙处，书写着私人日常生活经验，抵抗着现代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掠夺与占有。其中以张爱玲、苏青、予且、施济美为代表的 20 世纪 40 年代海派作家最为典型。他们从“俗人哲学”的文化立场出发，以日常生活世界作为文本书写的基础性场域，以日常生活的实用主义逻辑消解、颠覆着历史的神圣性言说，展演了一部与民族、国家、时代、历史均“不相干”的“为生而生存”的俗人生活史。其中，女作家苏青的《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及《歧途佳人》等小说对女性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与书写，填补了“五四”启蒙主义女性文学的空白；苏青对启蒙主义宏大而抽象的“自由”、“独立”、“平等”观念持质疑的态度，她大胆、直率、通俗而又实际地从普通女性的视角审视凡俗人生与世态人情，她说：“我对于一个女作家写的什么：‘男女平等呀！一起上疆场呀！’就没有好感，要是她们肯老实谈谈月经期内行军的苦处，听来倒是入情入理的。”<sup>①</sup>针对“五四”后部分女作家性别意识丧失的现象，苏青也直言不讳地批评道，读“五四”文章出来的女性，“她们在思想上一定仍旧是男人的附庸。她们心中的是非标准紧跟着男人跑，不敢想男人们所不想的，也不敢不想男人们所想的，什么都没有自己的主意”<sup>②</sup>。“不问这东西——平等——是否为自己所需要，只因为它以前曾为他人所吝与，遂一意求之，这是斗气式的行为。”<sup>③</sup>“我敢说一个女子需要选举权、罢免权的程度，决不会比她需要月经期内的休息权更切；一个女人喜欢美术音乐的程度，也决不会比她喜欢孩子的笑容声音更深……”<sup>④</sup>上述言论尽管不无偏激之处，但却显现出苏青独具的敏锐犀利，她洞见了中

---

① 《苏青文集》，下卷，8 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② 同上书，8 页。

③ 同上书，20 页。

④ 同上书，146 页。

国新、旧文化体系之于女性的伪善，点破了女性解放过程中造成女性日常生活权益被高高悬置的缘由，乃是“五四”启蒙话语中萦绕的男性中心主义情结，这不无釜底抽薪的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青将一切超越经验层面的思想视为空谈，她的文本以日常生活为基点，在女性婚姻生活的点点滴滴的记录中，展现了女性尴尬的现实处境，述说着女性日常生活的诸种需求。其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在《风雨谈》月刊上连载后，随即印行出版。从1944年初版至1948年，该书竟印行18次。作者后来的《续结婚十年》也印行了4次。<sup>①</sup>正是其世俗、务实但不失真诚的生存理念打动了芸芸众生，她的小说始终没有被湮没在20世纪40年代国家空间的争霸战中。可见，世俗生活作为存在的基点和平台，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它既是知识化了的新市民群体和世俗化了的文人群体相互渗透的结果，也是文人在上海沦陷时期不得已的生存选择，更是对战争现代性的一种既无可奈何又不失机警的抵抗策略，它为生存空间、文化空间的多元化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虽然日常生活世界在20世纪40年代海派作家的笔下，被从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一体化的体系中抽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私人领域，但是在战争现代性的制约下，日常生活空间不仅淡出文学的视野，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成为人们耻于言谈的话题。因为，在民族危机、国土沦丧的生死危亡时刻，个体性命的哀叹低吟，日常生活的阴晴冷暖，只能成为捐躯赴国难的累赘。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相比，日常生活问题视野狭小、平庸细碎、沉迷流连，缺少激越昂扬的崇高精神。也正是因为对日常生活平庸本性的太过沉湎，对解决日常生活具体问题的太过关切，造成了40年代海派作家在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难之时，选择了无奈、顺从的生存策略，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都缺乏坚定反抗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国家政治权力机制为强化自身

---

<sup>①</sup> 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3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的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合理性，不断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建构崇高化与神圣化的革命历史叙事。文学艺术更是被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sup>①</sup>，成为意识形态的“寓言”文本。50年代初期，周扬作为党内文艺政策的权威阐释者、推行者，在《人民日报》发表《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其时文艺创作的头等重要任务是“表现中国人民中的这些先进人物，表现中国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力量，他们的高度的智慧和英雄主义。我们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新的人民的这种新的品质，表现共产党员的英雄形象，以他们的英勇事迹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广大群众和青年”<sup>②</sup>。此外，周恩来、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反复强调文艺工作必须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加强团结，加强学习，深入工农兵，熟悉工农兵，重视普及工作，切实改造旧文艺，使文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应该说，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及其后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政策的权威性解读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用一种思想规范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代。这些事件的深远影响体现在，以阶级革命斗争为核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其后很长时间内，成为文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带有神圣色彩的党性、革命性、阶级性取代了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成为文本建构的核心，透过火热的斗争生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把握时代本质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才是文学唯一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只有这样的文本才能在传播流程中得到受众的认同。因此，我们惊异地看到，革命通俗小说《林海雪原》出版发行不到一年就销售了50万册；《青春之歌》发行后不但多次再版，发行量超过500万册，而且被翻译成20种语言，在国外发行，成为日本、印尼等国的共产党员的教材；“红

---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艺论集》，4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② 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载《人民日报》，1951-06-27。

色圣经”《红岩》自1961年出版后，一年时间即发行500万册，创下当时长篇小说发行的最高纪录，八九十年代后，仍有很多出版社再版重印该书，总体销售量突破1000万册。数目如此庞大的革命斗争文学在党的规范下，以组织传播的方式，不断强化着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化观念，否定、批判、排斥着人性人道主义、个性解放以及日常生活等多元价值观，为国家权力机制消灭、压制异己思想服务；同时也型塑、控制着个体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对生命价值的判断以及对文学的伦理道德取向，并建构出同质化、一体化的表征性抽象权力空间。

在“十七年”<sup>①</sup>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抽象空间统治的不断强化导致了日常生活沟通的消失与意义的“零度化”。《青春之歌》、《红岩》、《山乡巨变》、《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文本，均将都市日常生活视为贪图享乐、腐化堕落、背离革命的隐喻符号。《千万不要忘记》正是从香烟、罐头、皮夹克和毛料服装等日常生活用品的细节中看出大问题，“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sup>②</sup>。因此，革命者特别是英雄，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他们必须远离日常生活，拒绝日常生活的诱惑。《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不满足于“整天是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洗衣、缝补等琐细的家务”<sup>③</sup>，她感到沉闷、窒息，担心日常生活会将她的革命性淹没、侵蚀、摧毁。《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永远将革命看作她唯一的并且是终极的价值追求，她拒绝婚姻、家庭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内容，劝说正在与陈大春谈恋爱的盛淑君“不要孩子生的太早了，对你的进步，会有妨碍”。《苦菜花》中的绢子以超出常人的坚韧毅力在战场上生下孩子，却无法承担起作为母亲的责任，她抵触、抗拒女性在日常家庭生活中的身份、角色，甚至诅咒

---

① 在本文中，“十七年”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这一时期。

②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12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

③ 杨沫：《青春之歌》，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刚出生的孩子：“都是你这个小东西，害的人守在家里，你不早死了好！”坚持要把孩子送人。日常生活小说文本中成为腐化革命者的重要介质，对日常生活的让步，也就是对反革命的纵容。因此，在《我们夫妇之间》这样一个以都市日常生活场景为核心展开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作者萧也牧因为对革命者日常生活存在的让步，和在轻松诙谐中取消了革命者日常生活的严肃性、政治性、思想性，而被指认为歪曲了工农出身的干部形象，辱没了革命生活的圣洁化要求，遭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为此，萧也牧检讨道：“我的错误首先是立场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而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弄错了，一切都错了。”<sup>①</sup>而作者以小说写作为载体，对中国革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对待日常生活诗学的消失，如何确立日常生活的合理合法性，如何解决城乡生存经验冲突，以及如何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空间等一系列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则在巨大的漠视中被彻底消解。

沉湎于日常生活，就意味着革命灵魂的消亡，正是这种对日常生活极度排斥的极权主义文化观念导致了生命本真状态在文本中的丧失，瓦解了英雄作为人，其人性的深刻性、丰富性、复杂性，“高”、“大”、“全”的空洞形象和专一、单纯地忠诚于某一权威结构的理想人格，注定要远离日常生活，不食人间烟火。作家梁斌在回忆酝酿、创作《红旗谱》的经历时，曾指出当时坚信，“只有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有希望写出革命的英雄形象”<sup>②</sup>，为此他“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认真学习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文件”<sup>③</sup>，在文学作品中创作出一个更完善的、没有缺点、也没有日常琐事的英雄人物的典型形象。日常生活被看作是“吃喝玩乐、结婚生子、享受并堕落的代名词，是

---

① 萧也牧：《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载《文艺报》，1951年5卷1期。

② 梁斌：《谈塑造人物形象》，见梁斌：《春潮集》，13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③ 梁斌：《谈创作准备》，参见上书，64页。

进步的拖累，觉悟的疣赘，革命的反革命，成长的误区”<sup>①</sup>，只有像《红岩》中甫志高那样的叛徒、反革命，才可能关注凡俗生活，沉溺于日常的快乐。甫志高不管工作多忙，每晚都要赶回家陪伴妻子，甚至在收到“不得回家”的危险警告后，仍在革命事业与日常生活之间艰难徘徊。当他想到如果不回去，也许以后就没有与妻子道别的机会了，便买了妻子爱吃的麻辣牛肉，毅然踏上不归路。甫志高这一经典的叛徒形象显现出权力掌控者对日常生活的态度，日常生活是阻碍革命、成长、进步的绊脚石，是造成革命者叛变的主导诱因。而“家”作为日常生活展开的最主要场域，在小说文本中不再是温暖、温馨的港湾，那里没有慈祥的母亲、关爱的妻子，有的只是敌人、特务布下的阴森恐怖的陷阱，它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吞噬革命者。因此，革命首先要消灭日常生活，消灭家庭私人生活空间与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的严格限制，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占领日常生活空间，进而建构出同质化、一体化的革命空间。任何对现代性革命观念挑战的观念或行为都将得到严厉的惩罚性批判和改造。

从生存论美学视阈看，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生存经验的表达，势必要在空间性的场域中展示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因此，一方面，人生产塑造社会空间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环境也生产塑造人，两者的辩证互动构成人类的空间性。美国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索亚曾提出：“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开始于身体，开始于自我的结构和行为，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的人类主体。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的更大空间与场所，也在我们只能去理解的意义上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用社会理论所熟悉的术语来说，即人类的空间性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sup>②</sup>因此，

---

① 蓝爱国：《解构十七年》，150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② [美] 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7页。

“十七年”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之间，政治权力操控者不断尝试以各种极端的手段，取缔家庭私人生活空间与革命公共空间之间的严格限制，其同质化、一体化文化空间的建构，控制并决定着生存于其间的人的空间体验，进而造成作家生存体验、审美体验以及文学理念的扭曲异化。因而，“十七年文学”和“文化大革命文学”频繁呈现的是个体意识的衰绝、主体心灵的破碎、现实观念的倒置，乃至文本生命内容的荒芜。日常生活在这强硬极端的历史化叙事语境中无处生存，由此也带来文化空间多元化的消失。



### 第三节 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 艺术化生存的多样可能性

随着现代书写技术的发展，“人类不断地破除自然的神秘化，同时逐渐远离自然循环时空，而将自身束缚于一种机械的理性化组织或制度之中”<sup>①</sup>。能够使人就范于此种组织化体制的，正是书写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固定化、辖域化。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所提出的日常生活被“形式化的空间统治”。因此，现代日常生活既是人生存于其间的空间，又是凝练了生存体验的文本生产建构的表征空间，它为现代文明的巨大力量所压抑、歪曲，因而它的异化是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特征，而国家或政治的异化乃是现代日常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列斐伏尔曾提出，“中央集权制国家象征着人类异化的神化……因此，人的解放的真正领域或者说代表人类解放真正方向的领域，应该说不是处于国家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sup>②</sup>。

日常生活无法真正从根本上为极权主义政治革命所彻底同化与

---

①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349页。

② 同上书，105页。

湮灭，其体内蕴集的神奇性力量总是促使其在一体化空间的缝隙处努力开凿，使其将“自身提升到集体与历史的层面上，并通过政治的意识达到政治的高度”<sup>①</sup>。然而，文学艺术生产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纠葛的状态，文学艺术家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也并不是由遮蔽否定日常生活跨越式地进入到发现并肯定日常生活，最终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重新安排，其间更多的是在对日常生活的游移、徘徊中，实现对日常生活的历史化处理，从而将日常生活提升到历史政治的高度。这种对日常生活予以历史化处理的方式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即新时期初期的文本写作中最为典型。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将生存空间展开的场域再次向西方世界敞开，一股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巨大潜流冲出历史地表，文学艺术家与其他国民一样，在对现代化的热切渴望中，关注着如何结束文化空间一体化的局面。对文学创作而言，结束一体化即意味着“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前，不存在什么‘禁区’，不存在什么‘金科玉律’，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sup>②</sup>。在 198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的“祝词”，也明确提出了“创作自由”的口号。尽管此时，思想戒律开始打破，日常生活不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但是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和国家政治的宏大视角仍然笼罩在文学艺术家的头脑深处，日常生活仍然被生活之外的力量压抑、歪曲，处于自在的状态。其中，刘心武的《班主任》、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灵与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路遥的《人生》、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等文本，虽然在题材内容、主题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但不可否认，这些文本均未破除过度“历史化”神话的笼罩，缺乏日常生活体验和隐秘个体感受的表述，其对

---

① 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223 页。

② 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226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日常生活的艺术呈现方式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日常生活在本中被赋予了历史价值维度的同时，其凡俗的一面亦被涤荡褪尽，文本充斥着启蒙主义的精英话语和理性主义的政治激情，显现出现代性话语对日常生活的整合，历史在文本中显露出庄严的意志。随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呈现鼎盛风貌的先锋小说作家尽管极力倡导艺术的多元主义，但其对日常生活依然缺乏足够的热情，在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洪峰的《奔丧》、《瀚海》，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格非的《褐色鸟群》等文本中，日常生活的凡俗面孔均被予以陌生化处理，作者以反乌托邦的先锋姿态在文本中建构起叙事的迷宫、暴力的美学。文本所展现的日常生活丧失了原初性、完整性和流动性，或像《现实一种》那样被抽象化，或像《拉萨河的女神》那样被神秘化，甚至飘忽不定，漂浮着鬼魅的气息。这也正是先锋小说对西方现代主义移植借鉴的必然结果。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就特别强调，现代主义文学率先接近并发现了日常生活世界，但这种接近并不是对日常生活的关照与理解，而是将日常生活陷入神秘化、抽象化的直观。“拒斥日常生活——工作、幸福——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现象、一种没落的中产阶级的病灶、一种集体神经衰弱症。”<sup>①</sup>在现代主义作家的眼中，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生活于其中的人，都不过是语言的幻象、抽象的符码，他们通过极力排斥日常生活对文本的浸润，缓解虚构与真实、幻象与现实、日常与超常之间的紧张，弥补其对日常生活世界的隔膜。

在艺术文本的世界里，新写实小说首先破除了语言的“形式化空间统治”权力，以平和的叙事心态，关切认同日常生活的文学理念，呈现出都市生活的庸常本性和神奇亮点，日常琐事成为文本展开的叙事动力势能。无论是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一去永不回》，还是刘震云的《单位》、

---

<sup>①</sup>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Vol. 1, p. 130, 1991.

《一地鸡毛》、《官人》，抑或是方方的《桃花灿烂》、《风景》等文本，均致力于还原已然形式化、标准化、透明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出非历史化、非典型化的日常生活混沌却元气淋漓的本相，并以文本生产的方式重构了日常生活空间，显现出日常生活空间的多样化特性。叙述人面对喧嚣涌动、困境重重的凡俗人生，从厨房、卧室、菜场、宿舍等充满琐碎细节的日常生活场域入手，不动声色地言说着被主流话语和精英话语合力压抑的生活流，回避着精神世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介入，关注着芸芸众生的痛苦无奈，在重构日常生活合理合法性的同时，寻觅着如何在平庸生活中通达幸福的途径。《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狭小的房间中，体验着赶车的拥挤、老婆的责骂、奖金泡汤等窘迫嘈杂之事。作为此在世界的一介凡夫俗子，印家厚无奈无助，但同时他也达观超脱，尽管老婆烫了鸡窝般的发式，“披了件衣服，没穿袜子，趿着鞋，憔悴的脸上雾一样灰暗”，但是，“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但那又怎么样呢？”印家厚正是通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俗人信条和以此为信条为依托所展开的一系列自我心理调整来适应现实，在凡俗的日常经验结构中实现着对生活的执著。《太阳出世》中赵胜天和李小兰在结婚当天打架，新娘穿着婚纱骂大街，但正是这么一对调皮、轻浮、无知、浪漫的年轻人，却在买奶粉、上医院、办户口、请保姆、庆生日等“鸡零狗碎”般生儿育女的历练中走向成熟、稳重。这些变化让叙述人在文本中慨叹：“养一个孩子又是多么有意思！……是你（孩子）默默无声地把他们变成了稳重的成年人。从前他们不知友爱，现在他们对你对其他孩子对老人对所有人都充满爱意充满宽容，自然，会爱的同时也会了恨。都因为有了你，孩子。”<sup>①</sup>生育作为日常生活恒常延续的基础，以其难以抗拒的世俗性，取代了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考，成为引导灵魂走向高处的原动力。除生育外，生活的多幅世俗性面孔均在新写实小说家那

---

<sup>①</sup> 池莉：《太阳出世》，11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

里得到宽容与认同。池莉曾坦陈：“我希望我具备世俗的感受能力和世俗的眼光，还有世俗的语言，以便我与人们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以便我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观察生命的视点。”<sup>①</sup>刘震云在《磨损与丧失》中也谈到：“我们拥有世界，但这个世界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它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存证明的标志。”<sup>②</sup>

日常生活世界成为新写实小说展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精神世界和语言形式的建构被放逐，生命存在、生存活动、生存境遇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无关，说到底还是生存空间的问题。日常生活之外的现代性宏大理念无法证明生存的价值，只有回复到日常生活世界中，生命的存在才能真正找到根源。对凡夫俗子来说，需要焦虑的不是国家的现代化何以可能，而是如何调动发掘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异质性、批判性、反思性因素，对抗日常生活对人的压迫异化。这也正是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提出的，“在最熟悉的事务中，那些不曾知晓的，非神秘的，是最丰富的，生活的这种丰富内涵还外在于我们空虚的黑暗的意识，与此同时这种意识被种种冒名顶替的东西所占据着，为纯粹理性的形式，为虚构的东西与充满着想象的诗篇所吞噬着”<sup>③</sup>，因此，“日常生活批判的目的不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取而代之，而是重新安排日常生活”<sup>④</sup>。《一地鸡毛》中，大学毕业的小林身上承袭着浓厚的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试图形而上学地探究生命的价值，指示生存的方向，然而，当买豆腐、赶早班、捅炉子、接送孩子、送礼调动工作、卖鸭子挣外快等“一地鸡毛”般的日常小事铺天盖地向他压过来的时候，他的精英意识彻底地为周围的世俗生活所淹没，在无数个挫折面前小林终于懂得，“生活是严峻的，严峻不是要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

---

① 池莉：《我》，载《花城》，1997（5）。

②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2）。

③ H.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Vol. 1, p. 132. 1991.

④ Ibid., p. 129.



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过去有过宏伟的理想，但那是幼稚不成熟的。一切还是从排队买豆腐白菜开始吧”<sup>①</sup>。在日常生活多样化、异质化空间中，现代日常生活依然以内在隐形的方式无孔不入地完成着对人性本真的扭曲，“一种孤独而凄厉的尖叫声正从来自日常生活的腹地深处和洞穴中升起……川流不息的沟通以及穿梭往来的信息传递相反却导致了难以忍受的孤独”<sup>②</sup>，日常生活成为规划人、逼迫人就范于体制的一种超级力量，丰富敏锐的情感世界被侵蚀，具有前现代性特质的淳朴本真情感失落。因此，小林对旧日恩师来京就医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尽管恩师的去世让他难过伤心，但一旦返回日常生活世界，坐上回家的车，便想起“家里的大白菜堆在一起有些发热，等他回去拆堆散热，就把老师的事给放到一边了。死的已经死了，再想也没有用，活着的还是先考虑大白菜为好。小林又想，如果收拾完大白菜，老婆能用微波炉再给他烤点鸡，让他喝瓶啤酒，他就没有什么不满足了”<sup>③</sup>。这便是个体生命顺应日常经验，重新安排的日常生活，也只有这样忍辱负重，以坚韧的精神求生存的日常小策略、小战术，才能缓解个体自我与日常生活之间构成的巨大压力。这种小战术就是法国学者德塞托所提出的日常生活反抗策略。

对于反抗日常生活异化，德塞托有着与列斐伏尔完全不同的方式。他反对列斐伏尔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总体性革命战略，即通过狂欢节、节日庆典、集会游行等都市生活内容打破常规秩序的控制，实现自由生存。德塞托沉潜到日常生活本身寻找解决之道，他把权力规训看作战略统治，将日常生活抵抗看作一种暗暗进行的、不易觉察的战术，“战略（strategy）拥有自己的领地，比如学校、军队、企业等，它可以在这些场域从容地行使自己的权力……战术（tactics）则没有自己合适的地盘，它是依附于战略空间的。战术不

---

① 刘震云：《磨损与丧失》，载《中篇小说选刊》，1991（2）。

② H.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p. 125, 2000.

③ 刘震云：《一地鸡毛》，233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能依赖正规的（空间或体制机构的位置），也不在于有一个与他者区分清楚的整体边界线，战术的场地属于他者，战术在别人的地盘上零散地暗示出自己，不能整个地颠覆他者，不能远离他者。它没有供自行支配的可以用以发挥自己优势、准备扩张、确保独立于各种情境的基地。由于缺乏必要的场地，因此战术反抗只能巧妙地潜伏进别人的空间，混迹其中，抽空子暗暗地利用一下战略的地盘和资源显示自己的存在”<sup>①</sup>。正是这种迂回偷袭、趁其不备的偷袭（poaching）、小诡计（guileful ruses）、小花招（tricks）克服了权力规训战略过度组织化、笨重的弊端，发挥了敏捷、灵活和富有创造性的优势，削弱了社会体制的压迫强度，缓解了生存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个体意志的实现。《一去永不回》中的温泉巧妙利用带有消极色彩的反抗策略，设计夺回了所爱之人，痛斥欺辱过她的同事，并成功得到了护士长这个原来对她来说难以企及的职位。盘算计谋的时候，“她全身发热，脸烧得通红，但同时她又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一定能成功。她表面是一个文静的姑娘，内心却充满玩火的渴望”。此时的温泉早已不是那个青涩涩的“中学生”，她熟谙生存智慧，“腰背挺得很直”，“脸上挂着胸有成竹的微笑”，剪了一种很短的女式短发，头发在额前翻个波浪向后卷曲。当“她旁若无人地在医院大门里走出走进时，门房的老头老太太们总要感叹一番：咳，女儿比母亲当年漂亮多了！厉害多了！”《不谈爱情》中，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庄建非谈恋爱的吉玲尽管出身花楼街小市民阶层，但吉玲及其家人却八面玲珑，有着丰富的处世经验，和“尽管还不知道那就是机遇但却能够把握住它的本能”。庄建非突然造访时，吉玲家的“脏话立刻消失了，凶神恶煞的动作也收敛了。她们细声细气地让座、倒茶……酒席上竟然使用了公共筷子”，“她们既不多话也不冷落，只是热情似火，只管使庄建非处处自由自在，不受一点拘束”。吉玲不但因此摆脱底层草根的身份，嫁入庄家，而且在其后的离婚大战中巧妙斡旋、步步为营，彻底挫

---

① 周宪：《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败了庄家的锐气。这也正是吉玲所代表的俗人，面对生活的“机灵”之处，毕竟，生活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正如苏童《离婚指南》所说的那样，“春季匆匆来临，冬天（离婚）的事情就成为过眼云烟”。婚姻的风景并不亮丽，生活的世界也并不完美，“美好的东西像夕阳一样总是瞬间的，持久的倒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或者是烈日当头在地里割毛豆的时候”<sup>①</sup>。完美的生活不过是一个幻影，正是那些不得已的小战术、小伎俩、小机灵、小聪明，让温泉、吉玲、杨泊、张大民以及其他众多的凡俗之人，在“日常生活苦难性”历练的“适应”（adaption）中，成功抵抗社会权力机制的强大压迫，使重新被安排的日常生活尽可能符合个体的需求。而只有这些“适应环境的人才能克服强制……适应吸收强制，并把强制转变成各式各样的产物”<sup>②</sup>，这就是弱势者的日常生活艺术。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也曾论及小诡计之于俗人的抵抗性作用。他说：“戏弄或智胜对方的游戏，有数不胜数的方式——这些方式描画出各种群体微妙而顽强的抵抗行为。这些群体由于缺少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不得不进入那些已然确立的力量与表述当中。大众必须权且利用他们拥有的一切。在这些战斗者的各种计策当中，有一种突然袭击的艺术，即回避、绕开束缚性空间之规则的快感——甚至在操纵与享乐的场域中也是如此。”<sup>③</sup>而这种小诡计式的战术反抗手段颇多，其中以日常化大众口语取代规范化书面语言是新写实小说家的重要战术，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着理性秩序与等级区隔的书写文化，温存地抚慰着读者疲惫的心灵，使其坚持并坚守在日常生活空间中，于无声处抗拒着日常生活对人的压抑异化。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方方的《出门寻死》，小说放弃了《风景》中残余的精英意识，在“好死”与“赖活”生命思考中，坚定地选择了后

---

① 刘震云：《一地鸡毛》，233页。

② H.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p. 88, 2000.

③ [法] 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转引自 [美] 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4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者。文本中无论是主人公下岗女工兼家庭主妇何汉晴，还是其婆婆、小姑建美，面对“出门寻死”这一原本重大的家庭事件，均采取了调侃戏谑的民间化口语方式，在嬉笑怒骂间化解了生活的灰暗艰难，体现了大众富有反抗性的俗人生活哲学。当何汉晴喊着“我活得不耐烦了”时，其婆婆没有大讲生存的道理，甚至没有劝阻，反而激将说：“长江上没得盖子，铁路边没得警察，厨房里有刀，药店里有药。挡别的挡得住，挡死是挡不住的。”小姑建美对“寻死”失败后安全回家的何汉晴调侃道：“我嫂子呀，走到江边，一看，咦呀，这好的江水，死在里面会搞脏的，跳不得；走到铁路边，一看，咦呀，轧死了我是小事，这不是害了别个司机？这撞不得；回到厨房拿起刀，一看啦，砍缺了口子，明儿过年婆婆剁肉刀子不快了，这用不得；最后跑到药铺里，一看，死个人买药还要花这多钱，鬼才买它。嫂子转遍了汉口，硬是找不出个法子让自己死。”这就在嬉笑怒骂间化解了何汉晴归家后的窘迫，坚定了其“赖活”的决心，使其安然回复日常生活现场。以诸如此类的灵活自由、充满生命张力的大众日常口语建构起来的新写实文本，放弃了对终极真理价值的追求和挖掘生活“内在规律”的诉求，他们推崇自然，重视日常生活图景的自然触摸，以“零度介入”的呈现式叙述口吻，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和大众化、世俗化的日常口语，言说着日常生活本身，力图从艰难的生活中挖掘出希望的种子。刘震云就自称：“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生活给我的影响最大，写生活本身，不要指导别人干什么”<sup>①</sup>。池莉也曾说，自己是“流水账”似的“只作拼版工作，而不是剪辑，不动剪刀，不添油加醋”<sup>②</sup>。正是这种叙述话语“拒斥形而上学”的转向，在为我们建构出一个尽管不够完美却坚韧绵延的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同时，使语言向生活世界洞开，揭示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和不可还原性，让语言从权力世界的缝隙处生长出来，摆脱了语言

---

①② 转引自王敏：《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载《福建论坛》，2005（4）。

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束缚。

语言总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只有把语言从远离现实的情境中拯救出来，我们才能让语言以及依靠语言而存在的此在生存真正回归到日常生活世界，表达日常生活经验，进而打开日常生活世界的语言空间、语境空间、符号空间。

新写实小说对日常生活的还原，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以及日常语言的张扬，破除了抽象权力空间统治同质化、一体化、系统化的压抑本性，将人的主观精神从压抑化的体系中解放出来，恢复了人的日常生存权利，让人在切近日常生活的同时，获得了走向本真的可能。另一方面，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重构与强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由都市空间的异质性所带来的生活经验的多元化、个性化。异质化是现代都市的一个本性，列斐伏尔即对都市生活的异质性极力提倡，路易·沃斯更是将异质现象与人口数量及密度作为城市的一个决定因素。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中提出，用陌生人聚集观念来重新认识都市及其异质性。人作为空间性的存在者，其生存经验、审美经验的取得总是受制于特定的生存空间。都市日常生活空间的异质化确立了生活经验的多元主义表达方式，并从根本上为审美生活的个体化、多元化、异质化提供了可能。因此，尽管新写实小说曾遭到不同学者的诋毁，或认为它驯顺、世俗，是对不合理现实的和解、妥协；或提出它“不能承担起建构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功用，读者难以从中获得更为高尚脱俗的精神启示，它在 90 年代中期以后衰落是不可避免的”<sup>①</sup>，但从《白鹿原》、《长恨歌》、《大浴女》、《旧址》、《受活》等小说文本中，我们不难发现，日常生活的书写、生活空间的重构、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并没有随着新写实写作的落潮而归于平淡，它们摆脱了历史化、典型化、一体化的限约，在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个体与群体、断裂与延续等二元对立的缝隙处生长壮大，在糅合上述冲突的同时，显现出历史乃是

---

<sup>①</sup> 转引自王敏：《论新写实小说的后现代性》，载《福建论坛》，2005（4）。

由个体日常生活史构筑而成的观念，零碎的日常生活不再是历史长流中不起眼的沙子，它们既是历史的必然构成，也是对文化、革命、政治、历史予以个体化反思的基础。正是当下文学文本对表征性日常生活空间不遗余力的建构及其内里隐含的表征、象征意蕴，改变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认知，强化了文学艺术审美的多样可能性，进而改变了由生存空间同质化、抽象化而造成的压迫感、异化感、扭曲感，显示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明确的总体性认知。

## 第九章

# 文化政治权力 与身体的空间规训

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身体在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构成空间的身位性，成为空间坐标的主轴，是空间的原点或焦点。因此，身体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同样，空间也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从空间政治学的角度看，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同样，对身体的压迫也总是从对空间的技术统治开始的。因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正是不能被简化还原、不可颠覆的身体”<sup>①</sup>。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为文学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它激发我们以身体的空间统治技术为切入点，探究空间如何在政治权力的驱使下控制、圈限、扭曲、压迫人的身体，同时，身体作为生命的载体，又是如何抵抗空间的压迫，进而改变空间，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p. 89, 1976.

题。在男权主义中心社会的控制下，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这种压迫正是通过空间对身体的圈限而得以具体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性别压迫的历史必然是身体控制压迫的历史，而身体控制的历史必然是空间控制压迫的历史。因此，考察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紧张的权力统制关系，也就成为理解身体空间政治学的独特视角。

## 第一节 从身体的贬抑放逐到身体的空间政治

人在社会空间中生产自身，同时也是社会空间的生产建构主体。因此，人类不仅要用眼睛、用理智去认识空间，而且还需要调动整个身体去感受并占有空间。身体是空间的原点，“空间总是被身体所占有”<sup>①</sup>，因此，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成为空间生产的主体。所有空间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外在客观实在的改变，或地理地貌、建筑景观等物理空间的改变，而是身体居于其中的改变。身体在空间中集聚展演，身体在空间中所展现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空间的建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身体位于空间的核心处，是空间的焦点，并构成空间坐标的主轴。身体的改变即是空间的改变，然而，在人类历史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身体或以悖论的方式存在，或被遮蔽放逐于历史话语之外，丧失了身体原点的空间被重新以宗教或家族伦理思想灌注。空间成为对身体压迫规训的场域，人的本真性生存意蕴在空间中被否定，生存空间的压抑性被强化出来。

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起来，在高扬灵魂的同时，贬损着身体的价值。他认为身体是贪欲的，灵魂是圣洁的；身体是短暂的，灵魂是永恒的；身体通向愚昧，灵魂通向智慧。在这样的极端二元论架构中，身体成为人类探寻真理之路的障

---

<sup>①</sup>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170, 1991.

碍。因此，“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保持自身的纯洁”<sup>①</sup>。中世纪时，奥古斯丁将柏拉图主义纳入宗教神学的体系，在宣扬上帝之爱与人的世俗之爱对立的过程中，倡导世人通过克己、苦行、斋戒、祈祷等束缚身体的方式，顺应上帝。他认为，“顺应人的生活”实质就是顺应肉体生活，为此奥古斯丁警告世人，“如果人顺应人而生活，而不是顺应上帝而生活，那么他就近似于魔鬼。因为即使是天使，他也不是顺应天使而生活，而是顺应上帝而生活”。人只有摒弃身体，才能顺应上帝，以此让灵魂超脱“尘世国度”，通达“上帝之城”，获得永生。

尽管古希腊哲学家与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思想家都是生活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即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200年，但由于后者缺少二元论思想的架构，他们对身体的态度因而显示出与古希腊哲学家的不尽相同之处。无论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还是道家的“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的观念，在“修身”的问题上，二者并无矛盾冲突。特别是“儒家所认识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包括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四层次的人，因此人能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和自然乃至宇宙的生化大道结合起来”<sup>②</sup>。尽管儒家特别强调身体存在的本体性、价值性，要求人们修身养性、敬畏生命，但在“仁”、“义”至上的伦理道德面前，尤其是当身体与其发生冲突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还是成为道德的最高境界，身体在崇高的伦理道德面前最终被舍弃放逐。及至宋代，在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规训下，身体被等同于赤裸的欲望快感，文学艺术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也多为道德的化身，身体成为道德训诫的场域。这种道德规范被不断地宣教，强化为一种坚固的文化传统。

---

① [古希腊] 柏拉图：《裴多》，1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② 杜维明：《从身心灵神四层次看儒家的仁学》，217页，《中国哲学范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为提升灵魂境界而贬抑沉重的肉身，已经成为中西方古代思想中的坚固传统。这种传统即使在弘扬理性主体精神的近代，也并无根本性的改观。笛卡儿作为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在身与心的问题上显现出与中世纪哲学家相异的观点。从柏拉图到中世纪，我们看到，身体尽管遭受了诸多的鞭挞、贬损，但它始终作为灵魂的对立物，丑陋地存在着。笛卡儿并没有强调身体污秽、丑陋的一面，他认为身与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相互平行的实体，“身体是可分地，它可以离开我，完完全全在我的意识之外；思是不可分地，它不能离开我，是我的整体或全部”<sup>①</sup>，因此，理性的精神、意识成为衡量人存在的前提，即“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种自明性的理性精神的烛照下，身体以及其他感性因素被排斥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之外。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精神完成了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祛魅，理性进一步成为检验衡量世界的尺度。只有运用理性，人类才可能认识自然的真相；只有运用理性，人类才可能确立自我主体的建构；只有运用理性，人类才可能建立公平正义的公共社会；只有运用理性，人类才可能走向历史的自由之境。理性构成自然、社会、历史乃至人自身的普遍通约之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就提出：“人的第一条法则则是维护自己的生存，人最关怀的是他自己；人一达到理性的年龄，单凭自己来判别适于自保的手段，就立即从而成为自己的主宰。”<sup>②</sup>理性在卢梭那里成为立人、立法的关键所在，成为通过立人、立法确立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基本准则。而感性的身体，尽管在此刻终于摆脱了被世人诟病的命运，却在理性的遮蔽下被永远地放逐。

丧失了身体原点的空间，以理性规范的方式控制、管理、压抑着人。直到尼采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身体被贬抑被放逐的局面，恢复了生存空间的肉体中心，即空间的身体性。19世纪末，

---

① 叶秀山：《西方哲学史》，第4卷，8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生命哲学的创造者尼采狂热地叫喊着身体较精神更伟大，他从身体入手，在对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传统予以彻底否定的同时，将身体突出暴露在哲学研究的视野之内。在《权力意志》中，他提出哲学研究“要以肉体为准绳”。“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sup>①</sup>感性的身体挣脱了理性的锁链，充盈着活跃欢愉的自我升腾力量，成为尼采的权力意志本身。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嘲弄着轻视身体的人，为身体平反，他指出：“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单一意义的复体……我的兄弟，你的小理智——被你称为‘精神’的，是你的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理智的小工具与小玩物。你常说着‘我’而以这个字自豪，但是更伟大的——而你不愿相信——是你的肉体 and 它的大理智：它不言‘我’，而实行‘我’。我的兄弟，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sup>②</sup>尼采对“我”这个主体哲学建构基础的颠覆，开辟了20世纪哲学研究的新方向。他在警告那些肉体的轻蔑者绝不可能通达超人桥梁的同时，确立了阐释世界及人类历史的新起点——身体。

尼采之后，将身体与空间联系为一体加以研究的是三位来自法国的思想家——梅洛-庞蒂、列斐伏尔和福柯。梅洛-庞蒂最早提出“身体的空间性”这一概念，从存在论视阈出发，强调身体的空间性不是如同外部物体的空间性或“空间感觉”的空间性那样的一种位置的空间性，而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身体的空间性是身体的存在的展开，身体作为身体实现的方式。在梅洛-庞蒂看来，身体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没有身体的话，也就没有空间。

---

① [德] 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15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② [德]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与梅洛-庞蒂略有不同，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试图以身体为核心、以生产实践论为理论视阈，对空间的生产建构及其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他提出，“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sup>①</sup>。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残存》中提出，“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正是不能被简化还原、不可颠覆的身体”，“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关系的再生产”<sup>②</sup>。在列斐伏尔看来，身体既是空间的原点，也是他所试图构建的空间生产理论的主轴，只有强调了空间的身体性与身体的空间性，才能确认空间是生产实践的产物，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实践性。空间在被生产建构出来的同时，也成为对身体进行规训压迫的场域，因此，破除身体压迫，必须从破除生存空间的同质性、压抑性开始。

与列斐伏尔相比，福柯真正揭示了身体统治技术与空间规划技术之间的紧密关联，建构出关于身体的空间政治学。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作为尼采的信徒，从身体出发建构出独特的谱系学研究方法，让身体在文化思想界获得前所未有的张扬。在福柯看来，身体是历史的铭刻物，各类社会实践的内容都是围绕身体而展开的，身体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不断地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分割、重组、控制。因此，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身体的历史，就是对身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历史。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就提出：“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sup>③</sup>身体成为权力机制对人进行规训与惩罚的起点，只不过古典时期的身体惩罚是一种粗暴、血腥的再现型惩罚。与之相比，现代社会的身體规训技术变得愈发微妙：“既不是用武器，也不借助恐怖……也就是说，可能有一种关于肉体的‘知识’，但不完全是关于肉体功能运作的科学；可能有对肉体力量的驾驭，但

---

①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173, 1991.

②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p. 89, 1976.

③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2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9。

又不仅是征服它们的能力；这种知识和这种驾驭构成了某种可以称为肉体的政治技术学。”<sup>①</sup>因此，现代社会“施加于肉体的权力不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该被视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人们应该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解读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进行某种交易的契约或对一块领土的征服”<sup>②</sup>。边沁在1787年设计的“圆形监狱”，因其对身体控制技术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成为福柯分析现代权力统治技术空间化的典型构。因此，我们说福柯虽然没有像列斐伏尔那样试图建立系统化的空间理论，但他揭橥了身体统治技术与空间规划技术之间的紧密关联，建构出关于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空间规划的动机发端于对身体的规划、圈限，空间的重组、区隔的目的不外乎强化对身体的控制。关于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激发了我们以身体的空间统治技术为切入点，探究文学如何在政治权力的驱使下控制、圈限、扭曲、压迫人的身体，进而钳制社会思想的好奇心。身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为文学研究拓展了一条新的路径。

## 第二节 性别、身体与空间压迫的历史

性别、身体与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主题。“女权主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对空间与人的社会性做了很多的研究。她们主要致力于对不同社会类别，如性别、种族、阶级等与物质的空间的关系的研究。比如，人们是如何体验空间的？空间是否有性别属性？父权社会机制和话语是如何在政治、经济、法律和

---

<sup>①②</sup>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28页。

文化等领域对妇女的空间进行规范和限制的？”<sup>①</sup>在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社会控制下，女性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境遇，这种压迫正是通过空间对身体的圈限而得以具体的操作实施并最终完成。因此，考察性别、身体与空间之间所充斥的权力统制的紧张关系，成为理解身体空间政治学的独特视角。罗兰·巴特在《巴特论巴特》一书中说，我和你的不同，就是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同样，对女性主义者而言，性别差异的基础就在于男性与女性身体的不同。女性的身体历来都是权力控制的焦点，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的压迫，正是从女性的身体渗入，继而蔓延开来。因此，女性的身体成为王权、父权、夫权竞相争逐的场域。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安妮·莱克瑞克试图通过女性身体重塑女性观念、女性意识，她认为女性必须从父权制的控制下解放她们的身体，为此要学会在男性标准模式之外重新评价女性的身体。另一位法国女性主义学者露西·艾瑞格瑞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他们的精神分析建立在阳具中心的单一性别基础上，女性作为“他者”，只能是男性单一性别的反射。她认为，只有通过女性的身体及其独特的欲望模式的建构，才能建立起一套新的关照女性的话语系统，改变女性在象征秩序中被放逐的境遇。被历史尘封的身体，成为女性主义反对性别压迫的核心概念，具有解构菲勒斯（Phallus）中心的强力能量。

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身体的控制压迫也总是开始于空间。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同样，对身体的压迫也总是从对空间的技术统治开始的。因此，“女性在历史上向来被排斥于一些空间之外，或局限于一些空间。与种族隔离一样，男女生存的空间从来就是‘隔离的和不平等的’，对女性的‘规范的空间’的建构往往能说明空间的性别”<sup>②</sup>。从这一意义上说，性别压迫的历史必然是身体控制压迫的历史，而

---

① 苏红军：《时空观：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见苏红军、柏禄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47页。

② 同上书，48页。

身体控制的历史必然是空间控制压迫的历史。

透过性别与身体被男性权力空间所控制压迫的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与象征权力、强大、自由的男性不同，女性的身体是被控制、压迫、改造的对象，女性的身体空间呈现出狭小局促性、自我圈限性（enclosure）、压抑扭曲性和道德训诫性的特点。父权制对女性的身体统治技术，总是打着伦理道德的旗号，以圈限身体的空间移动范围为起点，以扭曲戕害女性身体为终点，整饬着女性生命的经纬。在号称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式，“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易经》中，我们的祖先便以顺应自然为托词，无可辩驳地提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礼记·内则》中以“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思想圈定了女性身体活动的空间场域。汉代《白虎通德论》中“妇人无专制之义，御众之任，交接辞让之礼，职在供养馈食之间”的伦理规范，更是将女性严格限制在“相夫教子、操持家务”的家庭活动中。伴随着女性生存空间的日益狭小局促，家成为女性唯一的领地，能否完成生养宗祧之嗣的责任，成为衡量女性身体价值的标准，身体不再属于女性自己，女性身体空间的归属感全部丧失，她的身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列女传》、《女诫》、《闺训千字文》、《温氏母训》等约束女性身体进而控制女性精神的伦理规范，经由权力机制的推崇张扬，逐渐内化为女性自我压迫的法则，女性身体中源于自然的生命能量、生命激情被封建礼教消磨殆尽。当女性身体沦为权力角逐的场域时，身体的空间控制改造技术也打着审美的旗号盯上了女性的身体。柔弱、顺从、贞节等身体特征，因符合女性“第二性”身份，成为男权社会衡量女性美的标准。《诗经·卫风·硕人》中的女性“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陌上桑》中的罗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

帽著绡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诸如此类的女性形象塑造背后，隐藏着男权规训与控制的眼睛，在菲勒斯男性中心的文化系统中，女性无论其爱的行为有多坚贞，都仅仅是丧失了自我主体的“物”的符号，被置于“凝视”的境地，在失语的状态下成为男性“看”的对象。正如男性凝视理论的提出者劳拉·穆尔维所说：“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作用的是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快感分裂为照此风格化的女性形体上。”<sup>①</sup>此外，在男权文化体系的建构中，柔美型女性形象建构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力图借助美对女性的强大诱惑力和屈从力，以文化渗透的方式，召唤女性接受“他者”的地位，并内化出女性自我压迫的法则，实现女性生存空间的自我圈限（self-enclosure）。

从身体空间中的性别政治学角度看，性别、身体与空间始终是权力统制运作的场域，“对妇女来说，现存的空间是造成她们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男性对妇女的社会空间的安排是男性控制妇女的一个重要工具”<sup>②</sup>。中国古代女性缠足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最具典型意义的女性身体空间隔离圈限的历史。在尊儒学、尚六经的宋代，一场针对女性身体的空间控制技术——缠足，翻开了其后八百年历史的第一页。一双小脚圈定了女性身体空间的狭小范畴，控制着女性全部的生命价值。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便有“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的说法。邹英在《葑菲闲谈》中也谈到，“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果欲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以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泽，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

---

① [美] 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见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56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② 苏红军：《时空观：西方女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见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48页。

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sup>①</sup>。一双步步生莲花的小脚成为女性美的必备因素，甚至“所有莲事之附属品，及莲之本质，皆富有艺术价值。外而一鞋、一袜、一带、一帛，内而柔肌、腻肤、玉趾、秀腕”<sup>②</sup>，均作为美的对象受到社会的关注，男性见之而爱，旁人见之而誉，女性视之而欢，握之而喜，民间亦有赛莲、品莲的活动。因此，从宋代至民国的800多年间，女性忍受着诸种痛楚，心甘情愿地将小脚塞进三寸大小的鞋中，以换取无穷的荣宠的时候，也是女性在男性期许的目光中完成自我圈限和自我讯唤的过程。

19世纪中叶，当中国站在历史的新起点，被迫展开其现代化进程时，维新知识分子便发起了反缠足运动。尽管，反缠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女性空间的身体性颠覆，但该运动发起的目的却不完全源于男性的自省。一双能够自由行走的天足为女性破除生存空间的圈限提供了物质保证，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身体壁垒森严的控制至此被撬开一角。有了健康的双脚，女性才可能迈进学堂的大门，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有了自由的双脚，女性才可能勇敢地冲出家庭，反抗束缚。身体是不能被某一固定的空间场域所全然框限，它总是寻求着突围的可能，然而，中国女性的这场解放运动竟然陷入历史的悖论中，女性身体突围的动力竟然源自她们的压迫者——男性。康有为的《请禁妇女裹足折》在当时影响最大，他在文章中提出：（缠足）“血气不流，气息污秽，足疾易作，上传身体，或流传子孙，弈世体弱。是皆国民也，羸弱流传，何以为兵乎？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sup>③</sup>从这篇言辞激扬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缠足作为民族病体的隐喻，被赋予

---

① 邹英：《采菲续录》，271页，天津，天津时代公司，1936。

②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见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18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③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采菲录》（影印本），5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了政治的内涵，反缠足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开拓女性的生存空间、解救女性被戕害的身体，而是出于民族自救、强国保种的政治目的。女性的身体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政治权力规训运作的对象。从清末至民国，反缠足运动从未停息，孙中山曾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禁止缠足，缠足之痛被纳入民族国家利益的复杂关系网络中被重新认识，反缠足也由知识分子精英话语上升为国家行为。因此，缠足还是放足，并不是女性个体自主意识所能决定的，如果我们说女性缠足是传统民间伦理道德对其身体戕害的结果，那么现代反缠足运动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对女性身体隐性利用、控制的起点。因此，这场以强国保种为目的、张扬女性解放的反缠足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关于身体的政治运动，正如福柯所说：“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sup>①</sup>

### 第三节 性别政治学视阈中的身体空间规训

现代社会权力机制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政治性压迫以肢解女性身体这个空间中心为要点。正是女性身体的肢解束缚，导致女性生存空间的残缺局促、扭曲变形。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最早、最清醒地从身体政治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化及社会现实，反对政治权力对身体的压迫、铭刻。1927年，鲁迅就北京某女子中学拒收剪发女生报考这一事件，写下《忧天乳》一文，“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如果我们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

---

<sup>①</sup>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27页。

发、束胸、半放脚”<sup>①</sup>。鲁迅对身体政治带给女性的戕害格外敏感，他透过社会舆论对头发、天乳、天足的争论，洞悉了该问题背后隐藏的所谓进化、革新的政治意图。同样，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以细微的笔触展示了各种政治势力是如何以身体为场域展开角力的。其中，《祝福》从身体的视角审视了传统女性的生命悲剧，作者先后四次对祥林嫂身体的白描，栩栩如生地展现了身体政治对女性伤害之深。第一次踏进鲁四老爷家的祥林嫂“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色的”<sup>②</sup>。经过了被迫改嫁—丧子—捐门槛—祭祀受挫等历练后，走向末路的祥林嫂变得“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sup>③</sup>，“脸上消瘦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近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sup>④</sup>。这种身体的变化完全是礼教政治铭刻的结果。在传统伦理规范下，女性的身体不但不由自己主宰，还成为恐惧焦虑的起源，祥林嫂终其一生所担心的正是死后身体会因两个男人的抢夺而被劈开。封建族权、夫权、神权将形而上学的伦理规范转换为民间舆论，并借助它控制女性精神、扼杀女性身体。《伤逝》中，鲁迅借子君之口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呼声，从身体层面肯定了女性生存空间的独立性，子君的呐喊也成为“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因此，以身体为出发点挖掘民族痼疾，成为鲁迅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他不但以身体隐喻的方式，将几千年中国历史归结为“吃人”，而且其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充满着病理学意味，由此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的关于身体空间的文化病理学研究。

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性解放的倡导，打破了女

---

① 鲁迅：《忧天乳》，载《语丝》，1927-10-08。

② 《鲁迅全集》，第2卷，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③ 同上书，21页。

④ 同上书，6页。

性生存空间的圈限，女性终于走出身体残缺的闺房，女性被肢解的身体空间较之传统封建帝国时期，呈现出敞开性、去蔽性的特点，特别是一部分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知识女性开始涉足一向由男性掌控的书写系统，以写作为职业，开始了现代女性文学的写作历程，改写了女性生存空间边缘化的地位。

语言具有控制文化和主体思维的力量，菲勒斯男性中心主义的破除，要从语言批判开始。因此，女性对书写权利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被凝视、被书写的历史，瓦解了根植于男性原欲系统的阳性写作的垄断地位，为颠覆菲勒斯中心主义的话语方式、行动模式提供了可能，在女性解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所言，女性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做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sup>①</sup>。在“五四”这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我们惊喜地看到冰心、庐隐、冯沅君、凌叔华等一批女作家登上文坛，成为新女性文学的拓荒者。她们将反对身体奴役、要求个性解放的目光对准爱情、婚姻问题，《海滨故人》、《隔绝》、《旅行》、《秋风秋雨愁煞人》、《再见》等文本均从女性身体经验出发，以委婉柔韧的笔致袒露了破除生存空间圈限的女性，因无法自由恋爱，而隐匿于心的伤痛，其中冯沅君笔下那个在母爱和情爱之间备受折磨，只能以自杀求得解脱的隽华成为时代女性的代表，“开了为要求恋爱自由而死的血路”。其后的60年间，尽管战事频繁、政权更迭，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以丁玲、萧红、谢冰莹、罗淑、冯铿、茹志鹃、杨沫、宗璞、草明、刘真、柳溪、张洁、张抗抗、铁凝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作家先后登上文坛，改写了文学史上女作家边缘化的地位。纵观90年代之前的女性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其文本内部不是言说着对爱情无尽的痴迷与企盼，就是宣泄着事业家庭难以两全的苦闷与哀愁；不是建构着国难乡愁中“忘记自己是

---

<sup>①</sup> [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女人”的民族想象，就是女英雄呼喊着“信仰就是我的太阳”的政治宣言，女作家并没有从身体出发思考女性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建构自觉的女性意识，其文本仍然属于菲勒斯男性中心话语系统中的启蒙话语或革命话语，女性的身体解放因归化于更大的民族、国家、阶级而获得意义。如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坦言，“恋爱是个人的私事，大家愿把生命献给国家民族的坚决信仰中，恋爱不过是有闲阶级的小姐少爷们的玩意而已”。冯铿在《红的日记》中塑造的马英，完全将个人的身体生命融于民族的生存中，她“眼睛里只有一件东西：溅着鲜红的热血，和一切榨取阶级、统治阶级拼个你死我活”。丁玲在《苇护》、《我在霞村的时候》等文本中，将社会革命伦理高悬于个体生命伦理之上，显示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自觉地将源于身体的性别意识融入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工农意识中的时代特质。

身体作为空间的原点，也是社会秩序建构的基础，是最切近我们的秩序。女性生存空间向男性空间的敞开，不但没有带来社会性别秩序的整体性改变，相反却进一步导致女性生存空间为男性所同质化、同一化。在这一过程中，女性的性别身份丧失。她无法在社会、民族、阶级的解放之外找到位置，其自我意识被泯灭，其身体感知被抹杀。在张扬“男女都一样”的“十七年”，女作家将创作视角从家庭的狭小场域拓展到广阔的社会生活，书写着伟大时代缔造者——“女英雄”的赞歌，即便像茹志鹃《如愿》中的何大妈、《春暖时节》中静兰那样的普通家庭妇女，也像传统社会的男性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然而，从大众传媒对女英雄的张扬和对《红豆》、《百合花》等流露女性话语特质的文本的批判中可以发现，社会权力机制要求女作家消解性别身份，认同战士和革命者的身份。女性作为一个性别被否定，女性的衣着作为身体政治中最具可塑性的表征符号，更是被消解其性别特征，以中性化面目出场，行使着身体国家化的政治训练功能，并由此形成无产阶级的身体政治学。在以“战斗”、“劳动”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理念中，为劳动和战争服务是服装的真正作用，革命意在“通过

服装改变身体的外观，对身体进行直接的‘革命化’，使身体成为革命的‘装置’”<sup>①</sup>。于是，我们看到“十七年”期间（当然也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本中的女性，其衣着都彻底被男性同化，成为男女平等政治神话的佐证。只有像《在悬崖上》、《创业史》中加西亚和三妹子这样道德败坏、勾引男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女性才爱打扮、爱时髦。服装作为性别的外在符号，其差异性被消解，甚至任何在承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对女性问题的探讨和对女性身体情感的关注，都无异于一种政治及文化上的反动。解放的中国女性在这个以男性为道德文化中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着新的无名的重负。女性打着“人”的旗号，成为没有任何意义的空洞能指，女英雄不过是主流社会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和修辞的策略，是为了召唤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建设者行列而缔造出的一个文化符号。女性这个在“五四”文化革命之后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性别，在她们终于和男人共同拥有了辽阔的天空和伸延的地平线之后，却失落了其确认、表达或质疑自己性别权利与可能。西蒙·波伏瓦曾说：“男性不存在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割裂问题，（因为）在行动和工作上他对世界把握得越紧，他就越有男子汉气……而女人自主的胜利却与她女人气质相抵触。”<sup>②</sup>走出家庭、踏入社会的新时代的新女性，带着对爱的憧憬，陷入家庭与工作的泥潭，失落自我。女作家韦君宜在《女人》中，借助描写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在女性身上的矛盾冲突及互相抑制，传达出职业女性屈从家庭角色时的无奈。即便在以社会氛围民主开放著称的新时期，以茹志鹃、谌容为代表的老作家和以张洁、张辛欣、陆星儿为代表的年轻女作家，也都关注着身陷事业和家庭难以同时兼顾的两难中的女性的心灵创伤和精神苦刑，慨叹着“我在哪儿错过了你”，言说着渴望与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的启蒙话语。正如波伏瓦说

---

① 葛红兵、宋耕：《身体政治》，9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

② [法]西蒙·波伏瓦：《女性的秘密》，221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3。

的，只要女人“还在挣扎着去蜕变成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人，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

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那样：“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它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国家的、全球的）的起源问题做出解释。”<sup>①</sup>身体秩序，既是社会秩序的身体化，又是社会秩序的身体结构。身体构成了我们思考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秩序的基础。只要女性的身体依然为男性政治权力所征用，不能真正从身体出发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话语就将陷入形而上学的谵妄之中。

## 第四节 身体写作中自我空间的敞开与解放

身体作为在“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的一个强大的主宰”<sup>②</sup>，存在着反抗权力的能量，因此，在民族国家和阶级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中，我们看到权力机制总是企图策略性地控制身体，征服身体中四处乱窜的力量，并将其改造为政治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身体自身的价值却被消解，放逐于公众的视野之外。即便是在彰显个性自我、追逐形式革新、热衷语言试验的先锋派作家笔下，身体也始终处于缺席的地位，文学关于身体的书写一片空白。“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sup>③</sup>，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人的解放，社会平等与解放更无从谈起。从理论的层面上看，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关注，既得力于弗洛伊德、梅洛-庞蒂、福柯的欲望主体论，更直接受益于以西苏和伊瑞格瑞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者，她们倡导女性通过“身体写作”这一自由的写作样态，改写其被凝视、被书写

---

①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405, 1991.

② [德]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27 页。

③ [美] 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17 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

的命运。西苏提出，在父权制文化压迫下女性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她们只有自己的身体可以凭借，因而，女性只能“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女性必须写自己，“让身体被听见”（letting the body be heard）<sup>①</sup>。此外，以纪丽安·罗斯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空间女权主义者的批判理论，也都用各种不同方法探究都市空间体验，“这些探究的核心处，是种对身体重新燃起的浓厚兴趣，把它看作个人和政治空间的最隐秘点，一切其他空间的一个情感小宇宙”<sup>②</sup>。上述诸多理论开启了从身体层面思考中国女性生存的先河，身体在文学的缝隙处生长起来，成为女性自我拯救的诺亚方舟。

在中国女性身体写作的艰难探索过程中，以林白、陈染、徐晓斌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作家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自觉地返还“女性之躯”，在女性身体经验的叙述中，重构身体空间的合法地位，改写了“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的边缘化地位。

然而，身体空间在文学中合法地位的重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80年代末期，王安忆和铁凝自觉地抛却了以男性之眼反射女性身体的文化传统，在以身体为契机重构以女性自我为主体的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开启了文学正视女性身体的历史之门。其中，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文本，勇敢正视女性的性别、直面女性的身体，从肉身欲望的层面还原了身体对于女性的价值。身体欲望在女作家的笔下超越了精神之爱的圣洁模式，抵抗了现实生活的卑俗、龌龊，回复了人的生命空间的本体状态，由此实现了男女两性灵肉和谐的极致境地。与王安忆对身体欲望的大胆肯定张扬不同，铁凝的《棉花垛》从相反的路径入手，还原女性身体，无奈又悲凉地展示了只有身体才是女性最终的归宿，才是生存空间、生命空间的原点。《棉花垛》中，农家少女

---

① [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4～195页。

② [美] 爱德华·索亚：《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143页。

小臭子的身体被革命者所征用去勾引敌人、刺探情报，但当其反过来对革命造成威胁时，女性的身体立刻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在革命者的眼中蜕变为—具“烂货”，于是，革命者“国”乘逮捕、提审小臭子之机，强行占有并消灭了它。作者尽管没有张扬女性的身体欲望，但其正视到身体既是男权统治的工具，也是女性最后唯一可能拥有的领地，正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追问中，深化了对女性身体命运的思考。然而，身体在文学中苏醒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女性身体欲望的表达多被置于“荒山”、“野岭”、“小镇”、“乡村”等边缘化的社会生活场域，隐约地传达出作家对女性经验现实世界的畏惧和逃避。

与王安忆、铁凝相比，其后的林白、陈染、徐坤则更为勇敢，她们毫无顾忌地以新奇的目光发现并鉴赏女性的身体，以大胆的口吻袒露女性私密的体验、经历，以沉迷的语言颠覆了束缚男女两性的伦理等级及清规戒律，形成一种偏执的女性反抗姿态，以此改变女性被书写、被观看、被欣赏的命运，重构了女性以身体为原点的生存空间的合法性。观看作为一种权力，也是男性借助社会权力，通过观看而扭曲改变女性身体的自由状态，进而改造、侵犯、颠覆女性生存空间的一种政治策略。林白、陈染等通过反抗女性的被观看、被欣赏，而重构了一个属于女性自我的身体空间，实现了对传统空间规训的反抗。在《同心爱者不能分手》、《日午》、《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瓶中之水》、《一个人的战争》等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白是何等迷恋女性的身体，她不厌其烦地借助镜子痴迷地凝视女性自己的身体，以至于其笔下的女性都美轮美奂、缥缈超凡得不食人间烟火。对此，林白解释道，“我内心总是潜伏着一股谈论女人的欲望”<sup>①</sup>，并且“美化女人是我的爱好之一，我总是情不自禁热衷于此，只要我的笔下一出现女人，我就要将她们描绘成既美丽又有很好的气质，我无法放过她们。回首我所发表过的一百万字的作品，我看到那就是一片宽广的天鹅湖，在水和水生植物中

---

<sup>①</sup> 《林白文集》，第4卷，6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间，美丽的女人像天鹅一样浮游其中，她们美得令人心疼，在幽暗的湖畔，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她们缺乏真正的保护。在我的文字之流中，脱落的羽毛比比皆是”<sup>①</sup>。欣赏女性、赞美女性，不丑化女性，虽然使林白付出真实与深刻的双重代价，但是女性被观看、被鉴赏的命运在其笔下被彻底改变，她“将包括集体叙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sup>②</sup>，并任它自由飞翔，尽管这种放飞自我的表达方式在“民族、国家、政治的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又陌生”<sup>③</sup>，但作者正是借助这种陌生，确定了它的独特性，并以此实现了对以男性主体欲望为核心的话语方式的解构。陈染的《私人生活》更是大胆地将女性的私生活场域向公众视野敞开，从身体经验出发，“以血代墨”通过女性自己的语言，书写了女性在残缺、压抑的成长历程中所面临的心灵痛楚和精神折磨，并赋予女性书写语言以独特的隐喻功能和颠覆作用。该书的出版在文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私人写作”的争论。尽管论辩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得到公认，即身体作为空间/权力话语体系中最富有反抗性的力量，成功颠覆了“民族国家空间”和“阶级革命空间”的文化霸权地位，引导中国文学进入身体觉醒的时代。身体在成为文学写作乐园的同时，也印证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观点“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sup>④</sup>。列斐伏尔也曾提到，“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是那个不能被简化还原的和不可颠覆的身体。它拒斥那剥夺它与毁灭它的关系的再生产。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身体这个现实更加脆弱更加容易折磨的东西吗？但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它更富于反抗性吗？斯宾诺莎说过，我们不知道身体能够做什么？需求与欲望的基础，概念与表象的基础，哲学的主体与客体，还有更多的或更好的其他，等等，一切实践的与再生产的基础：这个人类的身体抵抗着压迫性的关系

---

① 《林白文集》，第4卷，45页。

②③ 同上书，295页。

④ [英]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1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的再生产——即使不是直接公开的，也会是拐弯抹角的”<sup>①</sup>。以林白和陈染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或“个人化写作”，虽然将女性生活场域的关注点由社会重新转移至卧室、浴室等私密性空间，但此时，依靠肉体重构家园的女作家，做到了放飞女性的躯体，最大限度调动女性身体内蕴藏的全部征服力，抵抗男权文化的压迫。因此，“个人化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sup>②</sup>。其后，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长恨歌》、徐晓斌的《羽蛇》等文本无不是以女性的视角审视女性的身体，还原了女性清醒与迷茫、背负与绝望、逃脱与落网的身体历史。

祛除了身体压抑，摆脱了历史文化束缚的女性写作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富于变化和韵律的。正如西苏所说：“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关于她们的性特征，即它无尽的和变动着的错综复杂性，关于她们的性爱，她们身体中某一微小而又巨大区域的突然骚动。不是关于命运，而是关于某种内驱力的奇遇，关于旅行、跨越、跋涉，关于突然的和逐渐的觉醒，关于对一个曾经是畏怯的既而将是率直坦白的领域的发现。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必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sup>③</sup>然而，在 20 世纪末，这个以虚拟代替真实、以拟像造就现实的景观社会中，消费高于一切，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而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

---

① H.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p. 89, 1976.

② 《林白文集》，第 4 卷，295~296 页。

③ [法]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200~201 页。

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sup>①</sup>。它作为公众消费的领域，人的自我疏离之物，被简化为性的代名词，不再是思考的逻辑起点。因而，在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新生代女作家笔下，文学成为过剩荷尔蒙的宣泄渠道。沉溺于快感浪潮中的女性，更是无一例外地有着“一种不能遏制无法逃避的自我放纵的冲动，一种与生俱来的暗中摇曳的疯狂”<sup>②</sup>。

在新生代女作家对身体的自我展演式炫耀过程中，以女性为主体而建构的女性空间在都市消费主义的控制下，再次被颠覆、被解构，呈现出欲望中心化、消费至上化和景观展演化的特点。她们抖动着欲望的翅膀，发出蝴蝶般的尖叫，在无畏、自恋、厚颜的狂欢盛宴中，忘却了女性身体写作探求多重可能性的初衷，成为消费都市的畸形儿。都市既为女性提供了欲望的宣泄渠道，也导致欲望的极端物质化。卫慧在《上海宝贝》中试图以物品堆积出荒诞的欲望场景，让CK内裤匆忙地闪现在倪可与马克的洗手间做爱中。此外，《蝴蝶的尖叫》、《糖》、《美丽的羔羊》、《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文本，不但无一例外地袒露出对Chanel香水、CD唇膏以及名牌时装强烈而执著的拜物情怀，而且其中的女性更是流连于酒吧这个消费的公共空间。卫慧在《纸戒指》中就这样写道：“圣诞前夜，恰好是我的生日。于是这一夜理所当然地成了纵情狂欢夜。上好鲜艳欲滴的彩妆，我找出了一只夸张的黑松石耳饰，那耳饰的穗带上嵌了小粒的水钻，摇曳至肩。单耳悬佩的戏剧感，就是属于拒绝平淡的节日的。对于一些过着平庸生活却憎恶平庸的人们，狂欢的节日就如同仅作一日游的诺亚方舟，载着他们淹入快乐的海洋。嗅着昂贵的Estée Lauder所散发出的性感而神秘的芬芳，我虚荣而满足地单身上路了。……迪厅里声色狂乱。年轻的肢体上下左右飞舞，构筑成欲望的迷宫，四周充满了滑腻而粘稠的某种体液的味道。……我笑得止不住，身体内有岩浆呼啸滚动，这是放纵的感

---

① [法]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139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 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255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觉。我跳上音箱，大幅度地摇摆着，一个高个男孩贴过来，我们纠缠相绕，技艺不凡。这是当众亲热的方式之一，具有某种因假想而衍生的诱惑。”<sup>①</sup> 在酒吧这个由绝望、破碎、虚无所构筑的另类异托邦（heterotopia）空间中，所有的阳光、信念、理想变得不堪一击，身体寻找着宣泄的出口，女性更是试图以叛逆游戏的姿态在沉沦中获得拯救，在绝望中获得希望，在黑暗里获得光明的。但是，黑暗中的沉沦，真的能够让女性进入澄明无蔽的生命世界吗？

身体作为空间政治学的原点，在被遗忘、被奴役千百年后，依然具有颠覆既存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力量。鲍德里亚也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既然女性和身体在奴役中曾连接在一起，那么女性的解放和身体的解放的联系也是合乎逻辑且合乎历史的。”<sup>②</sup>但是，在消费社会里，女性的身体却被赋予消费品的交换价值而成为欲望交换的手段，“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sup>③</sup>。“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寻找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消费社会中，女性与其身体的等同，使“肉身已不再沉重……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栖息处”<sup>④</sup>。女作家通过身体布展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寻求女性解放的尝试被消费主义文化逻辑所解构，当她们与男性一同赞叹着“女性的身体是最美的消费品”时，便永远放逐了女性的灵魂，由一种奴役状态转为另一种奴役状态。女性的身体写作，一方面的确强化了女性空间中身体的原点性、原初性，具有革命的颠覆性意义；另一方面，又将女性的身体再次置于被男性凝视观看的境地。因此，女性身体写作最终背离了女性空间革命的初衷，女性的身体空间再次为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所改造、同化。说到底，这是被置于男性

---

① 卫慧：《纸戒指》，见《“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纸戒指》，97页。

② [法]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150页。

③ 同上书，151页。

④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9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

空间视阈下的女性空间。改造生活，必须从改造空间开始。身体作为空间的原点，既是改造的出发点，也是改造的最终目的地。因此，反对专制的压迫，必须从反对身体专制开始。只有这样才能颠覆现有社会的身体压迫规训机制，真正建构出适于人生存的差异化空间，恢复人的自由本真特性。这也是列斐伏尔、福柯等思想家对空间予以批判性研究的最终目的。

## 结束语

关于文学与空间的理论思考，是一个既充满诱惑又极具挑战性的理论题域。本书试图在系统梳理文学与空间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小说进行“空间批评”的文本解读，为“空间化”的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阈。

随着空间理论题域的敞开，空间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丰富性也随之呈现出来。空间成为一个交错并置、多重杂糅的问题域，以至于我们难以运用一种理论来概括出一个确切的空间定义。关于空间的理论探索虽各具特色，但很难穷尽空间问题的全部奥秘，它们只是独辟了空间研究的一条进路。

空间问题的思考与生存问题的思考紧密相关。因此，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复杂，空间问题就有多么复杂，反之亦然，空间问题有多么复杂，人类生存问题也就有多么复杂，这种复杂性无疑也决定了文学空间理论思考的复杂性。人是空间性的存在者，对文学空间理论的探讨，应始终围绕生存性、空间性与审美性来展开。“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对生存空间实践性和文化空间

表征性的探寻，对空间与存在、空间与审美的关注，说到底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探询与关注。正如人类生存充满着对立分裂的矛盾冲突，生存与空间同样充满着对立分裂的矛盾冲突，人类社会生活的异化分裂导致人与空间的对立分离，空间成为压迫操控人类生存境遇的场域，空间成为人类生存的异己之域。因此，人类的解放与空间的解放，成为当代文化政治所必须面对并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就无从谈起。”<sup>①</sup>改变人类的生存境遇，重建“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是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关键所在。因为，“一场没有创造出新的空间的革命，是难以真正发挥革命潜能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只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或政治设施，却无力改变生活。真正的社会变革，必须对日常生活、语言和空间进行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改造”<sup>②</sup>。因此，对人类生命此在的追问，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怀，既是空间视阈敞开的缘起，也是我们从空间政治学维度探寻表征空间及其文化意义的真实目的之所在。

空间并不是客观中立的物理场域，它既是政治权力统治的压迫场所，也是政治革命与解放的策源地。因此，我们“不仅要用眼睛、理智把握空间，而且要运用身体来感受空间，这种感受越是详尽，就越能够清楚地意识到空间内部所蕴含的矛盾，这些矛盾促成了抽象空间的现身和差异空间的展现”<sup>③</sup>。

人类历史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政治权力对生存的控制不但没有缺席退场，反而以隐蔽的“形式化空间统治”的方式，无孔不入地扩散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列斐伏尔将抽象空间或微观权力空间的全面统辖概括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阿尔都塞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

---

① [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7页。

②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54, 1991.

③ Ibid., p. 391.

就不会长久。”<sup>①</sup> 在高度组织化、制度化、工具化、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具有支配性、征服性、控制性与权威性，成为政治权力实施意识形态规训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权力统制面前，空间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达成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套完整的观念体系，还是一整套空间规划组织的实践体系，它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生产强化着生存空间的压迫性机制，以其同质化的方式扼杀个性的多样化，将生存其间的个体“询唤”为主体，使人内化出一种生存压迫的“法则”。在空间生产与权力统制共谋的过程中，文化表征实践进行着启蒙、种族、国家、革命、阶级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空间的文化表征实践，成为权力运作的话语策略，丧失了审美批判的功能与空间政治解放的可能性。

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权力统制始终致力于建构同质化、同一化、封闭化的抽象空间，文化不可避免地陷入个体意识衰竭、主体心灵破碎、现实观念倒置，乃至文本生命内容荒芜的凋敝状态。这不仅带来日常生活沟通的消失和生活世界意义的“零度化”，而且在扭曲压抑生命存在的过程中，导致文化空间多元化的丧失。过度单一化、抽象化、理性化的空间统治，不但没有给人类生存带来福祉，反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异化。因此，打破空间的抽象化、同质化、同一化、封闭化，实现生存空间的多样化、个性化、异质化，建构人类自由审美生存的差异性空间（differential space），既是文化表征实践进行空间建构的首要任务，也是人类政治解放实践的一种革命策略。

差异（difference）作为反思、质疑现代性形而上学思想的术语，“用来指存在之间以示个性的那些互不相同亦不类似的特征”，“它不仅构成了定性、分类、区分、综合以及逻辑推理的基本可能

---

<sup>①</sup> [法]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338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性，而且形成了不同存在方式之间置换、变异的连续现实性”<sup>①</sup>。差异无所不在，艺术就是差异，世界就是差异。肯定差异，就是肯定审美的意义，就是肯定存在的意义。自尼采以来，现代文化思想界一直试图以思考差异、追寻差异、呈现差异的方式，倾听他者的声音，改变生存的孤独、窒息、压抑状态。差异化不仅仅是一种另类的思维方式，还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追求，更是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文学表征空间的生产，只有打破抽象权力空间的同质化压迫，重新建构一个多样性、个体性、差异性的文化空间，才可能全面摆脱文化权力对人的思想和身体的双重束缚，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列斐伏尔，反复重申社会主义空间生产不应再是同质化的抽象空间及其无法消除与克服的矛盾的空间，而是异质性并存的、和而不同的差异性空间。他认为，只有差异性空间“才能消除抽象空间同质化的危害，重构被抽象空间击碎的空间有机体，终结抽象空间将个体身体与社会肌体有机整体性割裂的局限”<sup>②</sup>。总之，差异性空间的建构，意在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目标，并以此开拓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坦途。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审美活动，将关照生命存在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正是艺术审美活动，让有限的语词符号，幻化出诗性的魅力，将人从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泥沼中拯救出来，引导人打破空间压抑的历史牢笼，超越生命与死亡的束缚，回归本真的存在，实现自由的诗意栖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意让敞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即现在敞开在存在物中间才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sup>③</sup>自由是人之生存的理想境界和终极追寻，审美作为自由的对象化表征，以自由的创造与追求为最高境界。审美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因而，文学拥有着以文化表征的方式建构差异性空间

---

①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17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② 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p. 52, 1991.

③ [德]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6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的内在动力和审美诉求。黑格尔曾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sup>①</sup>席勒也指出：“只有通过美，人们才能走向自由”<sup>②</sup>，文学艺术实践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为美而美”的消遣娱乐活动，它指向塑造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艺术审美的真正价值在于自由的象征。文学只有参与差异性空间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艺术生产的最终目的。经由艺术审美去寻找通向差异空间的入口，才能走向差异化的政治生活和差异化的生存方式，这也正是生存美学所致力追求的最高境界。

艺术审美所创造生产的差异性空间，是审美生存的空间，是自由解放的空间，是充满希望的空间，它为人类的自由解放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艺术审美创造的生命历程中，人类将不断地追寻、体验、创造多样可能的差异性空间，最终实现诗意栖居的自由审美境界。

---

① [德] 黑格尔：《美学》，第1卷，14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② 转引自汝信：《西方美学史论丛续编》，1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参考文献

### ◇ 英文著作

- [1] Bachelard, G. *The Poetics of Spa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8
- [2]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 A Marxist Approach*. Mass: MIT press, 1977
- [3] De Certeau, M.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4]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5] Lefebvre, H.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Verso, 1991 ( I )
- [6] Lefebvre, H.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0
- [7]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Press, 1991
- [8]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 [9] Massey, D.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10] Sack, R. *Conception of Space in Social Thought: A Geographic Perspectiv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11] Sharp, W. & Wallock, L. *Visions of Modern City: Essays in History, Art and Literatur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2] Wegner, P. *Imaginary Communities: Utopia, the Nation, and the Spat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13] Williams, R.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中文著作

[14]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 文化研究导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5] [美] 爱德华·索亚. 第三空间: 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6] [美] 爱德华·索亚. 后大都市: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17] [美] 爱德华·索亚.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8]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0

[19]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20] 包亚明主编. 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21] 包亚明主编.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22] 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23] [法] 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4] [美] 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北京: 三联书店, 1992

[25] [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26] [德] 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2

[27] [法] 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28] [法]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29]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 北京: 三联书店, 1995
- [30] 陈平原, 王德威主编. 北京: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31] 陈平原. 小说的书面化倾向和叙事模式的转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32] 陈晓明主编. 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
- [33] 陈越. 哲学与政治: 阿尔都塞读本.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34] 程光炜主编. 都市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5] [美] 大卫·哈维. 地理学中的解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36] [美] 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7] [美] 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 [38] [英]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39] [美] 菲利普·韦格纳. 空间批评: 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和文本性. 见: 阎嘉主编. 文学理论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40] 高楠. 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 [41] 高瑞泉, [日] 山口久和. 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42] 葛红兵, 宋耕. 身体的政治. 上海: 三联书店, 2005
- [43] [德]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 [44]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45] [法] 亨利·列斐伏尔, [匈] 赫勒. 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 [46] [法] 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47] [美]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48] [美] 凯尔纳. 媒体奇观.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 [49] [美] 凯尔纳. 媒体文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50] 蓝爱国. 解构十七年.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51] [美] 劳拉·穆尔维. 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 见: 李恒基, 杨远婴主编. 外国电影理论文选.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

- [52] 李今. 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53] 李俊国.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54] 李欧梵. 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54.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55] 李书磊. 都市的迁徙: 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 北京: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 [56] 李杨. 50—70 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57] 刘禾. 跨语际实践: 文学、民族文学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北京: 三联书店, 2002
- [58] 刘禾. 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 见: 唐小兵主编. 再解读: 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59] 刘怀玉. 现代性的神奇与平庸: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 [60] 刘小枫. 沉重的肉身: 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 [61] 刘小枫. 经典美学文选: 现代性的审美精神.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7
- [62] [匈] 卢卡奇. 审美特性.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 [63] [美] 罗斯玛丽·帕特南·董.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65] [美] 迈克·迪尔. 后现代都市状况.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 [66] [英]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7] [法] 米歇尔·福柯. 权力的眼睛: 福柯访谈录.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68] [法]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69] [法] 莫里斯·布朗肖. 文学空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70] [德]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 [71] [德] 尼采.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 [72] 倪伟. “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73] [英] 帕克. 地缘政治学: 过去、现在和未来.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3
- [74] [英] 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 [75] [美] 沙朗·佐京. 城市文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76] [英] 斯图亚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77] 宋伟. 后现代转向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 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 2006
- [78] 孙逊, 杨剑龙主编. 都市、帝国与先知. 上海: 三联书店, 2006
- [79] 孙逊, 杨剑龙主编. 阅读城市: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上海: 三联书店, 2007
- [80] 孙逊主编. 都市文化史: 回顾与展望. 上海: 三联书店, 2005
- [81] 孙周兴主编. 海德格尔选集. 上海: 三联书店, 1996
- [82] 陶东风主编. 文化研究精粹读本.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83]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 [84] 汪民安, 陈永国, 马海良主编. 城市文化读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5] 汪民安, 陈永国, 张云鹏主编. 现代性基本读本.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86] 汪民安, 陈永国主编. 后身体: 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 [87] 汪民安主编.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88] 王春荣. 女性生存与女性文化诗学.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2
- [89] 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90] 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91] 王宏图. 都市叙事与欲望书写.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92] 王文英, 叶中强. 城市语境与大众文化: 上海都市文化空间分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3]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94] 吴福辉．都市漩涡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95] 夏铸九，王志宏主编．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8

[96] 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97] 许纪霖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98]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99] 杨义．小说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100] 叶秀山，王树人主编．西方哲学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1] 叶中强．从想象到现场：都市文化的社会生态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102] [英]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03] 余岱宗．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上海：三联书店，2004

[104] [英] 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05] [美] 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6] [美]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7]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8] 张寅德主编．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09]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10] 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1] 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2] 周宪主编．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3] 邹诗鹏．实践—生存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 ◇中文期刊

- [114] 程世波. 批评理论的“空间转向”.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2005 (6)
- [115] 胡大平. 社会批判理论之“空间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 江淮学刊, 2007 (2)
- [116] 靳凤林. 空间与人类的生死处所——空间问题的生存论诠释.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 (2)
- [117] 敬文东.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 阅读, 2004 (1)
- [118] 龙迪勇. 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 思想战线, 2005 (6)
- [119] 陆扬. 空间理论与文学空间. 外国文学研究, 2004 (4)
- [120] 陆扬. 析索亚“第三空间”理论. 天津社会科学, 2005 (2)
- [121] 罗岗. 再生与毁灭之地——上海的殖民经验与空间生产.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6 (1)
- [122] 马春花. 房间、酒吧与街道——由空间符码看 90 年代末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变化.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 [123] 任平. 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江海学刊, 2007 (2)
- [124] 尚杰. 空间的哲学: 福柯的“异托邦”概念. 同济大学学报, 2005 (3)
- [125] 陶东风.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 中南大学学报, 2005 (3)
- [126] 汪原. 《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 新建筑, 2002 (2)
- [127] 徐敏. 电影中的交通影像: 中国现代空间的视觉重塑. 文艺研究, 2006 (3)
- [128] 徐巍. 视觉文化语境中当代小说的空间化趋向及其意义. 当代文坛, 2005 (6)
- [129] 叶涯剑. 空间社会学的方法论和基本概念解析. 贵州社会科学, 2006 (1)
- [130] 叶涯剑. 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河南社会科学, 2005 (5)
- [131] 张宝明. 现代性空间的生成: 《新青年》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寻踪 (1915—1919).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6 (2)

## 后 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获得博士学位后，我来到美国波士顿访学。这座繁华、现代的大都市竟然有着古典优雅的另一副面孔，处处散发着质朴厚重的文化气息，在这里，我切身体验着现代都市空间的驳杂异质性，感受着“时空分延”所带来的思维差异与张力，这些进一步增强了我对空间研究的兴趣和对个性化、多样化的差异性空间的向往。如何建构一个适合人类自由生存的、包容多样的生活空间，再次成为我学术思考的兴趣点。紧张的访学之余，我抽出时间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修改论文，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无私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回想起当初选择文学与空间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面对“是否有空间理论？”的质疑，我极度沮丧失望，几乎丧失了继续研究下去的信心。没有想到，在东西方文化的缝隙处，我居然能再度重新找回学术研究的自信心，这应该是我这次赴美访学进修的最大收获。异国他乡的生活，更让我怀念在国内完成博士论文写作的时日 and 那些曾经给我以巨大精神支持的人。在此，我想以博士论文中的“致谢”作为

本书的后记，以纪念那段难忘的时光：

当我为论文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又是槐花飘香的季节，空气中弥散着香甜的味道。这个春天特别的短暂，绚烂的瞬间让人来不及驻足，就已弹指而去。风景，只能从记忆中寻找。回想起过往的几百个日日夜夜、春夏寒暑，尽管与我梦想中“绿林野屋”、“人淡如菊”的诗意生活相去甚远，但无数的关爱璨若星河，为我照亮这段灰暗的日子，让我勇敢前行、不曾放弃。

我自不量力，选择了文学空间研究这个熬人心血的苦差，承受着西绪福斯式的精神痛苦，亦难得正果。所幸导师高凯征教授在我写作最艰苦、最彷徨的阶段，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与帮助。没有他一次次启人心智的教诲、一遍遍字斟句酌的修订，我的论文将难以顺利完成，更不可能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和辽宁省社科基金的资助。我的论文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感谢我的导师高凯征教授！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老去，只有师恩永存！

感谢王春荣教授、赵凌河教授。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走进二位先生的课堂，聆听她们的教诲。这十一年来，她们以博大的情怀、慈母般的关爱，呵护我成长岁月的每一个阶段，教会我如何面对生活。没有她们，就没有今天的我。

感谢王纯菲教授、宋伟教授，是他们为我分担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帮助我度过学习生活中一个又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既是我的老师，更像是我的家人，感谢他们给予我的关爱、理解与支持。

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一直包容着我的坏脾气，默默地守候在我身边，无怨无悔、无尽无限地付出。他们让我的生命沐浴在爱的光辉里，他们教会我宽容与感恩，更给我一个永远的家。无论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无论承受多少误解委屈，他们对我的爱从未改变。这份爱，伟大而平凡，是我生命中流淌的河。感谢我的儿子虫虫，他灿烂的笑脸，让我所有的沮丧、

无奈、痛苦、失落，顷刻间化为乌有。有他的日子，天空没有阴霾，我觉得生命清澈透明。因为他，我觉得自己的坚持有了意义，自己的努力有了方向。

花落无言，这是一段怎样令我难以忘怀的日子啊！

谢纳写于波士顿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六日